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馬來西亞首相對中國及華人選民的身份認知：

作為選舉策略的馬中關係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Chinese Voters' Identities
in the Eyes of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s Campaign Strategy

孫天美

Soon Thean Bee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January, 2019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馬來西亞首相對中國及華人選民的身份認知：
作為選舉策略的馬中關係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Chinese Voters' Identities
in the Eyes of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s Campaign Strategy**

本論文 孫天美 君（學號：D0332200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系完成之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8 年 1 月 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
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之瑜

（簽名）

（指導教授）

張碧君

孫翠薇

吳子嘉

黃國華





中文摘要

本論文先是採用「多元啟發論」檢視三位馬來西亞首相，利用與中共的關係在三場攸關政權延續的選舉，影響華人選票的作為是否犧牲了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繼而採用「後華性」，檢視首相對中國及華人選民身份認知形成的途徑。本論文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如下：（一）在1974年、1999年及2013年全國選舉前100天內，馬來西亞首相在與中共高官互動，有否犧牲國家利益以維護執政黨和首相的政權利益？（二）學界習以馬共解散作為分水嶺，認為在馬共解散前馬來西亞對中共抱持敵意，解散後則態度友善，不過馬來領導精英無論是在馬共解散前後，都曾對中共實施互為矛盾的作為及政策，究竟馬來精英是視中共為敵、為友還是敵友難分？（三）馬來領導人如何形成對中國及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識？馬中關係的既有研究層面，主要從區域主義、經濟、策略及歷史著手，卻未曾探討馬來西亞首相與中共的互動，受到他們自身對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知影響的事實，及促成這份認知的原因。本論文採文獻分析法及調查訪談法建立分析架構並發現：第一，縱使三任首相都曾引入中國因素，以期影響華人選民的投票意向，但依據「多元啟發論」的分析，首相們從來沒有為了維繫政權利益，徹底犧牲國家利益，而是在兩者之間尋找最能夠達到兩全其美的方法；第二，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敵友認知，主要因應馬來領導人對中共的需求而定義，當前者把中國視為具主觀意志的異文明／意識形態時，中共就是敵；反之若把中國視為經濟資源時，中共就是朋友了；第三，三位首相對中國及對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的認知，主要是透過「後華性」的「科學的華人性」途徑，僅有第六任首相納吉在「科學的華人性」之餘，面對中共時還有「漢學的華人性」。事實上，首相對中國和華人身份的認知皆相當表面，而這也正是首相在2013年選舉時打「中國牌」失效的原因。

關鍵字：馬來西亞；首相；選舉；中國；華人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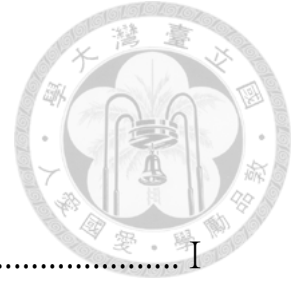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amine if the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had sacrifice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Malaysia when they exploited the Malaysi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ons to affect the Malaysian Chinese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s. Subsequently,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Post-Chineseness theory to study the approach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took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1.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sacrifi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 secure the regime interest when they publicly interacted with the PRC leaders within hundred days before 1974, 1999, 2013 general election was held? 2. How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perceive the PRC? A friend, a foe or a frenemy? 3. How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perceive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hat were th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such an understanding? Existing studies discussed the Malaysia-PRC relations from the aspect of regionalism, economy, strategy and history. In f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towar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as as well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sia-PRC relations. Yet, this area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and so did the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such perception. This dissertation relies on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t discovers that: 1. The Prime Ministers did not entirely scarify national interests to maintain their regime interests. In fact, they endeavored to search options that could fulfil both interests. 2. When the Prime Ministers viewed China as a peculiar civilization with a subjective will, the PRC is a foe; when they viewed it as an economic resource, the PRC is a friend.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toward the PRC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ere through the lens of Scientific Chineseness, but Najib Razak, the sixth Prime Minister developed an additional understanding on the PRC, namely the Sinology Chineseness. Ye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n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ere superficial.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failed to rega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votes in the 2013 although he met the PRC leader before the e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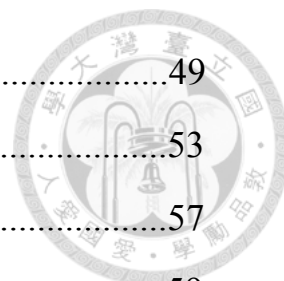
Keyword: Malaysia; Prime Minister; election; China; Malaysian Chinese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7
第三節 研究架構.....	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0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1
第六節 論文限制.....	21
第七節 章節安排.....	22
第二章 理論構造.....	23
第一節 多元啟發論.....	23
第二節 後華性.....	30
第三節 多元啟發論與後華性的關聯.....	35
第四節 總結.....	35
第三章 1974年的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	37
第一節 建交前的國際背景.....	38
第二節 中共與馬共.....	42
第三節 建交前的國內背景.....	44



第四節 馬中建交過程.....	49
第五節 馬中建交的兩階段決策.....	53
第六節 總結.....	57
第四章 1999年的朱鎔基選前官訪與中國銀行復辦.....	59
第一節 馬中關係的升溫.....	60
第二節 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64
第三節 選前的國內背景.....	69
第四節 選前的馬中高官互訪	72
第五節 官方互訪與中國銀行復辦的兩階段決策.....	76
第六節 總結.....	81
第五章 2013年的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	83
第一節 馬中關係背後的馬美關係.....	84
第二節 2008年選舉與2013年選舉.....	91
第三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過程.....	98
第四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的兩階段決策.....	100
第五節 總結.....	103
第六章 結論	105
第一節 馬來人 vs 華人.....	106
第二節 三位首相的後華性.....	111
第三節 研究發現.....	116
第四節 研究建議.....	119
參考文獻	121
附錄一	145

表目次



表 1-1.....	5
表 2-1.....	34
表 3-1.....	47
表 3-2.....	56
表 4-1.....	62
表 4-2.....	62
表 4-3.....	64
表 4-4.....	78
表 4-5.....	79
表 5-1.....	87
表 5-2.....	88
表 5-3.....	90
表 5-4.....	92
表 5-5.....	10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74年5月31日，馬來西亞¹第二任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簽署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正式終結馬來西亞在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³任內，把中共視為仇寇 13 年的外交政策⁴。

壹、水到渠成的馬中建交

相對於東姑阿都拉曼任內前 10 年鮮明的反共尤其是反中共立場⁵，自詡為「非共份子」（Ott, 1972）的拉薩，於 1970 年 9 月 22 日擔任首相後對與中共建交則抱持相對靈活的態度。事實上，拉薩在擔任東姑阿都拉曼副首相時後的反共和反中共立場與東姑阿都拉曼一致，但因為國際局勢的影響和演變，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後期兩


¹馬來西亞（Malaysia）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獨立時，國號為馬來亞聯合邦，簡稱馬來亞；1963 年與一海之隔的沙巴（Sabah）和砂拉越（Sarawak）合併，國號改為馬來西亞。本論文按事件發展時序，交替使用馬來亞及馬來西亞。

²台灣學界對 Abdul Razak Hussein 沒有統一譯名，常見的計有敦拉薩、拉薩克、阿都拉薩和拉薩。之所以出現多種譯名，與其馬來文名字沒有統一寫法相關，其馬來文寫法有 Tun Haji Abdul Razak bin Dato Haji Hussein、Tun Razak、Tun Abudul Razak、Tun Abdul Razak Hussein、Tun Haji Abdul Razak bin Hussien、Abdul Razak Hussein 等，當中的 Tun 和 Dato 為類似英國「爵士」（Sir）頭銜，Haji 是曾到過麥加朝聖者的尊稱，bin 具「某人兒子」之意。為了使名字簡潔其表現中立不阿，馬來西亞有些學術文章或媒體會去掉相關稱謂，成為 Abdul Razak Hussein，簡稱 Razak。本論文為了顯示中立和超然，全文僅以「拉薩」稱之。

³Tunku Abdul Rahman 中的 Tunku 是皇室成員稱號，由於東西方學界和媒體都已習慣稱其為東姑阿都拉曼或 The Tunku，為了避免閱者混淆，本論文保留其頭銜稱謂，無特別追捧其人之意。

⁴拉薩於 1970 年繼任後，開始對中共表達善意展現建交意願，但直到 1974 年兩國才簽署建交公報。因此本論文認為在 1970 年至 1974 年期，兩國關係雖然不似東姑阿都拉曼時代緊張但也不能視之為已完全和緩，而是處於一種灰色地帶，因此本論文認為吉隆坡敵視中共應為東姑阿都拉曼任期間的 13 年。

⁵東姑阿都拉曼反共的原因，除了因為馬來亞共產黨在國內武裝作亂外，獨立後的馬來亞國防安全仍由英軍防衛，因此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外交方針才會傾向西方陣營（王虎，2011）。



人立場才出現變化 (Baginda, 2016)。東姑阿都拉曼早年偏西方陣營的馬來亞／馬來西亞外交政策，使馬來亞／馬來西亞在國際上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排擠，以至認同 1955 年萬隆會議精神⁶ (Bandung Conference) 的馬來西亞，先於 1964 年未被邀請參加在開羅舉辦的第二屆不結盟運動會議 (The Straits Times, 1964)，後於 1965 年又有馬來民族統一機構⁷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巫統) 國會議員馬哈迪 (Mahathir Mohamad) 領軍的非官方代表團，申請加入亞非人民團結組織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被拒 (The Straits Times, 1965)，使得政府不得不開始檢討大馬親西方外交政策的利弊 (Saravanamuttu, 2010)。從 1966 年起，英國因為積累的經濟和財政惡化開始檢討國防政策以縮減開銷，其中包括撤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蘇彝士以東駐軍 (The Straits Times, 1966a; 1966b)，吉隆坡反共產國家和拒絕與共產國家建交的態度出現變化。在 1967 年 7 月 19 日英國正式宣佈撤軍前兩個月的 5 月 7 日，吉隆坡與貝爾格萊德經歷半年談判後宣佈建交 (南洋商報, 1967e)，南斯拉夫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建立邦交的共產國家。約莫半年後的 11 月 24 日，吉隆坡再與第二個共產國家蘇聯建交 (The Straits Times, 1967b)。

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於 1968 年 1 月 28 日分別在國會接受議員詢問時，一致表明馬來西亞外交政策將朝區域中立化邁進 (南洋商報, 1968a; 南洋商報, 1968b; The Straits Times, 1968b)。南斯拉夫和蘇聯以後，東姑阿都拉曼內閣並未停下與共產國家建交的腳步，陸續還有羅馬尼亞 (1969) (The Ambassade of Romania in Malaysia) 和匈牙利 (1969) (Diplomacy and Trade, 2018)。儘管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7 年中旬仍堅定表示北京歷來意圖干涉東南亞小國的內政，吉隆坡絕對不會與北京建交 (南洋商報, 1967a)，但在 1969 年 3 月時東姑阿都拉曼已經不再堅持，僅表示只要中共不再干預馬來西亞內政並且承認馬來西亞主權，吉隆坡準備與北京建交 (南洋商報, 1969a; 1969b)。東姑阿都拉曼對中共提出如此條件，主要是因為中共曾多次公開

⁶ 萬隆精神指的是於 1955 年 4 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三世界國家會議，與會大部份國家來自亞洲，英屬馬來亞因為仍是殖民地，僅能以列席身份出席。萬隆會議有 5 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的完整與主權、不侵略、不干預他國內政、公平與互利及和平公處。(Evans, Graham & Jeffrey Newnham, 1998)。

⁷ 巫統成立於 1946 年 5 月 10 日，黨員僅招收馬來人。成立目的是為了抗議英殖民政府於同年 4 月 1 日賦於馬來半島上各民族平等地位的馬來亞聯邦，以爭取恢復馬來人特權及保障馬來蘇丹的地位 (UMNO Online, 2018)。

讚揚馬來西亞國內共產黨組織，同時也是中共海外支部的馬來亞共產黨⁸（Malayan Communist Party，馬共）企圖破壞固有體制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的武裝鬥爭。中共甚至還曾敦促馬共應繼續鬥爭直到推翻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為止（The Straits Times, 1966c; The Straits Times, 1966d; Berita Harian, 1966; Berita Harian, 1968）。

拉薩繼任首相後，延續東姑阿都拉曼任內與歐洲共產國家建交的政策，計有波蘭（1971年）（Official Website of Embassy of Malaysia, Warsaw）和北韓（1973年）（The Straits Times, 1973a），吉隆坡在拉薩任內與北京建交因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貳、充滿馬中建交氣息的全國選舉

馬中建交兩個月後的7月31日，拉薩宣佈解散第三屆國會，遠比國會屆滿之日提早18個月⁹（The Straits Times, 1974；南洋商報 1974d）。選舉委員會翌日公告投票日定於8月24日（南洋商報 1974e），是拉薩於1974年6月2日從中國歸國後的83天。競選期間，執政聯盟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國陣）在華人選區大肆宣傳國陣和拉薩的「馬中建交」功績，街頭巷尾更是隨處可見拉薩和中共國家主席毛澤東握手的海報或照片（Cheah, 2002；星洲日報，2013）。

⁸馬來亞共產黨由共產國際代表胡志明於1930年在大馬森美蘭州成立，二戰時曾協助原英殖民政府對抗日本殖民，日本投降後改為對抗英殖民政權。英殖民政府於1948年起宣佈大馬進入緊急狀態全力剿滅馬共，直到1960年暫告一段落。1968年馬共再度活躍於大馬境內，大馬宣佈全國進入第二次緊急狀態，一直到馬共於1989年無條件投降後此番的緊急狀態才宣告終結。（于洪君，2015；何啟才，2014）

⁹馬來西亞採君主立憲內閣制，馬來西亞憲法第40（2b）條及55（3）條規定，國會是在最高元首於首相建議下解散，否則國會任期從第一次召開會議的日期算起滿5年後自動解散；第三屆國會於1969年5月10日選出，但選舉結束3天後發生族群暴動，政府於同月14日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及國會民主無限期中止。21個月後緊急狀態解除，第三屆國會於1971年2月20日首次召開會議，按馬來西亞憲法規定，屆滿之日應為1976年2月19日。

選舉結果顯示，國陣重奪於 1969 年第三屆選舉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負責吸引華人選票的國陣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¹⁰（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馬華公會），和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¹¹（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民政黨）的議席勝選率都大幅增加。馬華公會議席勝選率從 1969 年的 39% 增加 44% 達 1974 年的 83%；民政黨則從 57% 增加 6% 達 63%。華人選票明顯成功回流¹²。儘管馬中建交符合馬來西亞中立不結盟的外交政策，Baginda（2016）卻指出馬中建交時機是因應國內選舉而訂，用意是為了取得仍視中國為祖國的華人選民好感，繼而把選票投國陣。Baginda 的看法獲得曾參與馬中建交過程的馬華公會副總會長曾永森，及馬來西亞第五任首相巴達威（Abdullah Ahmad Badawi）證實。

參、三度打中國牌的馬來西亞全國選舉

東姑阿都拉曼時代互不往來的馬中兩國領袖，在 1974 年建交後開始互訪，並於 1989 年末馬共宣佈解散後進入互動熱絡階段。除了馬中建交已經被 Baginda 證實宣佈時間與選舉有關，從馬中建交至 2013 年間舉行過的 10 場全國選中，仍有兩場選舉是在馬來西亞領導人與中共高官進行官訪活動後的 3 個月內舉行：

1. 1999 年 11 月 29 日第四任首相馬哈迪任內的第十屆選選，是在中共總理朱鎔基結束訪馬行程結束後 3 天舉行¹³。朱鎔基訪馬期間，延宕 7 年的「中國銀行」復辦案簽署備忘錄確定落實；

¹⁰ 馬來亞華人公會成立於 1949 年 2 月 27 日，原為謀求華人福利為目的社團組織，因此黨員至本論文截稿時仍僅招收華人而已。馬華成立之時許多華人正面臨雙重欺壓，一方面受到馬共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受到英殖民政府軍警人員的欺壓，馬華因而在英殖民政府和華人之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與英殖民政府商議釋放在緊急法令下無辜被扣押的華人、交涉被扣留和被遷徙新村的華人財產和賠償等。爾後馬華公會覺得轉型為政黨才能更有效的保護華人在馬來亞的福利，於 1952 年轉型為政黨。馬來亞於 1964 年更改國號後，馬華公會也把黨名改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張曉威，2017）。

¹¹ 民政黨成立於 1968 年，原為反對黨，於 1969 年首次投入選舉，後於 1973 年加入執政聯盟。

¹² 馬來西亞 1974 年的國會議席比 1969 年的 104 席國會議席增加 50 席達 154 席。與此同時馬華公會和民政黨於 1974 年競選的席次也比 1969 年減少 – 馬華於 1969 年競選 33 席（贏得 13 席），1974 年競選 23 席（贏得 19 席）；至於民政黨則於 1969 年競選 14 席（贏得 8 席），1974 年競選 8 席（贏得 5 席）。

¹³ 馬哈迪於 11 月 10 日解散國會，投票日訂於 29 日，朱鎔基是在競選期間訪馬。外國領袖訪馬，至少需要兩個月前通知，馬哈迪選擇在朱鎔基訪馬前解散國會，利用中國和朱鎔基在中文媒體製造效應的意圖明顯。



2. 2013年5月5日第六任首相納吉（Najib Razak）任內的第十三屆選舉，是在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結束訪馬行程後的91天舉行¹⁴。賈慶林訪馬的主要原因是為馬來西亞和中共共同投資合作的「馬中關丹產業園」主持開幕儀式（表1-1）。

表 1-1：馬中高官互訪及選舉日期交互比對


選舉屆數／日期	訪中馬來西亞首相／ 拜訪日期	訪馬中國高官／ 拜訪日期	距離選舉日
第四屆選舉 1974.08.14	第二任首相 拉薩 1974.05.28~06.02		83 天
第十屆選舉 1999.11.29		總理朱鎔基 1999.11.22~ 11.26	3 天
第十三屆選舉 2013.05.05		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 2012.02.04~02.06	91 天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作出整理。

這兩場選舉與 1974 年的選舉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正好首相及國陣必須獲得華人大部份選票，以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或確保贏得選舉，以免影響首相在所屬的巫統的政權正當性，繼而影響首相地位¹⁵。以 1974 年全國選舉為例，拉薩於 1970 年得以繼任首相之職，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9 年的全國選舉中，失去不少馬來人和華人選民的支持，失去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被迫辭職。拉薩為了維持政權的正當性，除了必須鞏固馬來人選票，華人選票也必須在 1974 年、也就是他帶領

¹⁴ 第十三屆國會於 2013 年 4 月 3 日解散，賈慶林是於 2013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6 日期間官訪馬來西亞。

¹⁵ 自聯盟／國陣執政馬來西亞以來，歷任首相皆為巫統主席，因為巫統在歷屆選舉中都囊括國會最多數議席。



國陣以來的第一場全國選舉中回流。至於 1999 年選舉，是因為馬哈迪開除深受馬來人社群喜愛和支持的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後導至馬來選票分裂，馬哈迪必需獲得大部份華人支持才能贏得選舉，才能使其政權正當性無恙；2013 年選舉，納吉則面臨華人思變氛圍濃厚，希望能夠出現獨立以來的第一次政權輪替，國陣為了重奪 2008 年自獨立以來再次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選票，就得設法重獲廣大華人的選票支持。

馬來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抱持一種迷思，認為國內的馬來西亞華人，不論在馬來西亞居住多久依舊心繫中國，對中國有一種情意結，這點本論文獲得曾經於 1990 年至 2008 年間擔任檳州首長 18 年的許子根證實。因此上述三任首相在選前 100 天內和中共親切互動，也就不意外了。

肆、建交後至 2013 年間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態度

馬來西亞從 1957 年獨立至 2013 年的外交政策，主要涵蓋 4 大主題：從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就開始貫穿馬來西亞各時代的伊斯蘭主義、1960 年代末開始發展的區域主義、1970 年代初即奉行的中立不結盟，及 1980 年代以降的全球化（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 2018; Saravanamuttu, 2010）。不過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並非全然如此。表面上，馬來西亞和中共固然因為前者的 1970 年代中立不結盟政策建交，但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卻依舊因為馬共在馬中建交後，仍於大馬領土作亂因而對中共充滿敵意。Baginda（2002）和 Kuik（2013a）因而依據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把兩國關係分為敵意（hostile）和友好（cordiality）兩個階段。敵意是自東姑阿都拉曼時代，歷經拉薩、胡先翁（Hussein Oon）及馬哈迪執政的前 8 年；友好則始於馬哈迪執政的 90 年代，也即是馬共於 1989 年 12 月 2 日，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協議和平協議」（Hadyai Peace Accord）（The New York Times, 1989a），承諾解散及放棄武裝鬥爭之後。

90 年代初，馬哈迪提出「亞洲價值」（Asian Value），做為與中共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連結基礎，共同對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試圖干涉亞洲國家的民主制度和人權狀況。此外，馬哈迪也深信若推動一個由中共領導的東亞區域組織，就能與西



方國家勢均力敵，東亞國家無需再受到西方列強的剝削。這個設想，正好與冷戰後積極對周邊國家執行睦鄰政策，以利經濟發展及國家現代化的中共一拍即合，馬中關係因而快速升溫。直到納吉於 2009 年執政的時候，馬中關係已經發展出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 – 早從 2008 年開始，中國就取代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伙伴。一度把中共視為仇寇的馬來西亞（BBC 中文，2010），更在 2013 年和中共締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BBC 中文，2013；中國報，2013）。

儘管如此，本論文認為在吉隆坡對北京的「敵意」和「友好」之間，應該再區分出「冷和」的階段，時間為馬中建交後的 1974 年到馬共解散後的 1989 年止。這段期間，吉隆坡和北京之間並非如同東姑阿都拉曼時代的全無官方往來，而是維持在最低的互動，以高階領袖為例，馬來西亞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曾於 1979 年拜訪中央委員主席華國鋒¹⁶，及馬哈迪於 1985 年拜訪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中共方面，則有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於 1978 年拜訪胡先翁、1981 年總理趙紫陽和 1986 年副總理田紀雲拜訪馬哈迪。相對於 1990 年起兩國高階領袖的密切互訪 – 馬哈迪於 1990 年至 2003 年卸任前共訪北京 5 次；第五任首相阿都拉於 2004 年至 2008 年任期內共訪北京 2 次；納吉於 2009 年至 2013 年間共訪北京 3 次；中共高階領袖則於 1990 至 2013 年間共訪吉隆坡 16 次¹⁷。1974 年和 1989 年這段時間兩國的互動雖然比 1990 年後遜色許多，但也未如「敵意」期間的毫無往來，本論文因此才認為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有必要再區分出「冷和」才臻完善。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各地學者已有不少發表，大致上可從 4 個層面分類：區域主義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策略層面（Kuik, 2013a）和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等。不過在這些研究中，卻未有系統性的探討馬來西亞獨立至 2013 年間，國陣首相偏好「打中國牌」取得華


¹⁶ 中共於 1978 年的第三部憲法規定廢除國家主席職，國家主席的相關職務賦於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行使，直到 1982 年通過第四部憲法後，才恢復國家主席職。

¹⁷ 相關互訪資料是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和中共外交部網頁作出整理。

人支持以救選情的習慣；也未有研究探討巫統領導精英對中國的認識和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識。

依據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外交決策的制定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可是國家利益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 – 主戰或主和在遠程和近程的不同時空背景考量下，都有其符合國家利益之處，但究竟是兵戎相見還是坐下協商，基本上極大部份還是受到決策者主觀認知，再結合客觀訊息後形成的認識影響。此外有經驗的決策者，還會進一步評估帶來國家利益的決策對其政權延續性的影響（Mintz et al., 1997a; Mintz, 2004a），因此研究外交決策若忽視決策者對特定國家的認識和影響其認識的原因，則無法瞭解決策者何以認為做出相關決策，做為同時達到捍衛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原因。

馬來西亞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國的態度，從東姑阿都拉曼的敵對、拉薩的冷和，到 90 年代後馬哈迪的友好，許多研究都個別證明相關首相的態度與國內政治發展習習相關，其中華人因素更在馬中關係的變遷中扮演關鍵角色（Kuik, 2008; Chandran, 2009; Liow, 2009; Baginda, 2016）。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東姑阿都拉曼曾擔心如果中共攻打馬來西亞，國內華人會裡應外合協助中共佔有馬來西亞（Baginda, 2016），拒絕和中共有任何的官方互動。諷刺的是，巫統於 1952 年投入馬來半島首屆市議會選舉時，因為競選資金不足必須接受馬華公會的資助，與馬華公會結盟競選。這種合作關係，後來於 1955 年再接受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國大黨）加入，成為後來國陣於 1974 年組成的基礎（崔國強，1990）；拉薩上任後有意與中共建交，主要是透過華人部長和華裔商人，穿梭兩國之間傳達領導人之間的訊息（Cheah, 2002; Baginda, 2016），可是因為中共與馬來西亞建交時，不願承諾完全放棄對馬共的物質和實質支持，拉薩以後的首相才和中共僅保持最低的互動關係。馬共解散後，吉隆坡和北京的互動才從經貿層面開始熱絡，繼而發展到文化、旅遊、政治、軍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這其中，華裔政治人物、華裔商人、華裔文教界人士的身影從來沒有缺席過。從這個脈絡看下來，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政治人物的眼中，在馬中關係上之於國家利益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概念。



事實上，華人就首相的政權利益層面亦是如此。從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以來，華人的口數就僅次於馬來人-- 獨立時華人佔總人口數 38.4%，馬來人 49.0%。往後華人人數逐步遞減，馬來人口緩緩上升，2011 年時華人為 24.6%，馬來人為 67.4%（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18）。無論如何，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的華人，每逢選舉都扮演著造王者或國陣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重要角色。不過華人和馬來人之間因為歷史上的種種恩怨¹⁸（崔貴強，2007）和對「民族」認知的落差¹⁹（Reid, 2004），使得兩個族群間的關係縱使在獨立後 56 年，只要觸及國家政策和利益分配方面仍然相當敏感。馬來領導精英在選舉時除了面對馬來選民的壓力，本身做為馬來族群的一份子，難免對華人有世代承傳的主觀嫌隙和刻板印象，因此很難從政策根本面落實以取得華人選票的支持。馬來西亞在沒有強勢反對黨發出足以喚起華人在政策上被不公平對待的怒吼，華人基本上已經對國陣政府提供華人次等公民福利的現象認命，每次選舉仍然習慣票投國陣。可是一旦馬來選票分裂如 1990 年第十屆選舉，或馬來領導精英沒有信心取得大部份華人選票以獲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時，如 1974 年和 2013 年選舉時，國陣就會透過訴諸華人的中國情結而與中共親密互動，爭取華人的歡心。

有鑑於此，本文意圖釐清以下 3 個問題：（一）在 1974 年、1999 年和 2013 年選舉中，吉隆坡與北京在選舉前三個月內的互動，國家利益是否有因為執政黨的政權利益而被犧牲？（二）學界習以馬共解散作為分水嶺，認為在馬共解散前馬來西亞對中共抱持敵意，解散後則態度友善，不過馬來領導精英無論是在馬共解散前後，都曾對中共採行互為矛盾的作為及政策，究竟馬來精英是視中共為敵、為友或敵友難分？（三）馬來領導人是如何形成對中國和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識？

¹⁸ 英殖民政府為了方便管理，按族群規劃工作領域「分而治之」—馬來人從事軍警工作，華人從事勞動工作，兩族關係因為沒有共同語言溝通和工作領域的劃分，本來就相當疏離。日本從 1942 年至 1945 年殖民馬來半島期間，由於許多馬來半島華人曾經因為中國發生的「蘆溝橋事變」，積極捐款助中國抗日，日軍因而對華人展開殺戮進行報復，許多華人因而加入馬共對抗日軍。由於日殖民時代，軍警單位仍以馬來人為主，華人和日本人的恩怨，因而以馬來人緝拿華人和華人暗殺馬來人記憶被留存。此後再加上 1969 年的馬來人和華人因選舉結果促成的「513 族群衝突事件」，讓馬來人對華人產生更多忌憚和不安全感。

¹⁹ 馬來人認為馬來西亞的民族／國族應為單一的「馬來人」；華人則認為應為接受不同族群獨特性質的「馬來西亞人」。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共採取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採用 Alex Mintz 的「多元啟發論」，探討三位首相在選舉近在咫尺時和中共的往來，在決策過程關於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考量。Alex Mintz 指出外交政策的中心實為國內政治，因為任何領導人的領導合法性，都得經過國內民眾的認可，因此決策者做外交決策時會優先思考自身的政權保障，之後才思考國家利益。本文率先以多元啟發論檢視拉薩於 1974 年馬中建交、馬哈迪於 1999 年朱鎔基來訪和中國銀行復辦，及納吉於 2013 年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幕的決策過程，就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算計。

第二個步驟採用石之瑜的後華性概念，探討馬來領導人對中共和大馬華人「華人性」認識形成的途徑。石之瑜認為後華性的「華」，不應依據某人的血統或文化認為一個人或群體是否具有「華人性」和其構成「華人性」的元素，而是應以意圖判斷他人是否具「華人性」者的知識體系，主觀認定被解構者組成「華人性」的要素。拉薩、馬哈迪和納吉對馬來亞／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共的「華人性」認識，如何影響包括他們在內的馬來政治精英在 1974 年、1990 年和 2013 年對中共的外交決策，以保巫統和國陣的政權永續，是本論文關心的另一個重點。相關理論和途徑，會在第二章的「理論架構」中，做深入探討。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及調查訪談法。文獻分析法具整理、描述、分類及詮釋的功用，透過系統化的客觀界定判斷事件最接近事實的一面²⁰。本論文針對「認識」作宏觀的解釋及分析，繼而建立本論文的分析架構。此外，本論文也透過報章對三名首相的報導，建立三名首相對中共的認知和認識的脈絡。本論文資料蒐集來源包括台大圖書館、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馬來

²⁰ 尼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說道「沒有事實，只有解釋」；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內也提到「萬物皆變，並無永恆的事實」。本論文認同尼采這項觀點，因為所謂事實或絕對事實，實為分析者站在特定立場主觀解釋的結果，但若站在不同立場解讀同樣的事件就會有不同的事實面貌，因而本論文僅能提出接近事實的研究，無法呈獻絕對事實的「真相」。

西亞外交部、馬來西亞智庫 Institute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資料室、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資料室、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資料室、馬來西亞 The New Straits Times 資料室等，蒐集的文獻計有專書、期刊論文、學術會議論文、官方文件、新聞報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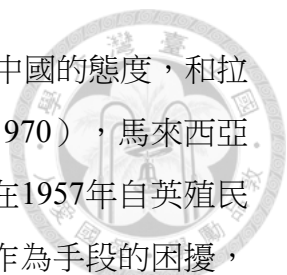
本論文也將透過調查訪談法中的深度訪談法，釐清文獻上關於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共和馬來西亞華人認識不足或語焉不詳之處，以強化本文的深度。本文採半結構性的訪談為主，事先擬定針對各個受訪者職務上差異的訪談大綱，以開放性問題讓受訪者自由作答。訪談對象為曾經擔任檳州首席部長 18 年（1990 年至 2008 年）及首相署部長（2008 年至 2013 年）的許子根，及不願透露身份的政府官員。

第五節 文獻回顧

關於文獻回顧部份，本論文從兩個方面探討。第一個部份為馬來西亞與中共的關係，釐清兩國關係的發展進程和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共認知的形成及轉變；第二部份為馬來人和華人的國族認同／民族認同及馬來人對華人認識相關，以理解馬來領導精英尤其是歷任首相對中共的決策，如何受到本身身為馬來人對華人和中共認知的影響。

如前所述，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大致可分為4類，分別是區域主義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策略層面（Kuik, 2013a）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Baginda, 2016）等。這些文獻幾乎都提及馬中關係的發展深受國內政治發展影響，但提出具體又詳細分析者不多，本論文就相對有深入探討的專書，即是Baginda的「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中國--馬來西亞關係與外交政策），及 Kuik的期刊論文「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馬來西亞的中國政策意義：不對稱、鄰近及精英的本土權威）做出文獻回顧。

Baginda在「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中，以James N. Rosenau的「聯結政治」概念做為框架，探討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和拉薩於1974年促成馬中建交時，國內和國際環境影響對馬來西亞的對中政策影響，同時也引入「政治人格」



(personality politics) 作為變項，探討東姑阿都拉曼親西方陣營仇中國的態度，和拉薩決定和中共建交的因素。由於東姑阿都拉曼執政期間（1957至1970），馬來西亞的國家安全主要依賴英國和大英國協的軍隊防衛，再加上馬來亞在1957年自英殖民地獨立之前，就飽受馬共為了建立「馬來亞共和國」以武裝作亂作為手段的困擾，因此東姑阿都拉曼的親西方陣營政策在冷戰背景下是「可以預測」的。不過對於國內的華人，東姑阿都拉曼的態度卻相當矛盾。東姑阿都拉曼一方面斥責馬共顛復活動、擔心華人協助中共入侵馬來亞，並且曾公開聲明自己並不抗拒共產主義，只是抗拒中共利用國內華人如馬共份子破壞國土疆域，才不願意與中共建交；但另一方面東姑又有許多華人朋友，1969年第三屆選流失許多馬來人選票，就是因為許多馬來選民在反對黨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 伊黨）²¹的宣傳中，認同伊黨所謂東姑阿都拉曼政策過於友善華人立場。就於此，或許可以換一個角度解釋東姑阿都拉曼的對中共和華人態度，其實東姑阿都拉曼並不仇視華人，但對於忠誠於中共的馬共和國族認同／民族認為為中國人者，卻是使他不願意與中共建交、和對中共採取敵對態度的主因。

拉薩執政時期（1970至1976年）則面對北越的勝利伴隨美國從中南半島撤軍，和英國撤走包括馬來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蘇彝士運河以東駐軍的計劃，促使馬來西亞政府必需重新評估國家的外交政策，再加上1969國內發生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事件後，國陣政府於翌年執行「新經濟政策」拉近馬來人和華人的經濟差距（國陣政府認為族群間的貧富不均為1969年衝突的主因），為了減緩華人由於「新經濟政策」的落實對馬來人主導的國陣政府不滿，拉薩於是決定與中共建交，儘管馬來西亞情報部門保持疑慮的態度。Baginda認為Rosenau的「聯結政治」解釋了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對吉隆坡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同時與北京建交或不建交的決策也很清楚展露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領導者的人格化（personalized leadership）。不過 Baginda在運用「聯結政治」做為解釋的框架時，未有進一步解釋究竟是「滲透」、「反應」還

²¹ 伊黨前身原為於 1951 年 8 月 23 號，在巫統舉辦的會議上成立的「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馬來文原名：Persatuan Ulama Se-Malaya）。同年 11 月 24 日，「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易名為「泛馬來亞伊斯蘭協會」（Pan Malayan Islamic Organization），決定以伊斯蘭政黨形式透過民主手段向英殖民者爭取馬來亞獨立後，再帶領馬來亞朝向阿拉意旨的伊斯蘭國目標邁進。馬來西亞成立後，伊斯蘭黨易名為「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 Malaysia, 2018）。

是「模仿」聯結「輸出」和「輸入」的過程，僅把所有歷史事件分別歸納為「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以致Rosenau的「聯結政治」概念並無法做出深入的解釋。此外Baginda提出首相「領導者的人格化」是主導吉隆坡在面對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時中國政策的關鍵因素，不過Baginda也沒有深入分析和探討兩任首相的「政治人格」的特質，僅描述兩人的背景、個人經驗和處事風格。

Kuik 在「*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中指出，吉隆坡的對中國政策是建立在「避險」（hedging）策略，因為吉隆坡在面對具有攻擊能力、攻擊意圖和國力上升的強國中國毗鄰，唯有採取有限的扈從和非直接平衡，才能使馬來西亞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最大回饋」以達「保險」（risk contingency）目的。Kuik 認為小國會被強權吸引或對強權產生恐懼，端賴國內層次的執政精英這個中介變項詮釋，吉隆坡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源自於執政的國陣精英有意透過與中國的經貿和外交關係穩定其在國內權力。近三任首相馬哈迪（1990年—2003年）、巴達威（2003年—2009年）和納吉（2009年至今）雖都曾在公開場合宣稱中國不是威脅，表達對北京友善的態度，不過吉隆坡和歐美強權仍維持軍事合作關係，儘管這些合作都是於冷戰時期簽定，並非針對中國國力和軍事能力日益增強才展開的合作。不過馬來西亞在冷戰後與歐美國家的軍事合作，卻從未言明潛在敵人為誰，Kuik 認為吉隆坡此舉是意圖讓北京和華府相互牽制，使兩者皆無法在亞太地區稱霸。

不過馬哈迪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卻是建立在維護其政權利益之上。1980 年代中旬，馬來西亞因為全球經濟蕭條陷入經濟不景氣，馬哈迪在 1987 年的巫統黨選時，面對黨內對手們連成一氣來勢洶洶的挑戰，主席大位險些不保。贏得此次黨選後，馬哈迪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著重在提高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之上，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共，成為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馬來西亞不容忽視的市場。這樣的經濟務實外交政策，此後也被繼任的巴達威和納吉奉行著。從 Kuik 的分析可以發現，馬來西亞對中的外交政策採取的避險策略，在馬哈迪時代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納吉時代也不惶多讓，其展現的另一面隱藏意義實際上是馬來領袖為了鞏固政權致時馬來西亞在經貿市場上對中共不能轉移的依賴，但為了避免對中共的傾斜影響

主權受到干預，不得不同時發展與歐美其他國家在包含經貿方面的各層面合作關係，以制衡中共可能展現的對馬來西亞政治干涉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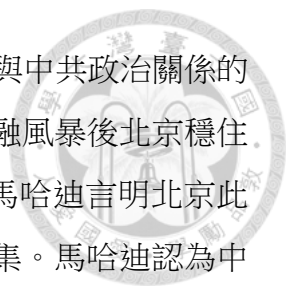
至於把馬中關係以國際層面為主，國內層次為輔探討的，則有周聿峨和胡春艷的「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及 Baginda 的「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馬來西亞對中共態度的轉變，周聿峨和胡春艷的「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做出討論。周聿峨和胡春艷以馬來西亞國家利益為自變項，時代洪流和中國形象的變革為依變項，指出吉隆坡對中共的認知從馬來西亞於 1957 年建國以來，分為「疑慮、恐懼」和「信任」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認知的形成源於國際層次上的冷戰，在華府和莫斯科為首的意識形態差異下，作為前英殖民地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支持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中共則屬於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國內層次上北京與馬共的友善關係和北京的僑務政策，使馬來亞／馬來西亞對自身民主制度和人口結構比率的穩定性產生不安，因而對中共產生「疑慮、恐懼」的態度和情緒。第二個階段為冷戰時期一超多強的國際結構，馬來西亞與東協其他國家為防美國等西方國家侵蝕主權和國家利益採取「大國平衡」戰略，加強與北京和東京等關係；此外馬共於 1989 年 12 月與吉隆坡政府簽署解除武裝遊擊隊協議、北京立法否決海外華人持雙重國籍，及北京未在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從東南亞撤資，在在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排除某種程度的威脅。周聿峨、胡春艷其實忽略「疑慮、恐懼」和「信任」是一種認知形成後隱含在每項國家政策之下的態度表現。Jacob Jarvis 言明決策者對世界的信仰（beliefs about the world）和對他者的印象（image）影響決策者的決定和政策，也即是國家的行為。因此吉隆坡對於中國的認知，按周聿峨、胡春艷「疑慮、恐懼」和「信任」的解讀應修正為從「敵人」到「朋友」的認知轉換過程。此外，周聿峨和胡春艷認為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是一種「認知轉換之深層次原因解讀」，文中認為統治階級都會把階級意志和利益上升至國家意志和利益的水平，而國家制度是保障統治階級／國家利益的手段，因此維護既有的國家制度就是統治階級必要的任務。兩人指出馬來西

亞國家利益是「維護國家穩定以及馬來統治者²²的利益，其他利益則居於次要地位」，因此可能會動搖馬來西亞國家既有制度的馬共和華人，成為會影響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的來源。周聿峨和胡春艷雖然從中共的視角解讀馬來亞／馬來西亞對中共認知的形成和轉變，清楚解釋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互構關係，使得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對中政策更顯立體。

Baginda 在「*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中，與周聿峨和胡春艷的階段分類類似，他把吉隆坡對中共的認知分為 敵意（*hostile*）和友好（*cordiality*）兩個階段。他指出吉隆坡外交政策從親西方陣營到對共產國家開放門戶，是受到英國於 1960 年末期決定撤離東蘇彝士運河駐軍的直接衝擊，目的是減弱馬來西亞親西方陣營的型象。與此同時吉隆坡也極力說服東南亞鄰國也採取和平、中立及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以免大國勢力持續干擾各國國內事務。吉隆坡為了對北京展示善意和作為東南亞國家的表率，在聯合國中鼓吹中共應獲得一個席位，並在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2 年訪問中共後成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東南亞國家。不過 Baginda 指出吉隆坡對中共依舊存疑，縱使吉隆坡與北京建交，但外交政策從根本上依舊親西方陣營，對中共的友好只是建立在國家安全考量之上，他認為吉隆坡此時對中國的態度是稟持著雙軌思路（*dual track approach*）。此外，Baginda 稱吉隆坡對中共的善意也受到國內因素影響，因為拉薩認為此舉有助化解執政黨在 1971 年實施親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引起的華人與馬來人間的敏感情緒，而且拉薩也有意透過與北京建交以使北京與馬共斷交，只不過這項要求並未獲北京同意。

Baginda 提及吉隆坡對中共認知的大轉彎始於馬哈迪內，1980 年代中期馬來西亞面對經濟負成長後馬來西亞看到中國廣大的市場商機，馬哈迪於 1990 年代時表明既不認同「中國威脅」論，還言明中國是個具有極大潛力的經濟體（*economic power*），這主要與馬哈迪相信只要東亞能夠團結，在國際課題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極度亞洲主義」（*Asianist*）思維攸關，因為唯有亞洲能夠自我主張才能正面面對西方勢力的主導。馬哈迪在任內提出的「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和「東亞經濟共

²² 「馬來統治者」在馬來西亞指的是馬來王室。根據此研究上下文的推敲，其所指的「馬來統治者」除了馬來王室外，也包含巫統中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首相。



同體」(EAEC)就是「極度亞洲主義」的一種展現，而馬來西亞與中共政治關係的改善，就是為了減少馬來西亞對西方國家的依賴。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北京穩住人民幣匯率，使包含馬幣在內的亞洲貨幣沒有進一步受到傷害，馬哈迪言明北京此舉讓兩國邁入「夥伴關係」，因為兩國的國家利益有了更多的交集。馬哈迪認為中共對馬來西亞具有認知上的善意，特別是在南海主權爭議上顯露無餘。吉隆坡和北京在南沙群島上有主權重迭的爭議，但當馬來西亞於1983年在燕子礁(Swallow Reef)上駐軍時，相對於北京曾與河內於1970年代為了西沙群島(Parcel Islands)發生軍事衝突、於1980年代再與河內就西沙群島和於1995年與馬尼拉就美濟礁(Mischief Reef)發生爭議，北京在面對與馬來西亞的南海主權問題上，基於兩國越來越密切的雙邊關係因而都輕輕放過。儘管如此，北京的軍事現代化加上未解的南海主權爭議確實也刺激馬來西亞軍事安全層面上的神經，再加上冷戰甫結束未明朗的國際新秩序，促使吉隆坡終究走上軍隊現代化之路。Baginda 於焉覺得吉隆坡對中國雖然在政治層面上的認知是樂觀而正面，但在軍事層面上卻持保留態度。

從 Baginda 的研究中可見，吉隆坡唯有在東姑阿都拉曼的對北京外交政策上是表裡如一。東姑阿都拉曼以後的首相，從拉薩到馬哈迪的對中共政策，都隱含著「雙軌思維」的玩著兩面手法，只不過拉薩任內的「雙軌思維」指的是表面上拉攏中共但實際上傾向西方之意，可是馬哈迪時代雖以「極度亞洲主義」為思想中心並在言語和行動上對中共示好，但卻在武力裝備上以中國為假想敵，這其實也是跨越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另一種「雙軌思維」。

在馬來人和華人研究方面，本論文在文獻回顧上探討 Anthony Reid 的「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馬來人做為現代身份多樣化源頭的認識)、Tan Liok Ee 的「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馬來民族和華人民族的辯論：社群和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1900-1955年的馬來半島)和 Wang Gung Wu 的「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馬來亞的華人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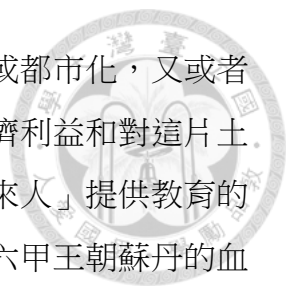
Anthony Reid 在「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對 *Melayu* 這詞的出現，和做為「馬來人／馬來民族」概念的起源做了詳盡的解釋。*Melayu* 是為一個非常古老名詞，最早的文字紀錄在 7 世紀以前就出現，



原先為是蘇門答臘或麻六甲海峽地區某個地點的名字，其後演變成對馬來蘇丹和其支持者的統稱。至於 *Melayu* 做為一個「民族」概念的誕生，則是在英殖民政殖民馬來半島的時候建構的，是被視為新加坡於 1819 年的開埠者的萊弗士（Thomas Standford Raffles）的作為。萊弗士於 1805 年先被派往檳島擔任檳島總督 Philip Dundas 的秘書，在這段時間他開始對「馬來人」的概念產生興趣，並與比他更早投入「馬來人」研究的約翰雷登博士（John Leyden）持有同樣觀點，認為「馬來人」應為散居在蘇祿海和南冰海之間、具有單一共同語言、保存民族特質等，他並將這一想法投稿到英國的期刊中。不過使「馬來人」的概念普及化並讓當事人具共同體想像依據的，是萊弗士把 1821 年首次列印出版、講述歷代帝王儀式、原本名為「諸王起源」（*Sulalatus Alatin*）的書易名「馬來紀年」（英文：*Malay Annals*；馬來文：*Sejarah Melayu*）。至於「馬來人是土地之子」的概念，也同樣是英國人的作為。自從英國人萊特（Francis Light）於 1786 年「發現」檳島後，英殖民者開始對檳島對岸、與暹羅接壤的半島產生興趣，主要原因自然是這個地方物產豐沃並且具有作為跨國經貿據點的潛力。英國人在書寫和探討這個地方時開始使用 *Malay*（馬來）和 *Malayan*（馬來人），代替過往歐洲人慣以「麻六甲」（*Melacca*）²³ 指涉暹羅以南的和新加坡以北的土地，改以「馬來半島」稱之，讓「麻六甲」回歸地方名字以減少混淆。第一本清楚提及「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的是 P.J. Begbie 於 1834 年撰寫的書籍，他的書名使用了「*Malayan*」字眼，隨書附贈的地圖則使用了「馬來半島」，使得馬來人開始對於自身做為這片土地的主人有了依據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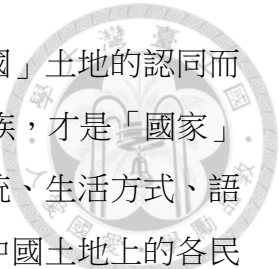
「馬來人」做為民族和族群概念的誕生也是英國人促成。在馬來統治者提供英殖民者經貿之便後，英殖民政府為了確保經濟利益永存，覺得有保護提供這項利益的馬來統治者（或「蘇丹」），和效忠馬來統治者但天性保守散漫的「真馬來人」（*real Malay*），但同時也得確保馬來人的馬來性不會被西化或都市化，要維持他們「接近懶惰」的本性不被改變，以做為和此地華人的區別。Reed 未詳加解釋英殖民

²³ 15 世紀，馬來半島曾經出現盛極一時的「麻六甲王朝」。1511 年遭到葡萄牙攻打後，麻六甲王朝自此消滅。葡萄牙之後，麻六甲又先後遭到荷蘭和英國殖民。由於麻六甲過去的盛名，歐洲文獻在提到半島時也以「麻六甲」稱之。事實上麻六甲原為半島上西南邊的一處地名，是「麻六甲王朝」的首府，也是麻六甲王朝發跡之處，位於現今的柔佛州（*Johor*）和霹靂州（*Perak*）之間，緊靠麻六甲海峽。



維持「真馬來人」特質的原因，但合理推論應為避免馬來人西化或都市化，又或者變成如華人般的勤奮後，就會向英殖民政府索回應屬於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對這片土地的主宰權利，此舉對英國人絕對無益。英政府因而在針對「馬來人」提供教育的學校，特別設計馬來人的起源的相關課程，將這個族群解釋為麻六甲王朝蘇丹的血脈，同時也讓馬來學生閱讀馬來經典著作。在英殖民者精心設計下，許多在馬來半島出生並成長和穆斯林移民學生，開始對這個建構出來的「馬來民族」產生認同感，「馬來人」從一個南中國海上的群島離散（archipelago diaspora）觀念，演變成立基於地理疆界產生的民族。由於馬來文深受梵文的影響，馬來文中用以形容民族的 *bangsa* 原帶有階級之意，在梵文古籍中舉凡沒有 *bangsa* 之人都是出身卑微者，導致在英文理解中原是個中庸字眼的 *nation*，在馬來文中卻成為一個具歧視性的字眼。隨著 1930 年代的馬來報紙對馬來人／馬來民族／馬來國族的渲染，馬來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在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形成，做為對西方和中國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回應，「馬來民族」並被賦予包含土著及擁有這片土地之意。曾有一家馬來報紙回應在此地誕生的華人要求享有政治權力時回應，「馬來人」有這項權力不是因為他們在此成長，而是他們屬於馬來 *bangsa*，並且是此地的第一個 *bangsa*。「馬來民族」的排他性，由此可見。

Tan Liok Ee 在「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中，探討馬來人的 *Bangsa*（中譯：民族；英譯：Nation）定義和馬來西亞華人對「民族」的定義，在內涵和本質上的根本差異。正是這份完全無法對話的差異，影響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和馬來人及華人在此地的關係，儘管 *bangsa* 和「民族」在字面上似乎都在表達英文的 *nation*，但在解釋上卻大相逕庭。Tan 指出在 20 世紀前的文獻中，*bangsa* 是皇族的稱號，但同時也用以代表族群和社會群體，例如馬來人、阿拉伯人、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直到 19 世紀以後，馬來文獻開始展現出馬來人的自我概念，強調 *Bangsa Melayu*（馬來民族）的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和共同語言的排他性立場。在馬來亞獨立前，馬來人主張馬來亞的 *bangsa*，應由單一民族即是馬來人和單一文化即是馬來文化組成。至於馬來亞／馬來西亞的華人「民族」觀念，則深受中國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時的孫中山和梁啟超等革命派的思想啟迪。孫中山和梁啟超對國族主義的解釋在表面上有所分歧 — 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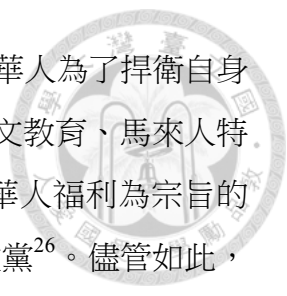
認為「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是同樣的概念，是基於對「中國」土地的認同而產生²⁴；後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團結漢族和各種少數民族，才是「國家」的最適切體現。雖然如此，孫中山也承認中國境內有基於各自血統、生活方式、語言、宗教、習俗和習慣連接的不同共同體（民族），因而也強調中國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平等的。Tan 因而指出，*bangsa* 和「民族」同樣是一種自然構成或無法逃避的共同體，可是當 *bangsa* 和「民族」用於定義馬來亞／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過程之時，前者是一種主張擁有，後者是一種抵抗被主導。很顯然，*Bangsa* 和「民族」在語意上的解釋相互抵觸，但也因為兩者之間都奠基於各自的歷史和文化，使得這兩種觀念在解釋馬來亞／馬來西亞做為一個國家時都試圖取代對方，形成一種權力爭奪和意識型態衝突的局面。

從 Reed 和 Tan 兩人的言論中可以發現，英殖民在建構「馬來民族／馬來人」的觀念時，受限於印尼²⁵當時仍為荷蘭殖民地，因此僅能從語言、傳統特質等塑造，而無法如同「中國人」或「華人」這個民族以固有疆域和「中國」符號構成。這種差異，因而造成後來馬來人在塑造馬來亞／馬來西亞民族或國族的概念上訴諸同化，可是馬來亞／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亞／馬來西亞民族或國族的想像中，是一個能夠包容不同民族的國族。兩個族群從根本上對民族或國族認識的差異，也就形成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後「誰才是馬來西亞人」的爭議，難以達到共識。

Wang Gung Wu 的「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把在馬來亞的華人分為三個組別：A 組別視中國政局發展與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與中國有直接和間接的聯系，並且積極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B 組別對低政治性的經貿和社團組織較感興趣，擅與各類統治階級打交道換取權與利，對國家或國際政治議題極少表態，輕易讓他人留下對政治不感興趣（non-political）的印象，在三個組別中佔大多數；C 組別在三個組別中最為少數，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效忠馬來亞，但對自身的國族身份不太確定，主要為峇峇、海峽殖民地華人及馬來亞國族主義者。不過這樣的分類並不固定的，會隨著

²⁴ 孫中山對「民族」的想法則是全然的 *nation* 概念，因為他有意把「中國」這個國家做為人民政治效忠的唯一焦點，取代傳統對家庭、宗族和地方的效忠意識。

²⁵ 麻六甲王朝全盛時期的領土包含現今的馬來半島和現今屬於印尼領土的部份蘇門答臘，可見得英殖民者建構馬來民族時，仍受到麻六甲時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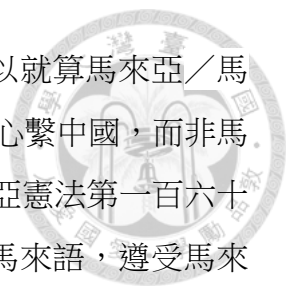
馬來亞政局的發展流動。戰後在籌備英屬馬來亞獨立之時，B組別華人為了捍衛自身在馬來亞獨立後的福利，與C組別華人攜手合作，在公民權、華文教育、馬來人特殊地位等課題上，與馬來人及英殖民母國產生激烈爭辯。以捍衛華人福利為宗旨的馬華公會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從一個社會福利團體轉變為政黨²⁶。儘管如此，由於A組別華人歷來毫不掩飾對中國政局的關注及展開行動，例如在日軍入侵中國的一系列事件中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件」和1938年「南京大屠殺」，因而展開大規模的示威行動、拒買日貨、捐錢捐物資甚至到返回中國參加抗日活動，當地華文報紙更紛紛嚴厲撻伐日本的行徑；此外馬共受到中共在中國大陸上勝利激勵，在馬來半島展開武裝行動意圖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等行為，應而讓馬來人因為少數華人的作法，卻形成華人都是「人在『馬來亞』，心在『中國』」的印象。

Wang Gung Wu 關於馬來人對華人的想法，可從巫統創辦人之一翁惹化（Oon Jaafar）²⁷ 的一場談話中可發現。翁惹化曾經 1953 年公開表示，居住在大馬的華人 98% 效忠中國，剩餘 2% 為共產黨，他並且指控馬華公會雖然是一個馬來亞的政黨，但卻同時扮演著類似中國領事館的角色，此外中國國民黨又透過新加坡中華商會控制馬華公會，馬華公會的目地就是意圖使馬來亞成為中國的第二十行省（崔貴強，2007）。不過 Wang Gung Wu 也指出，A組、B組和C組華人的分類不會固定不動，而是為因為不同的時空背景出現流動的現象。在馬來亞爭取獨立過程，由於攸關華人此後居住在馬來亞的權利和福祉，許多B組華人不再對自己的政治態度秘而不宣，他們流向C組和原本的C組華人，一起捍衛獨立後華人在馬來亞的地位。與此同時，也有C組華人因為面對華人在獨立後可能淪為二等公民的狀況不滿意，因而流向A組加入馬共，以期建立一個不會歧視華人的新國家。

從上述文獻可發現，馬來人和華人在馬來亞的土地上毗鄰而居多年，但是因為對「民族」的定義大相逕庭，兩個族群始終無法對「馬來亞人」做出一個共同

²⁶ 馬來亞華人公會，原名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創辦於 1949 年 2 月 27 日，成立之初本為協助因遭馬共池魚之殃，遭英殖民軍隊滅村後計劃遣返的中國華人留在大馬的社會福利團體，後於 1952 年轉型成為政黨。馬來亞於 1964 年成立後，改名為「馬來亞華人公會」。

²⁷ 後退出巫統組織反對黨的大馬知名政治人物，組成「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曾是英殖民者寄予厚望的馬來亞獨立後的首相人選。



都能接受的定義。如果我們從馬來人的立場看華人，也就明白何以就算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至今 61 年，許多馬來領導精英至今為止仍然認為華人心繫中國，而非馬來西亞。依據馬來人的邏輯，只要華人願意被同化 -- 依據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二款闡明，只要「一個人信仰伊斯蘭教，日常使用的語言為馬來語，遵受馬來人的習俗」，此人就是馬來人 – 就可以成為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的主人，就能夠享用國家保障的所有權力。不過華人即使僅能在馬來西亞以二等公民方式生活也拒絕被同化，在馬來人眼中即是不願意成為對這片土地的主人，不願意承擔對這片土地的责任和義務，馬來西亞自然只是他們暫居或寄居的土地。即然華人對擁有這片土地、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有所保留，也就等同於華人仍舊心繫中國，認同的是「中國民族」而不是馬來西亞民族。這也就解釋了何以馬來領袖在選舉告急需要華人選票時，才會認為打「中國牌」能夠討得華人的歡心，獲得華人選票的支持。

第六節 論文限制

由於本論文內容主要探討首相和馬來政治精英選情告急時，在對中共決策上的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構成的思考模式及他們對華人及中共的認識，本論文的研究主要目的著重在解答相關問題，也因而產生內容和技術上的限制：

1. 除了有其關鍵必要性之外，本論文沒有觸及中共對馬來領導人的思維、態度和反應。
2. 華人對馬來人的認識和在選舉時面對巫統／國陣打「中國牌」的反應和投票的結果分析，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3. 由於馬來西亞唯一一家獨立民調機構遲至 2000 年後才成立，本論文僅在探討第六任首相納吉的章節內採用民調數據，藉以佐證民間對首相個人和國陣政權的態度及反應。
4. 本論文無意涉入「中國」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的探討。本論文在指涉政權時以「中共」稱之，是因應台灣學術界和民間習慣的用法，至於使用「中國」時，則是視中國為一文化概念或做為中華民族身份的認知。

5. 本論文也沒有對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做出深入的解釋，除非論文中特別聲明或標註，否則提及 *nationalism* 時，皆以「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形式呈獻。



第七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有六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文的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分析架構、檢討相關文獻、研究限制和章節安排；第二章介紹 Alex Mintz 的「多元啟發論」和石之瑜的「後華性」途徑；第三章探討馬中建交與 1974 年全國選舉的關連性，並分析馬來領導精英決策過程的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計算；第四章探討馬哈迪未取消朱鎔基在馬來西亞 1999 年全國選舉時的官訪，和「中國銀行」復辦的決策心態；第五章探討納吉於賈慶林訪馬主持「馬中關丹產業園」後的三個月內，舉行 2013 年選舉的算計；第六章的結論則把三位不同世代的馬來首相，對馬來西亞馬華人和對中共認識做一個系統性的梳理。

第二章 理論構造



從 1957 年到 2013 年止，在馬來西亞選舉史中共有三任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及納吉（Najib Razak）為了維護自身政權，在全國選舉前不到 100 天和中共高層領導人互動，或建交或簽署重要的合作方案，藉此引起華人選民的關注，以此做為中共對執政黨政權的加持。三任首相利用外國勢力影響國內選情的行為，在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之間作了何種程度的取捨？此外，馬來領導人對中國的認識是如何形成，並且他們又是如何連結國內華人和中國的認知？Alex Mintz 提出的「多元啟發論」和石之瑜提出的「後華性」，將是本論文用以解釋相關問題的理論架構。

第一節 多元啟發論

Alex Mintz 提出多元啟發論（Poliheuristic Theory），做為一個連接外交決策理論領域兩個主導模式，即理性行為者模式和認知模式的橋樑（Mintz, 2004）。理性行為者模式主張國家是由理性和有遠見的領導人領導，決策時是依據預期效應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也即是極大化政治選擇的預期收益。決策者決策前，對於決策方案的優劣利弊會事先全面評估，再從中挑選能夠承襲過去和未來、帶給國家價值極大化、成本極少化的方案。這個學派的學者計有 Graham Allison、Greg Cashman 等。認知模式主張國家的決策者面對主客觀環境限制時，面對決策方案的價值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一樣會在決策前全面性分析所有決策方案的利益得失，但卻是透過經驗法則做出決策的判斷，是為一種有限理性。主張這項看法者的學者為 Herbert A. Simon、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Jervis 等。多元啟發論認為兩種決策模式，都僅解釋決策的一個面向，理理性行為者模式解釋決策是「如何」（how）形成，認知模式僅回答「為何」（why）形成（Mintz et al., 1997a；Mintz & Geneva, 1997b；Mintz, 2004），兩者都無法完整解釋決策過程從無到有的過程。為了


彌補兩者的缺示，Alex Mintz 和 Geva Nehemia 因而在外交決策領域中，提出一個新穎的概念和一個新創的名詞 *Poliheuristic*，中文即為「多元啟發論」。

Poliheuristic 是個複合詞，由 *poli* 和 *heuristic* 組成。*Poli* 兼具「多種」和「政治」（*politics*）的意思，意指政治人物採用政治單位（*political units*）或政治任期（*political terms*），做為衡量外交決策選項的成本利益及可履行性；*Heuristic* 則含有「啟發式」或「捷徑」之意，指在複雜的局勢及資訊雜亂或有限的狀況之下，決策者習於採用認知捷徑補充資訊缺失的部份，也即是透過經驗累積想像可能發生的結果，繼而將相關資訊加以組織再進入決策程序（Mintz et al., 1997a; Mintz, 2004a）。

壹、政治面向的重要性

多元啟發論推翻政治人物決策是以國家利益做為決策原則的假設，反之，多元啟發論認為外交決策的關鍵要素（*the essence of decision*）攸關國內政治。一般上，決策者關注他們在政治上存活的可能性，例如民調和選舉時取得的支持度、對手和黨員對他們領導地位的挑戰等，都影響他們政治壽命的長短。因此決策者做政治決策時，考量的是公眾的支持及認同，而政治聲望，就是他們政治權力和在位的穩當性指標，也是一個非補償性的原則（Mintz et al., 1997a）。因此，對選項方案後果的認知，成為外交決策的關鍵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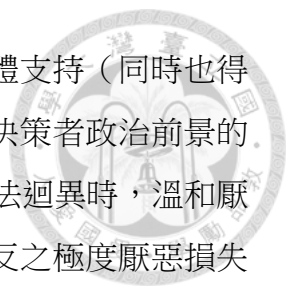
Keller & Yang（2008）挑戰多元啟發論以國內政治解釋外交決策的做法，質疑並非每個政治人物都以政治面向做為決策的唯一依據，因為他們認為，有些政治人物的決策是與意識形態或特定任務相關。他們以冷戰時代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子飛彈瞄準美國南方後院的古巴危機為例子，指出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和「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EXCOMM*）的決策考量重點，是避免核子戰爭為原則，甘迺迪因而拒絕空襲和入侵的提議，但這樣的決策卻會使甘迺迪看起來太過軟弱不利選情，尤其是此事是緊接著豬羅灣事



件²⁸之後發生，由此他們便反證出甘迺迪並沒有在考量國內政治。Keller & Yang 的說法忽略的是，倘若甘迺迪選擇激發核戰以使自己看起來並不軟弱的後果，是三分之一地球將被夷為平地，而美國也被摧毀，因此也將沒有後續的甘迺迪政權之說，若美國未被摧毀，核輻射的後果造成美國民眾的生靈塗炭，甘迺迪必然遭到美國民眾譴責，政權也一樣無以為繼。因此，在 Keller & Yang 口中所謂甘迺迪假如根據多元啟發論就應該會擔心自己的軟弱形象影響政權延續，而理當挺而走險的推斷，似為過激之論。其實多元啟發論所言，是立於「對選項方案的後果認知」，Keller & Yang 眼中軟弱的甘迺迪，正好是一種對後果的深謀遠慮。此外，Keller & Yang 所謂的政治人物做決策是基於某個使命或遵奉某個意識形態，忽略了政治人物的特性，若政治人物不考量政權的延續性，就不會選擇當政治人物，而是當義工或神職或其他職業，除非是這名政治人物已無心戀棧，才會在做決策時不以國內政治因素和關鍵選民的意志為考量重點，或者政治人物錯誤評估形勢，認為這是他的關鍵選民所希望他執行之事，又或者他相信關鍵選民或許不滿意他的決定，但在他執行後選民必然會認同他的決策。至於甚麼樣的條件影響決策者做出無關政權延續的決策，則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

多元啟發論指出，在決策過程中，通常會有三個角色存在：提供專業意見的顧問（團）、非專業但對民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及非專業政治決策者或中間選民，而這三個角色對決策方案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Dacey & Carlson, 2004）。專業決策者的決策建議通常是基於數據分析，和預期價值效應的最大化回報；但是非專業但對民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和中間選民，則因為無法如同專業顧問般掌握細微資訊代表的意義變化，因此通常都會和前者的專業意見相左。儘管如此，對民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在從政生涯中培養了比中間選民更準確的預測決策產生後果的能力，Dacey & Carlson 再把他們分為「溫和厭惡損失型」和「極度厭惡損失型」。在心態上，決策者一般偏向於採取避免個人政治生命失敗的決策選項，而非選擇能達到成功的決策選項的思維模式；操作上，決策者則偏向依據關鍵選民偏好，

²⁸ 豬灣事件發生在 1961 年 4 月 17 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入侵卡斯楚領導的古巴行動。執行任務的是在美國流亡的約 1400 名古巴人。美國入侵古巴後，卡斯楚僅用了三天就打敗入侵者，死亡人數約 100 人，被俘人數約 1200 人（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018）。




順從這些選民的意向做決策，因為唯有相關決策獲得重要選民群體支持（同時也得獲得政黨內部的支持），才能保障決策者的政治聲望，才能保障決策者政治前景的存活（Mintz, 2004a）。因此，當專業顧問提供的意見與選民的想法迥異時，溫和厭惡損失型的決策者的決策結果，通常落於專業顧問和選民之間；反之極度厭惡損失型的決策者，決策結果則會偏向選民的喜好（Dacey & Carlson, 2004）。

不過，這並不代表決策者完全無視或忽視國家利益。按多元啟發論的兩階段決策，決策者做決策時第一階段是按政權利益為決策准則；第二階段是按國家利益為決策准則，也即是說政權利益考量雖然置於國家利益之前，但國家利益並未全然被犧牲。決策者在思考他們的決策行為帶來的國內政治後果，確保他們的政途或政權無虞後，就會開始檢討相關決策對國家利益的影響性。因此按多元啟發論的決策模式，在決策過程中政權利益和國內利益是互補的，每一項決策結果的差別，或許僅是政權利益和國內利益的比重不一，因為倘若決策者完全忽略國家利益的考量，導至大部份選民的生命、財產、人身安全等利益受到威脅時，這些決策者也一樣會被選民唾棄，以至政權和政治生命不保，因此國家利益必然是決策者決策的一環，但並非如現實主義認知的唯一考量。換句話說，縱使決策者的決策有時看似是受到外在情境例如國際安全因素影響（Keller & Yang, 2008），但也是基於國家安全等國家利益前提下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條件為考量，才能確保人民對其政權的繼續支持。換句話說，表面上雖然有些領導人的決策，看似為了更宏觀的國家利益考量，實則仍舊擺脫不了看不見的政權利益算計。

貳、兩階段決策過程

多元啟發論首次於 1997 年由 Alex Mintz 和 Geva Nehemia 於「外交決策的多元啟發論」提出，集合了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控制論模式（cybernetic model）的理性決策及認知心理學的重要元素（Mintz etl., 1997a）。預期效用理論和控制論模式主張決策者採「補償性原則」，即是決策者就每個選項的優點和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代價，以個人的主觀和過往經驗評分，取得最高分數的方案脫穎而出，儘管這項方案可能在某個層面（例如政治層面）所得的分數較低，但只



要能在另一個層面（例如經濟）能取得高分，相關方案就被視為能夠被補償而獲得青睞（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0；Ostrom and Job, 1986）。不過多元啟發論卻發現，政治領袖做決策時，是依據政治原素和政治後果為決策標準的「非補償性原則」（noncompensatory）（Mintz et al., 1997b）。Mintz 和團隊（Mintz, 1993；Mintz, 1997a；Mintz et al., 1997b）經過實驗後發現，決策者做外交決策者通常經歷兩個階段：在決策的第一階段採取非整體性（nonholistic）和非補償性原則，透過面向基礎（dimension based）（例如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評估所有方案後，從選擇集合（choice set）中剔除不符合面向標準的方案；在決策的第二階段，則採跨方案方式做決策的簡化過程。在這兩階段的決策過程中，有 5 項顯著的特質需要關注，分別是非整體性、面向基礎、非補償性原則、滿意原則和排序的敏感性，以下略述此五項特質：

- （一）非整體性 – 外交決策涉及的人事物通常錯綜複雜，並且都有時間上的限制，以至於決策者在決策前難以獲得周延的資訊，因此國家領袖這些決策者在日常的決策環境中，僅能按經驗法則採簡單的啟發式做決策。非整體性因此意指決策者並非透過細緻的和有理性的思考，而是以一個或數個面向做為標準，刪除未符合面向基礎的方案後，再徹底比較所有剩餘的方案後，選擇能帶來預期效應最大化者。
- （二）面向基礎 – 受到主客觀環境影響，在每次的決策過程中，決策者決策的時間長短不一，相關單位提供的資訊也未必有一致性。決策者因此採取關鍵面向，做為在第一階段決策時是否要刪除相關方案的決定，若某個方案未達關鍵面向的門檻要求，就無法被保留到第二個階段。在多元啟發論中的決策過程中，政治面向是永恆且唯一的關鍵面向。
- （三）非補償性 – 非補償性原則指的是，若特定方案在政治面向形成傷害，縱使在其他面向例如經濟、外交、軍事等取得高成就，是無法補償或抵消決策者這些政治領袖的政權損害，因此相關方案在第一階段決策就會被剔除，無論相關選項是否會為國家帶來最大的利益。在此所指的政權損害，包括（但不限）組織內競爭、黨內競爭、政治聯盟的結構、選舉效應和民調。透過非補償性原則在第一階段刪除的決策方案，並非每次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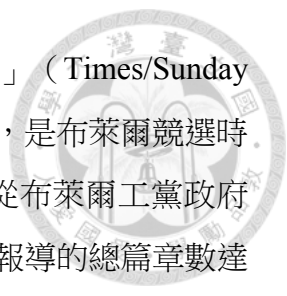


會刪除到最終只剩一個選項，有時仍有幾項達到要求標準者，那麼它們就會一起進入第二個決策階段，透過相對理性分析優劣利弊，再選擇出最適方案。

(四) 滿意原則 – 從以上特徵可見，決策者決策並非以功效極大化做為決策標準，而是在訊息不完善或時間限制等因素中，選擇決策者已能接受、已充分滿意而非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案做為決策結果。在真實世界中，並沒有所謂理想的決策環境或決策條件 (Suedfeld and Tetlock, 1972)，而這些不夠理想的決策環境或決策條件，促使決策者做決策時的理性受到主觀和客觀因素的限制。

(五) 排序的敏感性 – 決策者的決策方案選擇，會受到決策方案的排序影響。Mintz 和 Geva 發現，除了決策方案被提呈和描述的方式會影響決策者剔除或選擇特定方案的機率，相關方案與各種面向如外交、經濟、軍事、政治等關連性的提呈順序，也會影響其被保留或刪除的命運。

儘管如此，卻有一種特殊狀況是決策者做決策時是僅依據國家利益做考量。一般上，決策者在做外交決策時會率先將相關外交事件，分辨為會對關鍵選民形成高顯著性 (high salience) 或低顯著性 (low salience) 事件，若是前者就會採多元啟發論主張的兩階段決策，若為後者則無需考慮會造成國內政治後果的因素 (Oppermann, 2014)。不過關於事件的高顯性和低顯性的測量標準是難以被量化的，一般上僅是決策者透過不同事件的相對性，自由心證的評估選民對特定事件決策結果的反應。此外，也有一些外交事件發生時未必會引起選民關注，或僅有極少數選民持反對意見時，決策者也會直接跳過刪除不利政權方案的階段，直接做出極大化國家利益的決策。Oppermann (2014) 提出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就任首相之初，於 1998 年和法國共同發表的「聖馬洛宣言」(St. Malo Declaration)，徹底翻轉英國原本反對建立歐盟自主軍隊，和 1997 年 10 月宣佈暫時不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兩項歐盟政策作為個案探討，支持上述論點。布萊爾政府有成為歐盟組織中「主要伙伴」(leading partner) 的野心 (Blair, 1999)，可是布萊爾在這兩項政策的立場卻完全相異。在 1998 年 12 月簽署「聖馬洛宣言」之前 6 個月，英國國內 4 家主要平面媒體「衛報」(The Guardian)、「每日郵報」/「星期日郵報」(Daily Mail/Sunday



Mail)、「鏡報」(Mirror)和「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Times/Sunday Times)，相關新聞報導總共 144 篇。至於「歐洲單一貨幣」課題，是布萊爾競選時曾主張「原則上」加入，但事前將舉行公投為這項政策背書。但從布萊爾工黨政府於 1997 年 5 月上任直到 10 月做出宣佈間的 6 個月，上述 4 大媒體報導的總篇章數達 680 篇，持正反意見者都不在少數。由於民間對建立歐盟自主軍隊的幾近沒有反應，布萊爾政府在成為歐盟「主要伙伴」前題下，毫無困難的推翻保守黨政府原先的反對立場；可是「歐洲單一貨幣」在民間引起的支持和反對聲浪熾熱，最終布萊爾宣佈暫緩加入及暫緩舉行公投，儘管布萊爾事前曾經公開聲稱，若沒加入「歐洲單一貨幣」市場，將影響英國成為歐盟組織中「主要伙伴」的角色。從上述兩個例子清楚可見，領導人在面對低顯著性課題如布萊爾政府在建立歐盟自主軍隊的決策，就能夠不受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反之在高顯著性課題如布萊爾政府在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決策，則會為了保障政權利益受到國內政治因素影響，雖然這項決策違背了原先的原則。

參、小結

多元啟發論認為國內政治為外交決策的關鍵，國家利益並不是決策者的唯一考量。外交決策有兩個項段，第一階段是以決策者的政治生命為考量基礎，即是決策者個人的政權同時也包含所屬的政黨政權，因為在民主社會中，特別是內閣制國家，決策者決策時必會思考個人的政治聲望，若政黨考量未被照顧因而在選舉時無法在國會中取得一定的國會議席，則個人政權將隨著政黨政權一起失勢。唯在到第二階段決策時，決策者才會在第一階段已經符合個人和所屬政黨政權利益的延續方案中，經過評估和思考才選擇最能極大化國家利益的方案。也即是說，外交決策並非如傳統模式主張的線性模式過程，而是一種垂直性的模式。多元啟發論也發現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是採取多元的決策策略，即是認知性的和理性的分析，但這些決策行為都是基於環境和資訊的非整體性促成。最終決策者僅能選出最滿意方案，而非最佳解決問題方案。



第二節 後華性

「華人性」的研究，歷來都和中國做出聯結（王賡武，2000），透過血源、文化、傳統等對身份認同形構的過程，探討海外華人對於中國的歷史記憶，因此「華人性」，也稱為「中國性」或「中華性」。不過因為不同國家華人的「華人性」都受到當地文化、社會結構、法律約束和政治制度影響，以至於這些國家或不同地區的「華人性」，既不是全然相同但又不至於無法辨識（石之瑜、李慧易，2017），王賡武（2000）和古鴻廷（1994）因而主張海外華人不能也不應被視為一個群體。可是這些華人之間，甚至於與中國人之間是透過甚麼途徑或方式互為辨識彼此的「華人性」，卻是「華人性」研究從未解答的，石之瑜提出「後華性」，即是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壹、一種身份的共同想像

如前所述，「華人性」受限於地域、在地文化、社會結構、法律約束和政治制度影響，以至於各地的「華人性」都有一套獨有的組成元素，並且也能獲得其他國家的華人、非華人和中國人辨識，以至「華人性」始終沒有一個能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後華性」做為一個意圖同時取代中國和「華人性」的概念，因而拒絕在本體論對中國和「華人性」的內涵和定義做出論斷，而交由互動中的行為者定義彼此皆認同的「華人性」元素（Shih, 2018a）。

在「後華性」的概念中，「華人性」的內涵會因應互動組合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意義，華人性因而有變遷且不同的意義。縱使一個未具華人血源者，只要掌握構成「華人性」的部份元素，策略性的向被認知為擁有「華人性」的互動對象展示，其「華人性」的部份也可能獲得互動對象接納（Shih, 2018b）。簡言之，「後華性」認為，「華人性」是一種可以透過政治化或文化準備獲取，是一種「同時具備共同身份的想像及差異政治的再確認」（石之瑜、李慧易，2017）。此外，「後華性」也關注互動中的雙方或多方行為者如何相互識別、重新連結或切斷彼此的「華人性」。

或「非華人性」的機制 (Shih, 2017; Shih, 2018b)。



貳、華人性為社會角色 (social roles)

在「後華性」概念中，「華人」不是一個固定的身份認同，而是一個社會角色認同 (Shih, 2017b)。中國人與華人為一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於地域疆界劃分而來的公民身份，是一種國家認同；後者包括散居中國以外的各地的公民，他們對自身或彼此的中國人的血源或文化的認同。相對於對國家認同的穩定性，「華人」是依據時空與對象的需求，連結或放棄的一種「身份」，這種欠缺壟斷性的特質，使得「華人」更適合被歸類為社會角色 (social role) (Shih, 2018b)。舉例而言，在面對馬來西亞憲法保障的馬來特權使得利益受損的議程時，馬來西亞華人就會形成一個抗議政策不公平的主體，爭取公民平權的權益，這樣的主體身分猶如是這個議程上專有的角色；但當菲律賓阿布沙耶夫叛軍闖入馬來西亞沙巴州 (Sabah) 的西巴丹島 (Sipadan) 擄人勒索時，馬來西亞國民群起斥責叛軍的作為，此時的主體為「馬來西亞國民」，「華人」角色因而模糊不復見。

參、「華人性」是一種互為認知的標準

「華人性」研究文獻未曾回答各地華人或非華人互動時，是如何辨識對方同為華人再進一步相互承認，又或者否認自己或對方為華人。石之瑜在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 Chinese Studies: Emerging Post-Chineseness) 中提出「後華性」 (Post-Chineseness) 概念彌補這一缺失。國際關係分析層次中屬於「個人」層次的「後華性」，主要探討個人或群體在共同的時空脈絡中，相互承認具「華人性」的過程，因此「華人性」的相互辨識過程有脈絡可循，這些過程不斷開展便擴大「華人性」意義，如今不再拘泥於血源性的「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²⁹刻板印象的限制。華人在搜尋彼此間文化資源的共同性時，因為身處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他


²⁹ 1978 年台灣歌手侯德健創作的歌曲「龍的傳人」歌詞，傳唱於中港台和海外華人社群間的愛 (中) 國歌曲，定義了身為華人在外觀上應具備的條件。

們聯結的元素必須隨之調整，也使得兩名相互認知具「華人性」的標準，未必得以用之於與第三者相互識別，石之瑜因而指出「華人性是一個相對於實質性概念的過程概念」。「華人性」在「後華性」的框架下，因而也是一種有如角色般對自我的「華人性」和對另一方「華人性」的認同。



肆、華人性中的局內人、中間人和局外人

在後華性的概念中，「華人性」並非與生俱來或命定的身份，而是一種主動選擇的角色認同或策略性的反身角色認同（*reflexive altercasting*），以期待獲得他者認同的過程（Shih, 2018b）。石之瑜把前者稱為「局內人」，後者為「局外人」，而在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又有一種「中間人」（Shih, 2017）。「局內人」對自己身為「華人」的認同毫無懸念，主要因為自小受到家庭這個初級團體及日後學校、宗教社團和工作的次級團體的中華文化價值的教養和薰陶，是一種被外力塑造為「華人」再經被驗證肯定後，自我認定的「華人」。對於自我認同「華人」者，若其展現的華人性不得不到所認同的華人群體所接納時，會對自身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繼而對自己的「華人」角色認同產生動搖。「局外人」是並不認同自己具「華人」角色者，他們或許具華人血源也或許完全沒有，但他們的認同與中國和中國文化毫無瓜葛，他們的其中一項認同或許是內化自所屬的國籍。「局外人」一旦展現其想像或認為的「華人性」，必然是策略性的原因，以此符合對象群體（*alter group*）的期待，例如「局內人」或「中間人」對「局外人」或許擁有的「華人性」的期待。「局外人」透過其所具有的「華人性」展示，獲得對象群體的認可、喜好、接納、肯定、稱讚，以達到政治或商業目的。舉例而言，在角色認同上為澳洲白人的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澳洲國立大學就讀期間主修華語和中國歷史，因而競選期間若到華人社區宣傳造勢時必以中文演講。他以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展現其「華人性」，與滿足華人選民做出心理上的連結，繼而取得華人選民認同認可及接納，然後反映在投票行為上。在「後華性」的概念下，血緣無法壟斷「華人性」的話語權，任何人只要展示他們認為的「華人性」特質，並獲得互動對象的認可及回應，即已達到目的。



「中間人」是同時具有「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華人性」特質，「中間人」即認同自身的「華人」角色，也認同其他如國籍賦予的公民角色認同。不過「華人」角色認同雖然與其他的角色被混為一體，但這些角色包括「華人」在內，卻又能被當事人或互動的對象獨立感知，端視「中間人」在與異己群體時展示的角色特性。

伍、六種華人性的分類

在局內人、中間人和局外人之下，石之瑜再把「華人性」分 6 大類，分別是文化的華人性（局內人）、經驗的華人性（局內人）、漢學的華人性（中間人）、族群的華人性（中間人）、文明的華人性（局外人）及科學的華人性（局外人），以下略述各項內涵（表 2-1）：

- （一）文化的華人性 -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被認知為具有「華人性」的文化或宗教信仰系統，例如儒家傳統、膜拜祖先。
- （二）經驗的華人性 - 長期與自我認知為「華人」的群體相處和互動，因而即使生活與文化價值未必掌握周邊華人的立場，仍能對華人的言行好惡充分實踐模仿。
- （三）漢學的華人性 - 能夠溝通及解釋想像的華人與非華人群體間各自文化信仰，例如非儒家漢學者和基督教漢學者的差異者。
- （四）族群的華人性 - 在非中國領土和中國領土之間，不斷受到雙方檢視是否具有差異性，因而演化出不斷因應調整的能力，應對雙方不同期望與習慣。
- （五）文明的中華性 - 對「華人」角色即不認同，也沒有經驗性的認識，僅透過自身文明的標準辨別「華人」與自己的異同，主要透過兩者的差異性妖魔化或浪漫化「華人」，形成以想像的「華人性」為參照的自身認同。



(六) 科學性的中華性 – 對「華人」角色並不認同，系統性的憑藉某種客觀標準，如公民身分、階級身分、血緣身分等普遍標準，透過對「華人性」的界定能力，來實踐自己的身分意識。

表 2-1：「後華性」的「華人性」分類表

局內人	中間人	局外人
文化的	漢學的	文明的
經驗的	族群的	科學的

資料來源：Shih, Chih-yu (2017: 8).

陸、小結

「海外華人」研究雖然承認居住在中國以外的華人，因為受到在地國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影響，因而形成各自獨特的「華人性」，並認為海外華人不能視為一個群體，可是卻沒有說明這些「華人」個體之間，在沒有沒有一致及普遍性的「華人性」認可標準下，如何互為辨識彼此為「華人」的過程。石之瑜提出的「後華性」概念填補這方面的缺失，認為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華人」，是在彼此互動過程中展示各自想像的「華人性」，做為認知對方為華人或不是華人的判斷。至於必須展示多少的「華人性」元素，才能被判斷為「華人」或具「華人性」，則端賴互動者之間的認定。「後華性」更進一步提出，「華人性」是可以透過後天學習如系統性研究和常識判斷取得，血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熟悉，未必即為具備「華人性」的唯一標準。對「華人」角色認同者一般為透過文化傳承，石之瑜稱其為「局內人」，此外長期與「華人」群體相處經驗認識「華人性」，並不吝於對外展示自己對「華人性」的實踐者，也是「局內人」；「中間人」則為能夠以漢學知識提供雙方對彼此差異性的溝通理解，又或者能夠協助中國「華人」與海外「華人」在文化和功能上對差異的溝通；「局外人」則為對「華人」角色不認同，但卻透過

自身文明標準或系統性的研究而以「華人性」為自己的參照。「局外人」若展示其「華人性」一般上都有略策性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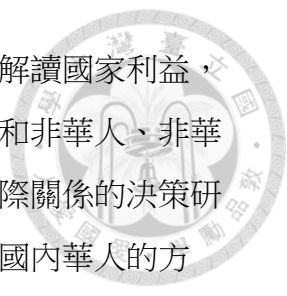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多元啟發論與後華性的關聯

多元啟發論是個決策理論，主張決策者在資訊複雜和承受極大時間壓力的環境中做決策時，依賴認知捷徑補充資訊缺失的部份；後華性是探討行為者對他者的華人性認識及本身的華人性自然的或策略性的展示。在探討馬來西亞馬來領導精英於選舉時，認為透過打「中國牌」就能吸引華人選民的決策認知，若沒有分析馬來領導精英的後華性，就無法瞭解馬來精英在眾多決策選項中做此決策的原因；同樣的，若僅探討馬來領導精英的後華性，未把相關研究置於馬來領導精英做決策的過程，就無法得知相關認識在他們的外交和國內政策決策的影響力，並且讓他們表面上看似為了維護政權利益犧牲國家利益，但實則又不盡然。因而若要得悉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國認識，尤其是在選舉時政權的維系，多元啟發論和後華性概念是具互補性的兩個理論／概念，缺一則無法解釋全貌。

至今為止，學界先進未有就馬來領導精英，在 1974 年、1999 年和 2013 年選舉打「中國牌」做系統性的探討，並且也未有關於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國認識的研究。本論文因而從原本應自馬領導精英對中國認識的探討著手，再檢驗這份認識影響馬來領導精英在選舉決策上打「中國牌」的行徑，對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影響的程序採相反的討論順序，減輕閱者在閱讀上的困擾。

第四節 總結

政黨政治中，政治人物為了維護自身政權，在做決策之前必然先考慮相關決策對自身政權的影響性。不過政權利益始終不能獨立於國家利益之外，因為人民並非毫無判斷能力的盡為國家領導人或政治人物愚弄。不過國家利益在某個程度上，確



實是由國家領導人和執政黨定義，繼而引導民眾從黨派利益的視角解讀國家利益，則是無可否認的了。「後華性」的概念得以分析華人和華人、華人和非華人、非華人和非華人，及中國和非中國之間識別彼此的方式。這項識別在國際關係的決策研究上得以解釋國家行為者決策動機，並且也能分析出政治領袖識別國內華人的方式，繼而如何展現在對中國的決策上。

馬來西亞的政治領導在制定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時，考量到華人的選票，這可以靠多元啟發論所提示的分析角度所掌握。他們認為對華外交可以吸收華人選票，當然涉及到他們對華人的理解，也涉及他們所想像的華人與中國之間有何關係，者可以靠後華性的分析角度來掌握。

第三章 1974 年的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



1974 年 5 月 30 日，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北京簽署馬中恢復正常關係聯合公報，宣佈兩國從翌日起正式建交（南洋商報，1974a），正式終結馬來亞在東姑阿都拉曼時期對中共抱持長達 13 年的敵視態度。其實早在馬來亞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前，中共就曾表達與馬來亞建交的善意。可是中共的海外支部馬來亞共產黨，從 1940 年代開始就長期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固有體制，以期達到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的目標，這些武力活動並且獲得中共精神上的支持，使得東姑阿都拉曼遷怒中共拒絕建交，因為東姑阿都拉曼覺得若對中共表達一絲善意，就等於認可馬共的暴力行徑。在他任內 13 年，東姑阿都拉曼從不掩飾他對中共的仇視態度，但他始終多次澄清，他並不反對共產黨，只是反對試圖干預馬來西亞內政，影響馬來亞／馬來西亞國家安全的共產國家。不過隨著英軍決定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駐軍撤出、美國決定從越南撤離、主張中立不結盟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在印尼成立等國際環境的變化，東姑於 1967 年起對中共的態度開始融冰，但他依舊堅持中共必須尊重馬來亞主權的這條底線，兩國才可能建交。曾在東姑阿都拉曼任內擔任副首相的拉薩，在對中共的態度上和東姑完全一致，無論是敵視或不排除建交的可能性。不過到拉薩於 1970 年 9 月 22 日就任首相職後，馬來西亞才真正開始與中共接觸，試探兩國建交的可能性。

學界目前從兩個觀點分析馬來西亞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一）國際關係層面；及（二）聯結國際和國內政治層面。從國際層面而言，英軍和美軍的撤離使區域陷入缺乏強大的西方軍事力量，馬來西亞擔心若持續親西方陣營政策，會招致共產國家敵意繼而使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趙立海，2005；Saravanamuttu, 2010）；聯結國際和國內政治層面則認為，除了國際局勢的演變，國內政治發展如 1969 年第三屆全

國選舉執政黨聯盟³⁰ (Alliance) 首次失去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選舉數日後發生的族群衝突「五一三事件」等，都給拉薩擔任首相後為馬中建交埋下伏筆 (Baginda, 2002; Liow, 2009; Kuik, 2013a)。不過，無論學者們從哪一個觀點分析，他們都達到一個共識——馬中建交符合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唯獨 Baginda 在其 2016 年的著作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中國—馬來西亞關係和外交政策) 中提出，馬中建交並未給馬來西亞帶來實質利益，充其量只是讓做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馬來西亞，在東協成員國間「贏得信譽與威望」。至於馬來西亞選擇在 1974 年 5 月 31 日和中共宣佈建交，是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³¹ 特意安排以便在 1974 年第四屆全國選舉中，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若是如此，馬中建交究竟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為國陣政權利益還是兩者皆有之，是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建交前的國際背景

馬來亞從英國殖民地的身份獨立前夕，中共主席毛澤東致賀電給馬來亞最高元首端姑阿都拉曼 (Tuanku Abdul Rahman)，而總理周恩來則致賀電給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表示承認馬來亞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意與馬來亞建交 (南洋商報, 1957a)。東姑阿都拉曼堅定的拒絕與中共建交，也拒絕邀請中共代表參加獨立慶典。東姑阿都拉曼這項決定並非臨時起意，其實早在當年 3 月他就已經公開表明立場。在一封給馬來人統一機構 (United Malayan, 巫統) Setapak 分部，要求邀請共產國家參加馬來亞獨立大典的回函中³²，東姑阿都拉曼清楚言明馬來

³⁰ 成立於 1952 年的聯盟，是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的前身。聯盟最初僅是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巫統) 和馬來亞華人公會，為了因應 1952 年市議會選舉組成的政黨聯盟。爾後馬來亞印度國民大會黨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也於 1954 年加入聯盟，與巫統和馬來亞華人公會攜手迎戰 1955 年在馬來亞首次舉行的「聯合邦立法議會」選舉。

³¹ 國陣的前身為聯盟，除了聯盟原本的三大政黨，另外再加入六個政黨，形成一個 9 個成員黨的政治聯盟。民政黨 (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人民進步黨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和泛馬來亞伊斯蘭協會 (Pan Malayan Islamic Organization) 於 1972 年加入；沙巴民族統一機構 (United Sabah Alliance)、砂拉越人民聯合黨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及土著保守黨 (United Bumiputera Heritage Party) 則於 1973 年加入。國陣後於 1974 年 6 月 1 日註冊為一政黨聯盟，參與同年於 8 月舉行的第四屆全國選舉 (南洋商報, 1974c)。

³² 巫統 Setapak 分部擔心若沒有邀請共產國家參加馬來亞獨立慶典，可能會觸怒蘇聯，使馬來亞加入聯合國的機會被蘇聯動用否決權阻攔 (南洋商報, 1957b)。

亞自 1948 年以來就陷入馬共作亂的緊急狀態³³，緊張狀態之所以遲遲無法結束，就是蘇聯和中共一再於精神上支持馬共之故，因此若邀請共產國家參與獨立慶典，著實有愧於在緊急狀態中犧牲生命保護國家的青年，除非馬共在此之前停止所有武裝顛覆行為並「投降及交出武器」，才會考慮邀請共產國家出席（南洋商報，1957b）。東姑阿都拉曼的敵意不僅僅對中共和蘇聯展露而已，做為一個新生國家，馬來亞／馬來西亞在獨立的最初 9 年，都未與任何共產國家建立邦交，一直到 1967 年因為受到國際環境的壓力，馬來西亞才開始與共產國家建交。

壹、從親西方外交政策到中立不結盟

東姑阿都拉曼從擔任首相職以來，不只一次公開宣稱他不反對共產主義，只是反對破壞馬來西亞內部國家安全的共產國家，可是馬來亞／馬來西亞未與共產國家建立官方關係都看在國際社會的眼裡，中共更不只一次公開指責馬來亞／馬來西亞是西方國家的傀儡（Baginda, 2016）。馬來亞／馬來西亞這種言行不一的行為，使得認同 1955 年萬隆會議精神³⁴（Bandung Conference）的馬來亞／馬來西亞，因而受到第三世界國家和共產國家貼上親西方陣營的標籤，並且遭到不結盟運動國家的排擠。先是馬來西亞於 1964 年未被邀請參加在開羅舉辦的第二屆不結盟運動會議（The Straits Times, 1964），之後又有由巫統國會議員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領軍的非官方代表團於 1965 年提出申請加入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會員遭拒（The Straits Times, 1965），接連發生的兩起事件引起國內廣泛關注和討論，使得政府不得不開始檢討馬來西亞親西方外交政策的利弊（Saravanamuttu, 2010）。

³³ 二戰結束後，馬來亞經濟陷於困頓。英政府對當時的激進工潮採取鎮壓，導致時局逐漸失控，衍生了許多暴力事件，馬共因而號召民眾加入反殖民運動行列。隨著 1948 年 6 月 16 日在和豐發生 3 起馬共武裝分子殺害歐洲籍礦主的事件，英政府立即頒布緊急法令實行軍管，防止局勢惡化。緊急狀態直至 1960 年 7 月 31 日才解除，12 年內共有 1 萬 1073 人死亡（The Straits Times, 1960）。

³⁴ 萬隆精神指的是於 1955 年 4 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三世界國家會議，與會的大部份國家來自亞洲，馬來亞因為仍是英屬殖民地僅以列席身份出席。萬隆會議有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的完整與主權、不侵略、不干預他國內政、公平與互利及和平共處。（Evans, Graham & Jeffrey Newnham,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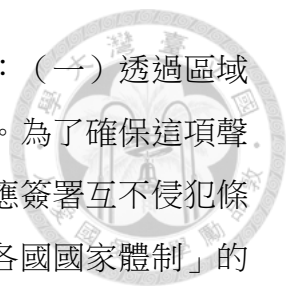


不過，促使馬來西亞政治人物更積極檢討馬來西亞親西方外交政策的原因，當數英國當局開始討論撤離駐紮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軍隊的程序。步入 1960 年代後，英國的經濟和財政越形惡化³⁵，為了減少開支，時任英國國防部長 Denis Healey 於 1967 年 4 月 27 日拜訪馬新兩國領導人，探討英國政府或預計於一年內撤走駐在新加坡 5,000 名和馬來西亞 10,000 英軍（The Straits Times, 1967a）的時間表，以及兩國之後的防衛策略和安排。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的國防安全主要依賴英軍，英國這項決議使馬來西亞頓時陷入國防危機。1967 年 7 月 19 日，英國正式宣佈將於 1970 年代中旬撤離蘇彝士以東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軍隊（The Straits Times, 1967d），6 個月後英軍宣佈將把撤離時間表提早到 1971 年（The Straits Times, 1968a）。對於英國將撤離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駐軍的即定事實，馬來西亞從不掩飾對於失去英軍護衛家國的憂心。東姑阿都拉曼曾於 1968 年 1 月 28 日悲觀的表示「馬來西亞沒有足夠的防衛能力抵抗大國攻擊，雖然我並不認為中共會攻擊我們，但如果此事真的發生，我們將選擇投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除非我們能獲得類似馬來西亞面對印尼對抗時的協助」（The Straits Times, 1968b）。在這方面，拉薩和東姑阿都拉曼的看法一致。半年前，也就是英國正式宣佈撤走駐軍前約兩周，拉薩也曾發表和東姑阿都拉曼類似的談話，他也坦稱馬來西亞的財務狀況無法再提高國防編列，馬來西亞或許有必要向對馬來西亞友好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尋求防衛的協助（The Straits Times, 1967c）。從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的談話來看，馬來西亞有意透過軍事結盟和區域組織的力量，抗衡區域內共產主義蔓延的威脅。1967 年 8 月 8 日成立的東協，和 1971 年 11 月 11 日成立的五國軍事力量³⁶（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FPDA）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誕生。

1968 年 1 月 24 日，因健康因素甫卸下內政部長職 6 個月的國會後座議員伊斯邁（Ismail Abdul Rahman），在國會中對即將失去英國保護傘的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國家

³⁵ 1966 年 7 月 5 日，英鎊匯價跌到 1 英鎊兌換 2.78 美元，是當時 20 個月來的最低點，儘管英國政府立即實行緊縮政策，但到 1967 年 7 月，英國經濟仍在危機中，失業人數約 49 萬 6000 人，是 1940 年以來該月的最高紀錄（英國簡史，1996）。

³⁶ 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在英國決定自蘇伊士運河以東撤軍後，鑑於馬新防務不可分割而簽署「五國聯防合作協議」，承諾在馬新面對外在侵略和威脅時，五國必須相互協商；此協議是在 1971 年 4 月 16 日公報，但生效日是同年 11 月 1 日。



提出三大因應方針，以免捲入冷戰中以美蘇陣營為首的衝突之中：（一）透過區域國家的力量，也即是東南亞國家集體聲明此區域為一個中立地區。為了確保這項聲明有效，必須獲得包括中共在內的大國保證；（二）區域內國家應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及（三）區域國家發佈「共存、不干預彼此國內事務及接受各國國家體制」的聲明（The Straits times, 1968d）。伊斯邁的三項提議，獲得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的高度肯定（The Straits Times, 1968b），成為 1971 年 9 月拉薩任相後的馬來西亞外交政策主軸，也奠定東協於同年 11 月 27 日發表「和平自由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的基礎（The Straits Times, 1971c）。

貳、對共產國家立場的微妙變化

由於 1960 年代上旬受到不結盟運動國家的冷待，和 1966 年英國開始檢討撤走蘇彝士以東駐軍的影響，為了淡化馬來西亞外交政策過於親西方的形象，以免在國際社會中遭到孤立和招至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東姑阿都拉曼領導下的馬來西亞反共產國家的態度於 1966 年底出現微妙變化。經過半年的商談，馬來西亞和南斯拉夫於 1967 年 5 月 7 日宣佈建交。南斯拉夫是馬來西亞第一個建交的共產國家（南洋商報，1967d）。在此前三周，蘇聯代表也來到馬來西亞商談兩國建交事宜（The Straits Times, 1967a），約莫半年後的 11 月 24 日，馬來西亞和蘇聯也建交了（The Straits Times, 1967b）。此後馬來西亞也陸續與共產黨國家建交，它們依續是羅馬尼亞（1969 年）（The Ambassade of Romania in Malaysia）、匈牙利（1969）（Diplomacy and Trade, 2018）、波蘭（1971 年）（Official Website of Embassy of Malaysia, Warsaw）、北韓（1973 年）（The Straits Times, 1973a）。

在東姑阿都拉曼任相後期，馬來西亞雖然與歐洲共產國家建交，但對地理位置上最接近馬來西亞的中共卻仍舊保持距離。東姑阿都拉曼曾在國會先後表明馬來西亞將與所有國家建交，除了是那些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或「轟掉我們腦袋」的共產國家，所謂威脅指的是在馬來西亞指派直接或間接代理人以推翻固有體制者。東姑阿都拉曼明確表示中共並沒有入侵馬來西亞的能力，但中共的作戰方式向來是透過代理人，也即是國內的共產黨代為推翻政府體制，例如正在越南發生的越戰（The

Straits Times, 1968b; 1968e)。不過只要中共不再給馬共提供任何形式上的援助，馬來西亞願意和中共建立正常的官方關係，因為「像馬來西亞這樣的小國，沒有能力拒絕有意與我們建交的國家」（The Straits Times, 1968f）。儘管直到東姑阿都拉曼辭去首相職止，馬來西亞與中共仍然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過馬來西亞與其他共產國家建交的先例和東姑阿都拉曼列下與中共建交的原則，卻成為爾後拉薩領導的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的重要參考指標。

第二節 中共與馬共

從馬來西亞於 1957 年獨立開始，及至馬共於 1989 年與馬來西亞和泰國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無條件停戰之前，馬共一直是馬來西亞馬來政治人物在做與中共攸關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決策時不可忽視的元素。馬共的成立是由共產國際的東南亞代理人胡志明促成，最終目標是推翻英殖民政權，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政治思想的新社會，儘管馬來亞後於 1957 年獨立自英國人的管理，但馬共仍舊未放棄瓦解馬來亞按西方民主體制建立的主權國家，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的目標（The Straits Times, 1966a）。馬共成立之初，共產國際希望馬共是一個含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多元族群政黨，但馬共卻始終為一個華人成員逾九成的政黨³⁷（Cheah, 2009；Starnier, 1965）。1960 年俄共和中共分裂後，馬共選擇追隨中共，接受中共的指導和金援（陳平，2004），以顛覆馬來亞政局，馬共的抉擇或許因為馬共成員多為華校子弟，無論在溝通上和文化情感上與中共較有共鳴和熟悉感之故，但這也使得馬來西亞於 1960 年下旬開始與共產國家建交後，中共遲遲未進入建交名單的原因。

³⁷ 楊建成（1982）認為馬來人與印度人相對於華人較不被共產意識吸引，有其社會結構及與政府的關係影響。馬來人認為華人已掌握馬來西亞經濟命脈，自視土地之子的他們無法忍受與華人共享其他方面的平等地位。此外馬來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皆受到憲法的保障，信仰上效忠伊斯蘭教，普遍上對固有體制並沒有太多的不滿，自然容不下共馬共的「解放」思想；至於印度人強大的傭工性，使他們迅速適應馬來亞／馬來西亞的環境，雖然人在海外，印度人仍獲得印度政府致力保障在此地工作的福利，固然也不覺得馬來亞／馬來西亞有被解放的必要。反之，華人則先後經歷中國 1911 年辛亥革命和 1949 年共產革命的經驗，使得在馬來西亞成立後公民地位被二等化的他們，相對於馬來人和印度人更容易被共產思想吸引。



壹、中共公開挺馬共顛覆馬來西亞

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發動政變失敗遭到鎮壓後，中共培植印尼共產黨的心血毀於一旦，原本對馬共已有協助的中共，如今全心全意栽培馬共。

馬共前總書陳平在其回憶錄「我方的歷史」中指出，中共對馬共的協助大致可分為武力和政策兩大層面。在武力方面，中共系統性的給予馬共裝備、訓練和組織上的援助；在政策上則指導馬共拉攏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的極端伊斯蘭份子，使其成為可堪被利用的地方勢力。一度於1959年因為經費和糧食不足，被迫逐步停止在馬來亞武裝鬥爭的馬共，在中共的技術支持與金援之下重新整裝待備，遊擊隊成員也從原本的逾300人增加至約1000人（陳平，2004）。馬共在1968年6月17日突襲霹靂北部的馬來西亞安全部隊時，造成16名警察被殺，17名受傷，馬共也藉此宣告重新展開在馬來西亞的顛覆行動，並計劃於1975年佔領整個馬來亞半島，否則也至少得佔領馬來亞半島北部，形成南北對峙的狀態（原不二夫，2002；楊建成，1982）。

對於馬共在馬來亞／馬來西亞的武裝鬥爭，中共不只一次公開支持。先是於1966年1月12日，北京公然接待馬共成員，並且宣示將在馬共「民族解放」和「粉碎馬來西亞」的志業上提供全力支持（The Straits Times, 1966a；1966b；Berita Harian, 1966）。1968年6月20日馬共慶祝成立20年的黨慶之時，馬共的重新投入武裝鬥爭的宣示，同時受到中共與越共公然稱許，中共還敦促馬共應繼續鬥爭直到推翻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為止（Berita Harian, 1968）。儘管馬來西亞政府從未掌握中共支援馬共解放馬來西亞的任何實質證據，但中共一再公然支持馬共的顛覆行為，促使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皆斥責中共意圖藉馬共之手干預馬來西亞內政（The Straits Times, 1968d）。

從1968年6月至1970年6月間，接受中共訓練後的馬共與馬來西亞和泰國軍警發生逾20起衝突，馬來西亞軍警傷亡人數逾600人。縱使在馬來西亞與中共已確定建交後的1974年5月1日至1975年6月間，馬共依舊未放棄武裝鬥爭，總計殺害40名馬來西亞高級警官及安全人員。就在拉薩為了馬中建交事宜於1974年5月28日至

6月2日官訪北京接受中共領導層招待之際，馬共仍在馬來西亞襲擊霹靂北部的公路及水壩，不過此次攻擊未造成人員傷亡。此外，馬共也於1969年11月15日在中共的支持下在湖南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取代一年前於泰國邊境被摧毀的電台，按時以華語、英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對馬來西亞廣播共產和革命訊息（楊建成，1982；陳平，2004）。

正當馬共在中共支持下努力不懈推翻馬來西亞固有政府體制之際，拉薩擔任馬來西亞首相後翌年，也就是1971年，竟然主動向中共探詢建交的可能性。拉薩此舉非但與他擔任東姑阿都拉曼副手任內對中共不假敵色的作為迥異，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從理性層面分析，不免也對國家安全形成一定的威脅。要釐清這個充滿矛盾的局勢，就有必要從馬來西亞內政著手。

第三節 建交前的國內背景

馬來西亞與中共於1974年5月31日宣佈建交的3個半月後，也就是83天以後的8月14日，馬來西亞舉行第四屆全國選舉。這場選舉是拉薩於1970年9月22日宣誓就任首相以來的第一場選舉，也是確定他在巫統領導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選舉。有鑑於前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辭職，是因為「聯盟」（Alliance Party）在上一屆全國選舉中，首次失去建國以來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及選舉後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華人和馬來人族群衝突，也即是後人熟悉的「五一三事件」，拉薩深知帶領國陣在全國第四屆選舉中勝選是他的基本義務，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更是他不容推卻的責任。造成這兩起事件的原因其實並不新鮮，僅是自馬來亞獨立前就深埋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各層面的族群問題在選舉前被反對黨強化造成。拉薩和聯盟政府成員若要在第四屆大選中贏得理想成績，就有必要重新爬梳這兩起事件發生的過程，對症下藥。



壹、1969年第三屆選舉前夕


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領導人李光耀在 1964 年舉行的第二屆選舉主張「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激怒自認為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主人的馬來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讓馬來人覺得華人意圖奪取他們的土地。馬來人對華人的擔憂，並沒有隨著 1965 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華人人口從佔總人口數的 42.2%減少至 35.7%，以至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量消滅而減少（楊建成，1982）；反之卻隨著印尼政變後總統蘇卡諾（Sukarno）下台驟增，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對抗結束後，兩個族群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一夕消失，應而回頭關注之前暫時擱置一邊的矛盾，例如經濟和語言（王國璋，1997）。

一、經濟層面

馬來西亞的經濟雖然自獨立以來即有顯著改善，不過因為馬來西亞採取自由放任經濟模式，以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特別是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更是越來越大。可是一經反對黨炒作，本應是階級對立的現象卻被操縱成為種族對立，也即是馬來人和華人的對立。事實上，若以衡量所得分配平均度的基尼系數檢測，從 1957 年至 1970 年間，馬來族群的財富增長 36.2%，華裔族群為 21.6%，很顯然馬來族群生活改善的幅度遠比華裔族群理想許多。不過由於財富多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上，普通馬來人和華人皆面對通貨膨脹及日益惡化的失業率折磨（Brown,1996）。根據馬來西亞政府的經濟策劃組 2017 年依據族群公佈的資料顯示，1970 年時馬來半島含馬來人在內的土著，屬於貧窮人士者有 64.8%、華人為 26.0%，及印度人 39.2%。各族群民眾面對的生活拮据，一經伊斯蘭黨、行動黨和民政黨為了勝選所作的挑撥，馬來人和華人的仇恨因而進一步提升。

二、語言層面

依據憲法第 152 條原本的規定，馬來西亞獨立 10 年後也就是 1967 年，國會必須重新檢討英文的官方地位，這個規定旋即在馬來人和華人之間又再開闢新戰場。巫



統黨員 Syed Nasir Ismail 於 1965 年初成立了「國語行動陣線」(National Language Front)，陣線內不少成員也都是巫統黨員甚而還有國會議員，目標就是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把馬來文列為國語，同時排除包括英語在內的其他語言應用於官方用途 (Vasil, 1972)。另一方面，全國華族註冊社團則於 1965 年 6 月 21 日議決通過表明接受馬來語為國語，但華語必須被列為官方語言，允許在所有環境下使用 (南洋商報, 1965)。經過兩年的磋商爭取，馬來西亞政府最後於 1967 年 8 月 4 日議決，確立馬來文為國語的地位，但在特定狀況下英語仍為官方用語，並且官方文件可視其必要翻譯為國內民眾慣用的語言 (南洋商報, 1967b; 1967c)。這樣的結果看似面面俱到，但相對於新加坡獨立後把華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的舉措，馬來西亞華人難免不滿。就在同一年的 8 月 31 日國慶日當天，吉隆坡和檳城就有勞工黨和華人在四處發動示威，要求各族語文教育應獲得平等地位 (南洋商報, 1967d)。馬來人則認為自身權利遭到出賣，在街頭焚燒東姑阿都拉曼的頭像 (楊建成, 1982)。

貳、1969 年選舉後的種族暴動

對於馬來人的焦慮和華人對政府的不滿，東姑阿都拉曼和聯盟成員甚少做出回應，因為馬來人和華人之間數十年的緊張關係，使得聯盟政治人物無論說甚麼都動輒得咎，於是只好避免在公眾場合表達聯盟的政策，如國語法案的決議即是稟持族群平等原則，以免激怒馬來人和華人極端份子 (Vasil, 1972)。不過聯盟眾成員的沈默反使事件更加惡化--華人質疑向來號稱為捍衛華社福利的聯盟成員黨之一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會說一套做一套，對聯盟的支持開始動搖；馬來人對東姑阿都拉曼的態度，則從東姑阿都拉曼擔任首相以來，不斷控訴東姑阿都拉曼在政策制定上忽略馬來人利益³⁸，偏好華人。伊斯蘭黨、行動黨、民政黨等反對黨抓住馬來人和華人對聯盟的不信任，在 1969 年選舉前大肆操作族群議題，尤其是選票基本盤來自華人的行動黨 (Abdul Majid Ismail, 2006)。可是聯盟領袖卻太過自大，也或許與平民百姓的

³⁸ 東姑阿都拉曼的母親具有 1/3 華人血源，首任妻子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華人，東姑阿都拉曼偏好騎馬運動，在當時也是許多上流社會華人的興趣 (Ramlah Adam, 2004)。種種因素的堆積，促成在獨立前就和華人有心結的馬來人輕易就被有心人煽動，輕易就相信東姑阿都拉曼過於友善華人。



距離相距太遠，天真的覺得反對黨在民間的挑撥的仇恨語言不會對選情帶來影響，因為這些政治人物強烈的認為，民眾非常滿意他們管理國家的方式，絕對會在 1969 年繼續支持他們（楊建成，1982）。

1969 年 5 月 10 日，第三屆選舉結果揭曉，聯盟雖然連任，卻首次失去國家獨立以來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優勢，取得的支持率更低至 49.1%，因為傑利蠅螞（Gerrymandering）式的選區劃分奏效之故，仍舊在 104 席總議席次中取得 66 席，不過若與 1964 年來第二屆全國選舉的 89 席和 58.5% 支持率相比，聯盟共少了 22 席和 9.4% 支持率（南洋商報；1969d）（表 3-1）。

表 3-1：聯盟第二屆（1964 年）及第三屆（1969 年）選舉國會席次及得票率

年份	總議席	所得席次	(+/-) 席次	所得支持率	(+/-) 支持率
1969	104	66	-22	49.1%	-9.4%
1964	104	89	-	58.5%	-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作出整理。

選舉結束第三天，也就是 5 月 13 日，馬來西亞爆發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以馬來人與華人為主的衝突事件，也就是後人稱的「五一三事件」（May 13 Incident）。事件發生的起因是反對黨民主行動黨的華人支持者，在吉隆坡發起遊行慶祝選舉的勝利，但在遊行過程中卻對馬來人出言不遜，例如以馬來語高喊「馬來人去死，山番們到森林中去」、「吉隆坡現在屬於華人」等，馬來人抑止不住怒氣，傍晚時分，巫統雪州分部發起反制性大遊行，但在遊行時間開始前，馬來人早已帶著馬來短劍和巴冷刀，群起攻擊華人、砍殺路人、燒毀華人商店與車輛。族群衝突全面爆發。國家元首於 14 日晚間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頒佈戒嚴令（南洋商報，1969c）。四天後政府成立「全國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最高元首委任拉薩為理事會主席，並擁有所有的行政權，以管理已被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馬來西亞，並在東姑阿都拉曼的指導下執行他的職權，直到國家恢復秩序為止³⁹（南洋商報，

³⁹ 國會民主於 1971 年 2 月 20 日恢復，「全國行動理事會」則於前一日宣佈解散。「全國行動理事會」共治理馬來西亞 21 個月（南洋商報，1971c）。

1969e)。Baginda (2016) 認為此項安排彰顯東姑阿都拉曼的權力轉讓已在進行中，拉薩已成為馬來西亞的實權領袖。

根據「國家行動理事會」針對「五一三事件」的調查顯示，因此事喪生的人數共計 196 人，華人 143 人、馬來人 25 人，及其他族群 28 人；受傷人數 439 人，華人 270 人、馬來人 127 人，及其他族群 42 人。至於導至「五一三事件」發生的原因，共有三項：第一、馬來西亞族群間貧富不均，馬來人的經濟狀況遠比華人落後⁴⁰；第二、相對富裕的華人試圖以他們的經濟力量，透過選舉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⁴¹，違反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馬來人至上」的條文⁴²，使得馬來人極端不安；第三、馬共成員趁火打劫使暴力事件加遽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1969)。1971 年 9 月 22 日，緊急狀態解除七個月零兩天後，東姑阿都拉曼卸下首相職，交棒拉薩。

參、拉薩任相後

拉薩任相後火速根據官方報告針對「五一三事件」起因做出回應。為了挽回馬來人的支持，向來被民眾視為親馬來人的拉薩上台後，迅速落實一系列讓馬來人有感的政策。在法律方面，主導國會修改馬來西亞憲法條文，明文規定禁止公開討論和利用族群的敏感制造課題、禁止討論憲法規定的馬來統治者地位、馬來人和馬來語的特別地位等，保障「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不受挑戰的地位⁴³；此項條文確立了馬來人在馬來西亞超越其他族群的優越性，也使非馬來人自此成為馬來西亞的二等公民。為了避免這項條文未來受到挑戰，修改後的憲法，也禁止在馬來西

⁴⁰ 1970 年西馬的全國家庭貧窮率為 49.3%，其中 65.9% 為馬來家庭、華人家庭為 27.5%；在有限公司的持股中，馬來人僅有 2.4%，華人則有 27.2% (Gomez, E.T. and Jomo, K.S., 1997)。

⁴¹ 反對黨行動黨選舉時的口號是建立屬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非當時的「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由於馬來西亞的政黨體系以族群為基礎，負責華人選票的聯盟成員黨馬來亞華人公會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簡稱「馬華」) 在 1969 年所獲的 13 席國會議席比 1964 年 27 席少了 13 席；反之華人政黨色彩濃厚的行動黨則首次取得 13 議席，因此華人被視為不再如過往般認同聯盟政府。

⁴² 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最高元首必須保護馬來人和沙巴及砂拉越土著的特別地位，和在各種領域如服務、許可證等保留特定額度的配額。


⁴³ 在早一年的 1970 年，馬來西亞已在教育方面推行把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英語學校，全面改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政策。除了小學外，其他語言源流的中學，也全面改制以馬來語教學。此舉引發非馬來人的不滿，尤其是非常重視華文教育與維護華文文化的華人。

亞境內公開討論族群課題，和利用族群敏感性制造課題（Cheah, 2002）。在經濟方面，則於 1971 年 7 月 11 日落實長達 20 年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y Policy），以消除國家貧窮和重組國家經濟結構為目標。不過「新經濟政策」在實際落實上卻僅僅扶植馬來人和原住民，華人和其他族群並沒有受到關注，使得非馬來人產生嚴重不滿（Faaland, Parkinson & Saniman, 1991），特別是新經濟政策中，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的持股中，其中 30% 必須是土著的規定。由於馬來西亞的社會結構中從商者多為華人，這項規定被視為蓄意剝削華人經濟自主性，並且意圖強硬把華人財富分一杯羹給馬來人。毫無意外的，拉薩的這些政策引起華人極大反感。

在馬來人和華人關係仍舊緊繃的當下，拉薩一味討好馬來人的結果，可想而知必然在下一屆的全國選舉中繼續大幅流失華人選票，影響所及甚至可能丟失執政權。馬來選民佔總選民數 57.9%，拉薩若要使其政權在巫統內合法化，就必須在來屆全國選舉成功維持國陣執政權之餘，還得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否則東姑阿都拉曼被迫去職的歷史或會再次發生在其身上。為了確保達到這些目標，拉薩誓必爭取佔人口 34.5% 的華人選民支持，否則僅靠 7.6% 其他族群選民人口的支持，縱使能贏得選舉，也無法取得三分之二多數。因此，拉薩先是拉攏大部份反對黨，後於 1974 年 6 月 1 日註冊為「國陣」，宣佈原有三個成員黨的聯盟，已擴大成九個成員黨（南洋商報，1974c）。儘管如此，面對未加入國陣的反對黨華基政黨如行動黨的威脅，再加上拉薩主導上述多項令華人不悅的政策，國陣非得出奇招重獲華人好感方可，而這個方法又得不會令馬來人被分配到的國家資源受到影響。顯然，與中共建交，似乎是最權宜的選擇了。

第四節 馬中建交過程

拉薩於 1970 年 9 月 23 日宣誓就職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後，開始表現出和中共建交的興趣。在他就任後的第一篇文告，拉薩就明確表明東南亞的中立化需要美國、蘇聯和中共的保證（南洋商報，1970）。這份說明或許可被視為拉薩對中共展示善意，而依據事件後續發展，文化大革命後意圖建立國際影響力和取得東南亞國家邦



誼的中共，也非常願意接納拉薩的善意。1971年1月，馬來西亞柔佛州發生自1926年以來最嚴重的水災，受影響人數達5萬7945人，6人死亡（南洋商報，1971a），當時各國紛紛捐款和捐獻物資協助馬來西亞渡過難關，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中共紅十字協會於2月初，主動電報馬來西亞紅十字協會，獻議捐獻人民幣50萬元（約馬幣62萬元）賑災物資給馬來西亞。按媒體報導，是為當時各國捐獻的最高款項⁴⁴（南洋商報，1971b），相關物資並於同年3月5日運抵（南洋商報，1971b；1971d）。中國反常的不再痛罵馬來西亞為西方陣營的傀儡，而在馬來西亞面對災難時伸出援手的態度上大幅度轉變，相信拉薩也有所感是為中共對其伸出友好之手的回應。

Jeshurun（2009）認為就是從這一年開始，馬來西亞政府積極試探中共與吉隆坡建交的意願。於是就有了同年5月10日，拉薩摯友同時也是國家企業公司主席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以非官方名義率領一支15人訪問團前往香港、廣東和北京進行10天的商務訪問「推動雙向經貿」（promoting two-way trade）（The Straits Times, 1971a）。在這段行程中，拉沙里拜訪了周恩來，並獲得周恩來回覆中共贊同拉薩主張的中立政策（The Straits Times, 1971b）。拉沙里40年後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那是一趟非官方訪問，「是以經貿代表團為藉口和周恩來總理討論兩國建交的可能性」（The Star, 2014a）。

拉沙里訪問中國後，兩國自此開始展開一連串的經貿、文化與體育活動的互訪。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官訪北京，一般認為美國此舉鼓勵了馬來西亞和中共建交的決心，不過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後，馬來西亞才在拉薩的顧問拉查莫哈（Raja Mohar）以國家商務團代表名義，在北京密會周恩來，以理解中共對馬共的態度和對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政策，這兩個事件是馬來西亞和中共建交最在意的課題。周恩來對前者沒有做出任何陳述，不過再次強調中共認同馬來西亞的中立政策；至於後者，周恩來則首次提出海外華人的概念，表示中共將履行禁止海外華人同時持有中國和居住國的雙重國籍；此外中共也保證，不會插手干預有海外華人居住的國家取消華

⁴⁴ 捐助物資的第二大宗國家為加拿大政府及人民的美金2萬500元（約馬幣6萬1000元）；第三大宗為印度政府的10萬盧比（約馬幣4萬1300元）（南洋商報，1971b）。



文報刊或華文學校的事務，因為這是相關國家的主權。莫哈回國向拉薩呈報會談結果後，拉薩認為中共在某個程度上表現了善意，兩國可以開始籌備進入建交談判的前置作業了（Baginda, 2016）。

吉隆坡一直到翌年 6 月才與北京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正式展開兩國的建交談判（The Straits Times, 1973b）。就在兩國談判進行的時候，反對黨的行動黨國會議員曾敏興，在國會中質詢拉薩兩國建交的背後是否有任何隱議程。他懷疑拉薩有意模仿尼克森的作為⁴⁵，在第四屆全國選舉前宣佈馬中建交。很顯然，曾敏興懷疑拉薩有意利用和中國的建交，當成為國陣在選舉中吸票手段。不過拉薩給曾敏興的回答是「政府決定與任何國家建交都是基於國家利益，而非政黨利益」。（南洋商報，1973；The Straits Times, 1973b）。拉薩的回應並沒有直接回答曾敏興的問題，即是「是」或「不是」，而是以現實主義中「國家利益」的普遍性原則轉移曾敏興問題的針對性，與此同時，拉薩也沒有否認在國家利益這頂大帽子的覆蓋下，國陣確實能從中取得政黨利益。從兩人的對話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無論是曾敏興直指國陣對馬中建交的意圖，或拉薩沒有堅定否認曾敏興的說法，我們可以推測雙方都同樣意識到馬中建交日期的宣佈，對國陣和反對黨的選舉結果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

拉薩當年閃躲的曾敏興問題，32 年後國陣曾經的兩位黨要卻代替拉薩回答了。他們分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前副總會長曾永森，他曾經在馬中互試建交水溫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魚角色，另一位則是前國防部長和第五任首相巴達威（Abdullah Badawi）。兩人都指出，馬中建交的時機是國陣政治精英的悉心安排，確實有意藉馬中建交影響選舉。他們回憶道，國陣政治精英當年有共識，第四屆選舉必須在 1974 年舉行，拉薩必須在春天時候以馬中建交為名拜訪中共，返馬後花上一至兩個月時間做民調，進行評估和讓人民醞釀情緒後再舉行選舉。國陣精英認為馬來西亞華人仍視中國為祖國，如果國陣把對馬來西亞華人祖國的外交政策從敵對調整為友好，將會取得華人的普遍好感，繼而在選舉中把選票投給國陣（Baginda, 2016）。儘

⁴⁵ 尼克森是中共 1949 年佔領大陸以後第一位官訪中國的美國總統（紐約時報，1972a）。在他官訪中共 9 個月後，美國舉行總統大選，尼克森以壓倒性勝利的 521 張代表人選票，打敗民主黨對手 McGovern 的 17 張取得連任（紐約時報，1972b）。

管馬中最終建交的時間已是進入夏天的5月末，但這不影響國陣政府藉與中共建交的效應，在三個月後的選舉取得理想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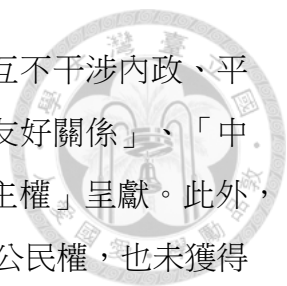
除了曾永森和巴達威的「證詞」外，還有另一個非直接證據證實國陣利用與中共建交維繫政權，即是馬中建交談判過程發生的相關事件。兩國正式展開談判始於1973年6月，結束於1974年4月，前後歷經10個月14輪談判（劉新生，2011）。在馬中建交談判過程中，吉隆坡對北京提出的要求沒有太多意見的爽快允諾，例如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可是北京卻對吉隆坡最在意的兩項課題和吉隆坡僵持不下，包括中共必須放棄對馬共任何形式的支援和支持；以及必須撤回30萬名居住在馬來西亞，卻仍未取得馬來西亞公民權的華人國籍。北京拒絕吉隆坡兩項提議，使得兩國談判於同年10月陷入僵局（*Washington Post*, 1973）。當兩國談判重啟後，拉薩宣佈吉隆坡不會堅決要求中共不介入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活動（*The Straits Times*, 1973d）。在兩國進行為期10個月的談判中，兩國曾兩度因華人國籍問題中止談判，一次因中共支持馬共課題中止談判，三次都是在吉隆坡讓步下建交談判才得以恢復進行。當馬來西亞和中共的代表於1974年4月末結束建交談判時，談判結果仍未完全符合馬來西亞最大的國家利益。當吉隆坡和北京在1974年5月30日發表兩國建交的共同聲明時，北京雖然在公報上聲明尊重馬來西亞的主權和社會制度，但並未如吉隆坡要求的宣佈斷絕與馬共的關係（*南洋商報*, 1974a），僅願意在口頭上承諾從國家層級對馬共的支持退到黨對黨的層次；此外北京也不願意同意吉隆坡要求北京拒絕承認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國籍，僅同意讓馬來西亞華人自行決定保留馬來西亞或中國國籍（附件一）。不過有一樁鮮有人知的事是，直到建交公報簽署的前一天，抵達北京後的拉薩仍沒放棄親自遊說周恩來等北京高階領導人，希望北京在建交公報上公開聲明放棄對馬共的任何形式上的支持（*Baginda*, 2016）。可見，拉薩對於建交所必須付出的這項代價是有所認知的，而他接受這樣的建交條件更是有意識地願意承擔此一代價，因而在他心中，必有其他更高的考量。



第五節 馬中建交的兩階段決策

一個理性的國家行為者基本上應會繼續和中共代表談判，或拒絕同意這份在當時看起來對馬來西亞沒有太多利益的建交條件。不過馬來西亞出人意外地接受了，這表示國陣確實另有更大考量，故如同曾敏興的懷疑，或曾永森和巴達威所說的馬中建交必須「趕進度」。比如，Baginda（2016）就認為，這樣的談判結果是為了使國陣政府在馬來西亞民間的形象看起來似乎很重視國家安全，在贏得華人的支持時不會同時流失馬來人的支持，並且使馬來西亞在國際上成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東協國家讓馬來西亞形象加分，實則並未為馬來西亞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但若就此馬中建交純為國陣政府政權永續作為盤算基礎，未必合理，因為如果馬中建交是國陣政府為了在來屆大選贏得華人選票維繫政權的重要原因，國陣大可不必對北京開出任何條件就與北京建交。反之，如果與中共建交真如同拉薩在國會所言的全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何建交談判在達到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結果前，馬來西亞就同意結束談判。換言之，即使是為了政黨利益，也必須有某種程度的國家利益為其基礎，才能具有正當性，否則弄巧成拙的話，在政黨利益方面終究也不能獲利。

與其區分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孰重，不如分析兩者如何相互構成，使得維護政黨利益的考量，不能完全違反國家利益，而維護國家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超越政黨利益。在馬來西亞對與中共建交的決策過程中，馬來西亞受到選舉時間表限制，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也即是 1974 年春天達成建交的事實。由於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都一再宣稱中共透過馬共或代理人干預馬來西亞內政，造成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東姑阿都拉曼任相後期開始與共產國家建交時，也曾與拉薩先後異口同聲表示，只要中共不再透過代理人干預馬來西亞內政，尊重馬來西亞主權的獨立，馬來西亞就願意與中共建交。因此拉薩為了爭取仍視中國為祖國的華人支持與中共建交，就得在談判中取得足以說服其他選民當下的中共，不再是過去他和東姑阿都拉曼一致認為會影響國家安全的外來因素。不過在國際談判時，如果一方面受限於時間壓力，談判結果通常就會有利於另一方，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兩國建交公報上，馬來西亞並沒有在建交公報上取得中共放棄支持馬共的承諾，只以語義不



詳的「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馬來西亞政府，並尊重馬來西亞的獨立和主權」呈獻。此外，對於拉薩希望中共放棄承認的 30 萬名在馬來西亞生活的華人中國公民權，也未獲得中共的首肯，建交公報上中共僅願意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聲明，它們都不承認雙重國籍」（附件一），讓這些華裔自行選擇成為中國公民或馬來西亞公民來回應馬來西亞的要求。國陣領導的馬來西亞政府，無法在談判上取得更理想的結果，時間壓力絕對是他們最大的困境。從談判結果觀之，拉薩政府似乎是明顯的犧牲國家利益，以換取認知中國為祖國的華人好感以便維繫國陣的政權利益。但若吉隆坡與北京建交是純為政黨利益，吉隆坡代表團可以放棄底線無條件和北京建交，拉薩也無需就中共和馬共的關係和中共奮戰到簽署聯合公報的最後一分鐘。拉薩無法如此，因為他深知倘缺少國家利益作為建交的正當性基礎，反而斲傷政黨利益。但從另一方面觀之，馬中是於 1974 年 5 月 30 日正式宣佈建交，馬來西亞第四屆選舉則從同年 8 月 24 日開始，確實正正符合巴達威和曾永森所謂的先民調後評估的「時間表」，這又似乎是國陣政府是為了政權利益而推動馬中建交。顯然國陣政府是同時具備政權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原因，與中共化敵為友。究竟政權利益優先或國家利益優先，或許透過多元啟發論分析，可以重新理解。

多元啟發論主張決策者在做決策時，不會排除或完全忽視國家利益，而是在眾多決策選項上，先排除不利政權永續的選項，繼而才在餘下的選項中選擇對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選項。在 70 年代冷戰背景下，馬來西亞身為主張中立不結盟的東協成員國之一，馬來西亞和中共建交是整個時代背景下遲早會發生的事件，只不過為了使建交的時機能達到國陣和拉薩政權永續的目的，在與中共的談判結果上未達到國家最大利益而已。

以多元啟發論的模式假設馬來西亞最在意的中共和馬共關係，及 30 萬華人的中國公民權處置而言，馬來西亞可以在談判達到以下至少 5 項議決時同意與中共建交：

A 選項：中共答應完全放棄對馬共的支持，和拒絕承認未在馬來西亞取得公民權華人的中國國籍後，馬來西亞即與中國建交。

B 選項：中共答應上述其中一項提案後，馬來西亞即與中國建交。



C 選項：中共答應對上述兩項提案做出某種程度妥協後，馬來西亞即與中國建交。

D 選項：中共答應對上述其中一項提案做出某種程度妥協後，馬來西亞即與中國建交。

E 選項：馬來西亞無條件與中國建交。

如第二章所述，「多元啟發理論」認為決策者做決策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政權利益為依歸，按「非補償性原則」刪除對自身政權無益的選項，縱使相關選項能為國家帶來最大的利益；第二階段則從第一階段刪除剩餘的選項中，選擇能為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方案。簡而言之維繫政權利益為先，國家利益第二。因此在做決策之前，決策者將先行把每個選項做出分類，究竟是符合政權利益、國家利益或兩者皆有。

在這 5 項選項中，A 選項和 E 選項僅符合一種利益，前者是國家利益，後者為政權利益。B 選項、C 選項和 D 選項則同時符合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表 3-1）。在這些選項中，A 選項和 E 選項將在第一階段決策中最先被刪除。儘管選項 A 看似對國家利益的最佳選擇，因為當時對馬來西亞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來自中共支持的馬共，只要中國切斷對馬共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資助，馬來西亞軍警就相對容易撲滅在有限資源下運作的馬共，不過若要獲得中共的同意，雙方需要耗費更長的談判時間，這無疑無法讓國陣利用馬中建交提升選情。由於國陣需靠與中共建交來獲取華人選民在第四屆選舉的支持，A 選項顯然很不符合國陣穩定或連任的政權需求。反之，E 選項則純粹以政黨利益為考量，也是馬中建交「最容易」的方案。以中共急需國際認可的前提之下，北京絕對很樂意同時取得與吉隆坡建立官方關係，並繼續支持馬共為中共信仰的意識形態鬥爭。只不過若拉薩政府選擇這項方案，除了自打嘴巴，亦違反過去十數年堅持中共必須放棄支持馬共在馬來西亞的武裝鬥爭、不再干預馬來西亞主權才建交的原則，吉隆坡未來或將缺乏施力點，阻止北京透過馬共影響馬來西亞政府體制及放棄承認未在馬來西亞取得公民權的華裔國籍，以長遠觀之，這並不符合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由於 A 選項和 E 選項對國陣政權的延續，形成一種無法在其他方面獲得補償的傷害，因此在第一階段就會被剔除。

表 3-2：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的決策選項

選項	屬性	
	政權利益	國家利益
A	無	有
B	有	有
C	有	有
D	有	有
E	有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B 選項、C 選項和 D 選項即具備「政權利益」，也具備「國家利益」，並且在符合國家利益層面不會對政權利益形成損害，因此 3 者同時都進入第二階段決策。在第二階段中，決策者就會集中心思評估哪個選項最能為國家取得最大利益。由於馬來西亞政府非常關注中共支持馬共作亂，和馬來西亞非公民華裔的中國國籍課題，因此相對於 B 選項的「中共答應上述其中一項提案」和 D 選項的「中共答應對上述其中一項提案做出某種程度妥協」，C 選項的「中共答應對上述兩項提案做出某種程度妥協」，似乎是三項選項中相對給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選項。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儘管 A 選項最符合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但在國陣政權永續的考量上並不符合政權利益，因此不在馬來西亞決策精英的考量範圍。反之 C 選項是滿足政權利益後給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選項，因此獲得決策精英的青睞，也就成為馬來西亞談判團隊與中共交手時，使命必達的決策目標。

第六節 總結



從現在回頭看，吉隆坡和北京建交是歷史上必然發生的事。從英政府於 1967 年宣佈將於 1970 年代撤離蘇彝士運河以東的軍隊，巫統領導精英為求消除馬來西亞親西方陣營的型象，以免在英軍撤離後招致共產國家或共產國家代理人攻擊，於同年開始和共產國家建交，確實的落實中立不結盟政策。1974 年，馬來西亞成為東南亞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國家，並在建交後不到 3 個月舉行第四屆選舉利用馬中建交的效應取得多數華人支持，成功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國陣的所得議席率並從 1969 年第三屆選舉的 63.5% 增加至 1974 年的 87.7%，增幅 24.2%；馬華公會議席所得率從 1969 年的 39% 增加 44% 達 1974 年的 83%；民政黨則從 57% 增加 6% 達 63%。華人選票明顯成功回流。縱觀兩國建交協議，馬來西亞希望中共取消對馬共的支持，及撤銷 30 萬在馬來西亞仍未取得公民權華人的中國國籍，但均未獲得中共在建交公報上白紙黑字列明。反之中共僅願意表明尊重馬來西亞主權和不承認中國公民持雙重國籍做為回應。雖已有學者專家指出，馬中建交是國陣政府為了維繫政權犧牲國家利益，才同意在如此不甚理想的協商結果下和中共建交，但若從多元啟發論角度分析，馬來西亞政府實際上即顧及政黨利益，也照顧國家利益。




第四章 1999 年的朱鎔基選前官訪與 中國銀行復辦



1999 年 11 月 24 日，在馬來西亞爭取復辦 7 年的「中國銀行」，終於在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和中國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的見證下，由中國人民銀行和馬來西亞中央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星洲日報，1999a），抵定復辦。中國銀行原於 1939 年在馬來半島成立分行，馬來亞獨立後國會於 1959 年通過「聯邦銀行法」修正案，規定逾 50% 的資本及大多數董事都由外國政府委任的銀行，必須在法令實施之日起 3 個月內停止營業，因為這類型的銀行在擴展活動時，或對馬來亞經濟安全及政治的獨立性產生威脅（南洋商報，1958）。當時馬來亞境內僅有中國銀行觸犯這條法令（The New York Time, 1958; 南洋商報，1959）。由於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懼共和仇共的心態眾所皆知，「聯邦銀行法」修正案被視為馬來亞針對中共專門制定的法令（賀艷青，2016）。中國銀行後來於 1959 年 3 月 30 日在馬來西亞全面結業（The Straits Times, 1959）。


隨著馬來亞共產黨於 1989 年 12 月 2 日宣佈解散，1990 年代起馬來西亞和中共才開始熱絡。從 1990 年代起至馬哈迪於 2003 年卸任止，馬哈迪共訪中國 5 次；相較馬中於 1974 年建交後，前兩任首相拉薩和胡先翁（Hussein Oon）任內僅各訪問中共一次，馬哈迪於 1981 年宣誓就任首相後，於整個 1980 年代也僅訪問中共一次，1990 年代後的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態度轉變相當明顯，馬哈迪甚至在兩國於南海仍有主權的紛爭下，公開認同李鵬關於「中國不會有威脅」的說法（星洲日報，1993）。中共則以支持馬哈迪倡導的「東亞經濟核心會議」、要求聯合國檢討世界人權宣言的言論作為回應。1992 年，中國銀行高層在中共高層支持下拜會馬哈迪和時任財政部長安華（Anwar Ibrahim）時，提出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復辦的請求。馬中在經過 7 年的協商後，終於在馬來西亞舉行第十屆全國選舉前 5 天，邀請朱鎔基前來官訪之時把復辦之事定案。



關於馬來西亞對中共態度的轉變，學界都大致認同與經濟相關。1987年，馬哈迪因為1980年代的國家經濟不景氣，使其政權於1987年受到馬來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an, 巫統）黨內同志挑戰，以至他自此認定唯有發展國家經濟並與世界經濟接軌，才能保障其政權。馬哈迪於1991年的第六馬來西亞計劃中提出「2020年宏願」，使馬來西亞於2020年成為先進國，而具有龐大市場潛力的中共，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馬來西亞不能忽視的國家，經貿合作遂成為馬來西亞自1990年代起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基石（Liow, 2000; Kuik, 2013a）。儘管如此，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戒心並沒有完全鬆懈。馬來西亞在馬哈迪領導下，除了雙邊關係外，也致力與中共發展區域性的共同合法權益及功能上的互賴（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為的是要使中共若意圖打破這份關係就得付上慘重的代價；軍事上，馬來西亞仍舊以反叛亂為定位，就是因為仍把中共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Acharya, 1999）。馬哈迪對中共的友善，雖然也是為了減少區域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經上的影響力，但馬來西亞和美國在軍事上的密切互動卻也始自90年代，Kuik（2013a）就稱馬來西亞葫蘆賣的藥，實際上就是以中制美，以美制中的避險（hedging）策略。因此，對於曾經被視為對國家經濟安全 and 政治獨立性產生威脅的中國銀行在馬復辦，尤其商議過程長達7年，遠比馬中建交談判僅進行10個月還久，而復辦的時機點竟然是在選舉前5天，此事反映多元啟發論所主張，是馬哈迪為了鞏固政權，模仿拉薩在25年前，即1974年第四屆選舉前與中共建交打「中國牌」的手法影響選舉結果。若是如此，馬哈迪為了鞏固政權又把國家利益置於何地，這是本章探究的重點。

第一節 馬中關係的升溫

馬中於1974年建交後，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態度並未因為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從敵視態度轉換為友好，究其原因，是中共拒絕在聯合公報中白紙黑字承諾放棄對馬共的支持。從第三章的分析中我們瞭解拉薩是為了贏得1974年的大選，才在馬中建交公報上大筆一揮，接受中共對馬共的態度。儘管馬中終究建交了，但不代表拉薩在心理層面全然接受中共的作法，建交後馬來西亞仍舊視中共為國家最大的威脅



(Kuik, 2008)。建交前後唯一最大的差別，僅在於建交後拉薩和繼任的胡先翁，不再如同東姑時代公開指責中共是馬來西亞國家安全的威脅，但兩任首相的作法則是把馬中的互動減至最低。自從拉薩為了建交訪中後，胡先翁於 1976 年至 1981 年出任首相期間，也僅於 1979 年訪中一次；至於中共方面，上世紀 80 年代以前，也僅有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於 1978 年訪馬的記錄。馬哈迪 1981 年上任首相職後，對中共的防備與前首相們不分軒輊，整個 1980 年代，馬哈迪僅於 1985 年拜訪中共一次，至於中共高層也僅有時任總理趙紫陽於 1981 年和時任副總理田紀雲於 1986 年到訪。直到進入 90 年代後，馬來西亞和中共的關係才表現得熱絡起來。從 1993 年起直至馬哈迪於 2003 年卸任止，馬哈迪共訪北京 5 次，打破馬中建交後馬來西亞領導人訪問中共的次數。中共方面則有中共總理李鵬（1990 年和 1997 年）及朱鎔基（1999）；國家主席楊尚昆（1992 年）及江澤民（1994 年和 1998 年）；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1995 年）；副總理朱鎔基（1996 年）及李嵐清（2003）；和副主席胡錦濤（2002 年）。相較馬中建交至 1990 年前的 16 年間，歷任馬來西亞首相僅訪問中共 3 次，90 年代後的 13 年間，僅僅馬哈迪以首相身份訪中就有 5 次，增幅近一倍；反之中共高層在 90 年代前僅訪問馬來西亞 3 次，90 年代後則有 10 次，漲幅三倍以上，由此可見兩國關係的突飛猛進（表 4-1）（表 4-2）。

馬中關係在 90 年代的升溫並非橫空出世，主要原因是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最大疙瘩——也即是馬共終於決定停止武裝鬥爭，使馬來西亞以「威脅基礎」（threat-based）作為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正式畫上句點（Liow, 2000）。事實上，早在象徵冷戰的柏林圍牆於 1989 年 11 月 9 日倒塌之前，中共政協主席鄧小平自 1981 年起，就鼓勵馬共和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和平協議（陳平，2004），但直到馬共開始意識到本黨領導層的老化（最高齡者 70 餘歲，一般也逾 60 歲）及欠缺年輕成員的加入（The Straits Times, 1989），馬共才醒悟要成立一個馬來亞共和國，已經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1989 年 12 月 2 日，在經過約一年半與馬來西亞和泰國政府的談判後，馬共以秘書長陳平為代表，在泰國分別與馬來西亞和泰國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1188 名遊擊份子同意放下武器停止叛亂行為重返平民生活，結束為期長達 41 年對馬來西亞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馬來西亞政府也同意在適當時候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The New York Times, 1989a; Berita Harian, 1989）。在馬共意圖透過武力建立馬來亞共和

國的這段期間，共有 1800 名馬來西亞安全人員和平民百姓因馬共的攻擊死亡，馬共方面有 6000 人死亡、1000 人被逮和 2000 人自首（Berita Harian, 1989）。



表 4-1：馬來西亞首相 1979 年至 2003 年間訪中列表

拜訪年份	馬來西亞首相	拜訪的中共高層	
1979	胡先翁	華國鋒	中央委員主席*
1985	馬哈迪	李先念	國家主席
1993		江澤民	國家主席
1994			
1996			
1999			
2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作出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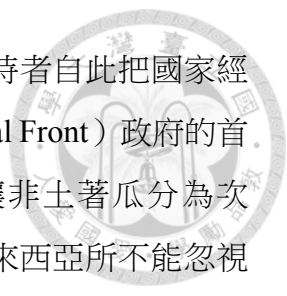
* 中共於 1978 年的第三部憲法規定廢除國家主席職，國家主席的相關職務賦於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行使，直到 1982 年通過第四部憲法後，才恢復國家主席職。

表 4-2：中共高官 1978 年至 2003 年間訪馬列表

拜訪年份	中共高官與職銜		時任馬來西亞首相
1978	鄧小平	全國政協主席	胡仙翁
1981	趙紫陽	總理	馬哈迪
1986	田紀雲	副總理	
1990	李鵬	總理	
1992	楊尚昆	國家主席	
1993	江澤民	國家主席	
1995	李瑞環	全國政協主席	
1996	朱鎔基	副總理	
1997	李鵬	總理	
1998	江澤民	國家主席	
1999	朱鎔基	總理	
2002	胡錦濤	副主席	
2003	李嵐清	副總理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中共外交部網頁作出整理。

過去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巫統精英把中共視為國家威脅的源頭始於馬共，馬共的解散也就使得巫統精英自獨立前延續下來的中國威脅想像消亡大半。由於 1987 年



的國家經濟蕭條曾經讓馬哈迪面對政權挑戰的威脅，馬哈迪和支持者自此把國家經濟安全等同於馬哈迪和巫統及由巫統主導的國民統一陣線（National Front）政府的首要利益。在這當中，改善土著經濟地位為重，擴大經濟大餅讓非土著瓜分為次（Kuik, 2013a），因此中國的龐大市場自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馬來西亞所不能忽視的。簡言之，馬哈迪以外交關係為手段，完成他在國內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自己、巫統和國陣的政權永固（Liow, 2000）。

為了向中共表達善意以利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馬來西亞政府率先移除可能對雙方經貿關係造成影響的障礙，如 1990 年廢除馬來西亞人到中共旅遊的禁令、1993 年取消個人到中國投資的限制等（Storey, 2011），馬哈迪更拒絕跟隨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起舞，在 1993 年拜訪中共總理李鵬時，明確表達認同李鵬的「中國不會有威脅」的說法（星洲日報，1993），之後再於江澤明於 1994 年訪馬時重申「中國絕非馬來西亞敵人」（光華日報，1994）。除了馬哈迪外，其他巫統部長如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前後兩任國防部長賽哈密（Syed Hamid Albar）和納吉（Najib Razak）也在馬哈迪任內陸續發表類似看法⁴⁶。對於馬來西亞親中的立場，馬哈迪曾在牛津大學的演講時回答學生的詢問時表示，如果馬來西亞鬥不過中共，不如和他們做朋友，而且如果把中共視為敵人，中共也會視馬來西亞為敵人，中共有 12 億人口，還不如和他們做朋友（星洲日報，1996b）。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顯示，馬來西亞對中共的出口額於馬哈迪相隔七年後的 1993 年二度訪中，從 1992 年的 7 億 7200 萬美元增加至 1993 年的 12 億 400 萬美元，馬哈迪於 2003 辭去首相職時更達 68 億 1000 萬美元；兩國貿易額也從 1992 年的 17 億 4700 萬美元增至 1993 年的 23 億美元，2003 年時更達 141 億 1000 萬美元。不過相對於馬來商人，Storey（2011）指出華商在中國取得的投資和經貿機會更理想，這與馬哈迪原先想要扶持土著經濟地位的想法背道而馳，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因為馬來西亞國內限制華商經濟活動的政策，讓華商比土著商人更願意到中國尋找

⁴⁶ 賽哈密指出中共崛起成為另一個軍事強國是無可避免之事，但馬來西亞不認為中共會成為區域和世界安全的威脅（星洲日報，1996a）；安華援以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個強國卻從未侵占他國為例，因此認為強大的中共依舊會對周遭國家不構成威脅（星洲日報，1997）；納吉相信已經崛起成為強國的中共，不是個會對區域安全構成威脅的野心國家，而是一個溫和的強國（星洲日報，2003）。

機會，此外華商也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優勢，得以比馬來商人的發展更出色。



表 4-3：馬中經貿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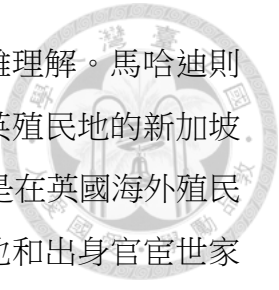
年份	馬來西亞對中出口額（億美元）	貿易額（億美元）
1992	7.72	17.47
1993	12.04	23.00
1994	19.33	32.96
1995	18.89	35.98
1996	18.92	37.58
1997	18.52	40.84
1998	19.94	38.43
1999	23.18	44.57
2000	30.28	62.65
2001	38.21	76.25
2002	52.53	114.10
2003	68.10	141.10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歷年資料自製。

第二節 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馬中關係於九十年代突飛猛進，除了馬共的解散、馬哈迪採經濟務實政策外，也與馬哈迪的個性和國際情勢氛圍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馬哈迪任相後，徹底顛覆馬來西亞過去三任首相親西方陣營的外交政策，躍身一變成為一個反西方國家的急先鋒，並且積極發展區域主義（Liow, 2000）。

馬哈迪與前三任首相迥異的作風，與他相異於前三任首相的成長背景相關（Saravanamuttu, 1996）。東姑和拉薩分別來自皇室和貴族家庭，兩人都曾到英國就讀法律學系並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胡先翁來自官宦世家，曾在印度就讀於英國開辦的陸軍官校（Indian Military Army）（Perdana Leadership Foudation, 2018a, 2018b, 2018c）。三人的出身背景，使他們在英殖民制度下成為即得利益者，再加上三人都曾在海外接受英式教育，難免對英國培養出深厚的依賴和信任基礎，因此他們在冷



戰時代主導的馬來亞／馬來西亞外交政策傾向西方陣營，自是不難理解。馬哈迪則來自小康之家，從未曾到海外就讀，其醫學系學位是在當時仍是英殖民地的新加坡取得（Perdana Leadership Foudation, 2018d）。雖然他和胡仙翁都是在英國海外殖民地取得最高學位，但馬哈迪出身庶民且不太富有的家庭背景，讓他和出身官宦世家的胡先翁對英國殖民制度和二戰時日本 3 年 8 個月的殖民經驗感受不一樣，甚且培養出他好鬥和堅韌的個性，和非黑即白的世界觀（Khadijah, 2011）。馬哈迪在其 1971 年出版的「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書中，就直稱英國是馬來西亞資源和利益的掠奪者（Mahathir, 1970）。這樣的話語是從未在前三任首相的說法中聽聞的。

壹、「最後才買英國貨」

馬哈迪上任首相職甫 6 個月即對英國發難，在國內推動「最後才買英國貨」的抵制政策。1970 年代，英國把每年學費從原本的 325 英鎊調漲至 940 英鎊，造成 1 萬 5500 名留英馬來西亞生極大的負擔，後來 1979 年英國又拒絕馬來西亞接管英國公司如 Sime Darby 和 Harrison 等，促使馬哈迪一怒之下宣佈這項政策（Wariya, 1989）。不過，馬哈迪此舉也很可能是為了激起馬來西亞民眾對英國的不滿，以便勾起英殖民時期的負面情緒，讓他在稍後推動「向東學習」政策時，不會引起馬來西亞民眾太大的反彈（Saravanamuttu, 1996）。須知，日本於二戰時在亞洲地區的惡行惡狀，仍被馬來西亞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著。「最後才買英國貨」事實上是一種藉著醜化英國，破壞馬來西亞民眾對前殖民者的依戀和崇拜，再趁著馬來西亞民眾心目中的依戀和崇拜空間被掏空時，奉送上新的依賴和崇拜對象，也就是「向東學習」的對象日本。馬哈迪的「向東學習」雖然包含了日本和韓國，但僅有日本是經常被馬哈迪掛在口邊的學習對象，馬哈迪希望馬來西亞員工學習日本人嚴謹的工作倫理及有效率的工作態度，也勸導馬來商家們學習日本公司的管理技巧。對馬哈迪而言，「向東學習」也是為了要減少馬來西亞對西方國家經貿上的依賴（Shome, 2002）。



貳、向東學習

馬哈迪在 1980 年代對日本有高度的評價，但馬哈迪卻仍舊能保持高度理性看待馬日關係。馬哈迪在一份 1983 年給政府官員的備忘錄中提到：「向東政策不是購買所有東方國家的貨品、讓東方國家的公司取得所有合約，除非他們提供的貨物和合約都是最佳的。」一年後，馬哈迪指控日本對馬來西亞是抱持著一種殖民式的心態，因為日本拒絕廢除對馬來西亞產品的貿易保護障礙（protective trade barrier），加上雙邊合作項目缺乏技術轉移或技術轉移速度緩慢、日本跨國公司透過轉移定價避稅等，但壓垮馬哈迪對日本好感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日本拒絕馬來西亞國營公司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與美國西北東方航空（Northwest Orient Airline）合作的新航線飛經日本，儘管馬哈迪親自出面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對談後事情得以擺平，但卻足以使得馬哈迪暫時終止他的「向東學習」政策（Saravanamuttu, 1996）。一直到 1991 年制定「第六馬來西亞計劃」時，馬哈迪喊出「2020 年宏願」以使馬來西亞於 2020 年成為發展國家後，「向東學習」的口號才再次復甦。馬哈迪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日本和南韓的崛起，顯示亞洲國家也能如同西方國家般傑出。日本的發展尤其理想，足以讓她買下整個美國。」不過馬哈迪的「向東學習」不久後又觸礁，主因在於馬哈迪於 1990 年 12 月提出「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原本屬意日本或中共扮演這個「禁止白人國家」加入的區域組織領袖，但與美國交好的日本卻因為馬哈迪的「禁止白人國家」論相當尷尬，遲遲未有正式回應接受馬哈迪的建議（Furuoka, 2007）；反之 1993 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馬時，卻明確表達對「東亞經濟核心會議」的支持（南洋商報，1993）。爾後中共也經常肯定馬哈迪的各種言論和建議，例如要求聯合國檢討「世界人權宣言」（光華日報，1997）、馬來西亞不畏歐美強權在人權課題上施壓的態度（南洋商報，1999f）等，及至中共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堅持不貶低匯率，使得馬來西亞已重創的幣值不至於雪上加霜讓馬哈迪無限感激（南洋商報，1999g），馬來西亞與日本因此漸行漸遠，反倒和中共越行密切（Saravanamuttu, 1996）。就在馬哈迪任期的最後一年時，馬哈迪更揚言向東學習的對象也應包含中共，因為中共已經開放，並且成功之處值得馬來西亞學習（星洲日報，2002）。



參、與美國的既衝突又合作

馬哈迪任內的馬來西亞和美國關係，是一種批判和合作的綜合體（Baker, 2004），因為馬來西亞既需要在經濟和國防安全上和美國合作，但卻在政治上與美國水火不相容（Martin, 2008），尤其是在人權課題之上。馬來西亞對美國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展現了馬哈迪的務實性和倔強性。自從英軍於 1970 年代從馬來亞和新加坡撤軍後，馬來西亞就和美國軍隊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雖然馬來西亞始終未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但兩國卻是在馬哈迪任期內，於 1994 年建立起制度化的關係，例如於 1994 年簽署「物資服務相互提供協議」（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1995 年簽署「海上聯合戰備與訓練」（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CARAT）、美國海軍定期與馬來西亞聯合演習等。在經濟方面，美國從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就是馬來西亞最大的投資者，1990 年時美國在馬來西亞的投資額為 15 億美元，2000 年時則已達 60 億美元（Kuik, 2013b）。

可是在政治課題上，馬美之間卻因數起事件火藥味十足，最引人側目的當屬包括「東亞經濟核心會議」的設立，和馬來西亞人權紀錄和民主制度。由於馬哈迪倡導設立的「東亞經濟核心會議」拒絕東亞區域以外的國家包括美國加入，美國視其為將對美國也參與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形成挑戰，尤其相對於前者，「……（『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不會將亞太區域從全球切隔開來」（……It will not cut of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the rest of the globe）。馬來西亞則反唇相譏美國做賊喊抓賊，因為美國參與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還有僅限歐洲國家參與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就是兩個僅優待會員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The New York Times, 1991; Mahathir, 1992）。

馬來西亞人權紀錄和民主制度開始和美國陷入爭議，始自美國總統克林頓於 1993 年上任後，雙方爭辯重心在於「亞洲價值」與「西方價值」（Kuik, 2016）。柯林頓以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t）為大戰略，將自由民主制、人權和市場開放列入美國外交政策目標，正好和馬來西亞的干預型經濟政策和專制政體是完全相反的立場（Nesadurai, 2004）。馬哈迪 1994 年訪問北京時，就曾數次炮火猛攻克林

頓的「西方價值」。馬哈迪堅稱西方民主模式不適合馬來西亞，因為若馬來西亞也如西方國家般固定出現政權輪替的現象，將使馬來西亞陷入不穩定並打擊國家經濟成長，他也反諷西方國家容忍波斯尼亞的種族滅絕行動，卻指責馬來西亞的民主不充份，尤其當西方國家強硬要求馬來西亞實施民主制度時，西方國家又何以民主了？對於也遭受西方國家指責人權紀錄不良和專制的中共，馬哈迪表示他能夠體會中共領導人的做法和難處，因為「亞洲國家直覺上明白中國要做甚麼，及企圖做些甚麼」（光明日報，1994；星洲日報，1994）。從馬哈迪說法可以發現，西方國家的打壓使他情緒上得以聯結中共和其他亞洲專制政體國家，產生一種共同被壓迫的「我群」認知，甚而勾勒出過去被西方殖民的怨恨，因而展現出亞洲經濟起飛後，對抗西方國家試圖干預亞洲國家內政時的自信。與馬哈迪有相同感受的不僅是中共，還有當時許多亞洲專制政體的領導人包括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亞洲價值」⁴⁷於焉誕生，以做為一種對抗「西方價值」的觀點和立場（Hoon, 2004）。

不過馬來西亞就人權和民主課題真正陷入緊張情勢，當屬馬哈迪將副首相安華開除後再以未審先判的「內安法令」將安華扣押的「安華事件」（Kuik, 2016）。美國副總統高爾代表柯林頓到在吉隆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致詞時，當著馬哈迪和一眾馬來西亞政府官員的面，肯定安華發起並在安華入獄後依舊持續進行的「烈火莫熄」示威運動，並稱反馬哈迪政府的示威者「勇敢」，馬哈迪事後嚴厲指責美國意圖干涉馬來西亞內政，其他馬來西亞政府官員也對高爾的致詞表達極度不滿，並把馬來西亞國內若因此發生暴亂將把相關責任歸咎美國（The New York Times, 1998a; 1998b）。正當全世界的鎂光燈聚焦在美國當眾撻伐馬哈迪的不民主和無人權的專制手段時，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卻在此時雪中送炭，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會議中仍舊與馬哈迪會面，並且宣稱中共絕不干涉馬來西亞的內政（The New York Times, 1998b;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8a）。馬哈迪在不到一個月後的巫統大會中，進一步抨擊美國利用安華事件意圖破壞巫統政府，以

⁴⁷ 「亞洲價值」不應被視為一個具有同質性主體的文明陣營（civilizational bloc），因為很難證實中國、韓國和馬來西亞的「亞洲價值」具有一樣的價值，例如中國和韓國偏於儒家文化，而馬來西亞則為伊斯蘭文化，也因此得以說明做為對抗西方文明的「亞洲價值」，對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領導人而言是屬於流動性的（Hoon, 2004）。

達成殖民馬來西亞的目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8b）。兩國關係在政治層面上的惡劣由此可見。



第三節 選前的國內背景

1999年11月10日，馬來西亞宣佈解散第九屆國會，第十屆全國選舉投票日較後訂於11月29日。儘管當時馬來西亞經濟已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強勁復甦，尤其第二季度經濟成長比前一年同期增長4.1%（Felker, 2000），但1年2個月前，也就是1988年9月，馬哈迪以疑是涉嫌貪污及發生不正當性行為為由，開除時任副首相安華並將安華逐出巫統之舉，也就是引起國內外極大關注的「安華事件」。馬哈迪此舉，嚴重動搖馬來社會對巫統的支持，不少巫統支持者倒戈支持安華夫人旺阿茲莎（Wan Azizah Wan Ismail）為夫討公道成立的國民公正黨（National Justice Party）⁴⁸（Cheah, 2002）。這場選舉因而被視為「馬哈迪—安華」的對壘（Shome, 2002）。馬來人社會的分裂，使得華人成為國陣固守政權不得不積極爭取的對象。

壹、安華事件與後續發展

1998年9月1日晚上，馬哈迪宣佈開除副首相安華的職務，指控他涉嫌貪污及進行不正當性行為。安華曾於1991年至1998年間擔任財政部長職，並從1993年起同時兼任副首相和財政部長，直到馬哈迪於1998年9月以洩露國家機密、貪污、違反自然性行為等10項罪名革除他上述兩個職位止。被革職後的安華，與支持者發動名為「烈火莫熄」（*Reformasi*）的示威活動意圖罷免馬哈迪，安華並在全國各地展開演講指控馬哈迪貪污、朋黨主義和裙帶關係。安華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間政府推動親馬來人政策的推手，因而成為馬來社會寵兒，在「烈火莫熄」運動中獲得以馬來人為主的群眾參與響應，其中許多是年輕和在此之前對政治冷漠之人（Weiss, 2000）。安華被革職後的18天也即是9月20日，遭警方援引可未審先判的「1960年

⁴⁸ 2003年8月，國民公正黨與馬來西亞人民黨（Parti Rakyat Malaysia）合併，改名為「人民公正黨」，簡稱一樣為公正黨（People's Justice Party）。

國內安全法令」⁴⁹，以貪污和違犯自然性行為罪名逮捕入獄（The New York Times, 1998c）。安華的入獄，引起馬來社會更進一步的不滿，其夫人旺阿茲莎（Wan Azizah Wan Ismail）於 1999 年 4 月 4 日趁勢成立以跨族群福祉為訴求目的的公正黨，較後公正黨、馬來西亞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和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結成聯盟關係，以在第十屆選舉中共同挑戰國陣的執政權（Cheah, 2002; Felker, 2000）。


貳、華社對安華事件和其他課題的反應

馬來社會對於「安華事件」的激烈反應，使得對巫統的支持度出現分裂，馬哈迪和國陣深知若要在下屆選舉中穩定政權，就得積極爭取華人選票。按馬來西亞統計局發佈的人口結構顯示，1990 年的馬來西亞約有人口 1500 萬人次，馬來人佔 57.8%（約 843 萬人次），華人佔 29.1%（約 423 萬人次）（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只要華人選票不分裂，國陣政權就將無虞。

相對於馬來社會在「安華事件」上的激裂反應，華人社會的表現普遍冷淡（光華日報，1999d）。華人有如此的表現，主要原因為二：（一）「安華事件」和「烈火莫熄」運動是馬來人社會課題，華人最好不要插手干預（Chin, 2000）；（二）安華於 1980 年代末擔任教育部長時期，在處理華教課題上被視為有使華教變質的意圖，甚至引發政府逮捕參與「茅草行動」的支持華教示威者⁵⁰，許多華人自此對安華埋下深刻的的不滿。不過由於馬哈迪開除安華副首相職和警方逮捕安華的手段過於粗暴，仍有一些華人參與「烈火莫熄」運動（Felker, 2000）。為了確保華人不會被「安華

⁴⁹ 「1960年國內安全法令」，簡稱內安法，於東姑阿都拉曼任內為對付共產黨員而制定，允許警方在未經過法院審判，扣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者 60 天。60 天屆滿後只要獲得內政部長授權，在沒有充分證據之下可再延長扣留兩年，兩年屆滿後可無限期的更新和延續（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2006）。

⁵⁰ 1987 年 10 月安華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政府委派了不諳華文的教師到華文小學，擔任包括校長在內的四個行政高職，讓華教人士擔心此舉將引發華小變質。由於茲事體大，馬華、民政黨和行動黨三個華基政黨首度發下政治上的歧見，跨黨派聯同民間團體發動華小罷課抗議行動。儘管政府同意與華社協商後罷課行動就已取消，但安華卻煽動巫統青年團召集萬人大會譴責罷課行動的領導人，間接引發馬哈迪以種族關係為由，展開逮捕涉及此次事的各族群人士逾百人，並勒令華、巫和印各一家報館停刊，史稱「茅草行動」。雖然下令逮捕的是馬哈迪，但整起事件的始作俑者為安華，華社對安華的心結於此結下。



事件」影響因而產生反國陣政府的心態無限擴張，國陣政府採用「製造恐懼氛圍」為反制手法。首先，國陣的政治人物一再重覆的向華人社會喊話，倘若華人支持「烈火莫熄」運動，惟恐演變成 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或剛於印尼發生的排華暴動事件。須知「烈火莫熄」雖然主要由馬來人動員，但那只是馬來西亞全體馬來人中的部份馬來人，還有另一部份馬來人是相信馬哈迪對安華的指控，認同馬哈迪把安華去職的做法。與「五一三事件」不同的是，「五一三事件」是馬來人與華人兩大族群的對壘，但「烈火莫熄」運動一旦演變成爆動，則是支持安華的馬來人對壘支持馬哈迪的馬來人，以華人在馬來西亞的人口結構僅能為陪跑的角色，演變成「五一三事件」2.0 或印尼排華暴動的可能性不太高。但無論如何，這番恐赫觸動不少華人，讓更多原本對安華就已經沒有太多好感的許多華人，更加不願意因為司法疑是不公而聲援安華（Chin, 2000）。

1998 年 9 月 20 日，身為反對黨的公正黨、伊黨⁵¹、人民黨和行動黨組成「替陣陣線」⁵²（Alternative Front），以在來屆選舉中對抗國陣霸權。相對於國陣成員黨以巫統馬首是瞻，並且成員黨間的政黨利益有重疊的部份，替陣三個成員黨的目標除了取代國陣執政外，各黨之間的價值信仰有不少矛盾 -- 公正黨的成立是為安華討回司法公道、伊黨是為了推動修改憲法使馬來西亞成為伊斯蘭國、人民黨是個左翼政黨，行動黨則是鼓吹成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其中尤以伊黨和行動黨的結盟尤為矛盾，因為伊黨的伊斯蘭國概念，是馬來西亞不分族群和宗教人口都受制於伊斯蘭宗教律法規範，至於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則是爭取各族群的宗教文化在馬來西亞都獲得平等待遇，彼此都被世俗法約束。替陣的成立因而被普遍認知為各反對黨，為了奪取執政權才結合在一起的權宜之計（Cheah, 2002）。這樣的聯盟讓國陣政治人物有機可趁，向抗拒伊斯蘭國概念的華裔選民宣傳，若替陣奪得政權，伊黨將把伊斯蘭刑法落實至全國各層面，穆斯林與否都得接受伊斯蘭法約。這無疑讓華人對於替陣的誕生和政權輪替的想法，無法燃起太多的

⁵¹ 伊黨於 1973 年加入國陣，但已於 1997 年退出國陣，再度在野。

⁵² 替陣原本是 4 個成員黨，後人民黨和公正黨於 2003 年合併。替陣成立後，伊黨始終不願意放棄執政後修憲使馬來西亞成為伊斯蘭國的目標，讓反對伊斯蘭國概念、選民為基本盤為華人的行動黨受到選民置疑。美國發生 911 的恐怖攻擊事件後，行動黨遂於 2001 年 9 月 21 日宣佈退出替陣。爾後，因為選區爭議，替陣於 2004 年 3 月 21 日，也就是第十一屆全國選舉結束後正式解散。

熱情。儘管如此，替陣仍舊嘗試挑起與華社相關的課題，希望引起華社對國陣政府的不滿把選票投給替陣。相關課題計有拉曼學院升級⁵³、立百病毒⁵⁴等事件，但在馬華公會的處理和馬來西亞媒體附和國陣政府的政策之下，沒有在華社形成太大的效應（Chin, 2000）。不過世事無絕對，若要保證華人選票安全無虞，馬哈迪和巫統的政權不會受到威脅，或許還要一些動作才行。

第四節 選前的馬中高官互訪

第十屆選舉之前百日之內，馬哈迪前往中國展開3天2夜官訪行程，之後朱鎔基也在馬哈迪的邀請下，在馬哈迪官訪後約3個月到馬來西亞訪問。馬哈迪訪中返馬後的百日內解散國家，與1974年第四屆選舉前拉薩的作法如出一轍。令人意料之外的倒是朱鎔基在競選期間，竟然應馬哈迪的邀約到馬來西亞訪問，雖然朱鎔基在馬期間未對選情指指點點，但朱鎔基對馬哈迪和政府的美言卻被媒體廣泛的報導，朱鎔基儼然化身馬哈迪和國陣的超級助選員。

⁵³ 隨著馬哈迪宣佈僅招收馬來學生的瑪拉工藝學院（MA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將升等為大學後，華人社會也發起升等拉曼學院的要求。拉曼學院是在馬華公會領導下，成立於1969年2月24日，做為華社要求以華語為媒介語的大學要求的回應，儘管拉曼學院的教學媒介語是以英語為主，並且被定位為一所對應瑪拉工藝學院的學校。馬華當時回覆華社為若拉曼學院升等，學生的族群比例將按「族群配額制」調整為馬來人55%，華人45%，而非按學生的成績招收，此舉成功抑止華社的不滿。

⁵⁴ 1998年馬來西亞爆發人畜共通的「立百病毒」（Nipah virus）傳染病。由於國陣政府一開始無法確認病毒，無法採取有效的處理方式。直至確認病毒之時，已有約50人死亡，政府最終祭出的解決方式是撲滅已確認為感染區域的所有豬隻。為了扶助受害豬農，政府對每頭被殺的豬隻賠償金是馬幣50令吉（約台幣500元），並提供重新展開生意的資金。對此，豬農是不甚滿意的，因為他們原先要求每次豬隻的貼償金為馬幣200令吉（約台幣2000元），政府的賠償僅及他們要求的四分之一。此外由於豬農幾乎都是華人，他們與行動黨大致抱持共同的想法--若此次受害者為馬來人，他們所能獲得的賠償配套將會相對理想（Chin, 2000）。不過這個課題未能成功在華人之間引起太多的回應，主要是國陣政府提示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在選舉期間不建議有相關報導，而華文報紙擔心出版准證被吊銷，接受了政府的意見（Chin,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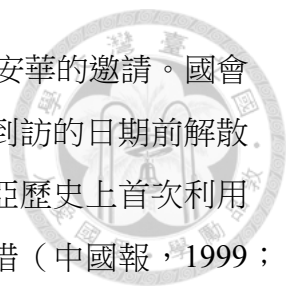
壹、馬哈迪第五度訪中

1999年8月18日至20日間出訪中共，是馬哈迪就任首相以來第五度訪中。官方宣稱此行旨為加強雙邊貿易及投資關係，同時也為了慶祝馬中兩國建交25周年，馬哈迪特地為朱鎔基在北京設立一場晚宴（光華日報，1999c）。無論在這趟訪問的前、中或後期，坊間都紛紛猜測馬哈迪是否會如同拉薩於1974年官訪中國後，宣佈解散國會舉行第十屆大選，因為展現在此趟官訪中的馬中兩國友好關係，必然取得以華裔為主的選民支持（光華日報，1999d）。馬哈迪在結束中共官訪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則表示此趟官訪並非為了選舉布署，至於回國後會否仿倣拉薩返抵國門不久就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他則稱「還沒有靈感，不知是否該學拉薩那樣」，不過他卻肯定拉薩當年的作法「適合當時情況」（光華日報，1999f），因為拉薩當年與中共建交返國後，在經過民調確定當時選情對國陣有利後，才宣佈解散國會（Baginda, 2016），所以馬哈迪口中的「沒有靈感」和「適合當時情況」，應可解讀為國陣尚未展開民調，也尚未知曉選民對馬哈迪此行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馬哈迪此趟訪中前後，「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復辦的課題都一再被馬中駐外官員或馬來西亞華裔商人提及，大家都紛紛高度期盼馬哈迪此行，將促成兩國簽署復辦的文件（光華日報，1999c；星洲日報，1999b；1999c；南洋商報，1999g）。不過馬哈迪此行卻仍未把「中國銀行」復辦一事定案，甚至馬哈迪和朱鎔基會面時也未提及，使得這項自1992年以來一直在推動的事件，似乎又因故僵持不下，暫無下文。反之兩國卻在原則上同意在馬來西亞增設中國領事館、允許更多的中國商家更容易取得入馬簽證、簽署兩項與科學和工程領域相關的備忘錄，及在沙巴設立價值12億美元的紙漿廠（星洲日報，1999d）。

貳、朱鎔基訪馬

一如馬來西亞坊間所料，馬哈迪於8月20日結束的中國官訪後，於同年11月10日宣佈解散國會，投票日則定在19天後的11月29日。不過朱鎔基在選前8天，應馬哈迪之邀到馬來西亞進行5天4夜官訪，時機的敏感性引起側目。這是朱鎔基第二



度訪馬，第一次訪馬時是於 1996 年，以副總理身份應時任副首相安華的邀請。國會反對黨領袖林吉祥在朱鎔基抵馬前，公開抨擊政府刻意在朱鎔基到訪的日期前解散國會，利用朱鎔基打「中國牌」爭取華人選票，並稱這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首次利用外國領導人直接或間接涉及馬來西亞的選舉，是極度不恰當的舉措（中國報，1999；星洲日報，1999e）。儘管朱鎔基抵馬後，聲明無意干涉馬來西亞選情（光華日報，1999b），而是 3 個月前馬哈迪訪中時對他提出邀請時就把日期訂在這個時候，而馬哈迪在馬來西亞解散國會後也未要求他取消行程，他才按照原先的約定的日子前來馬來西亞（南洋商報，1999h），他還刻意強調在馬來西亞官訪期間閱報時故意不讀與馬來西亞選舉相關新聞（光華日報，1999g），朱鎔基在 5 天 4 夜的訪馬行程中也確實未曾對馬來西亞選情發表過任何的意見和看法，但官訪前後馬來西亞中文媒體都大幅報導朱鎔基對馬來西亞的看法，例如抵馬前一天，媒體報導朱鎔基稱「兩國有廣泛共識，馬中關係發展勢頭好」（星洲日報，1999c）、抵馬後與馬哈迪會面時表示「馬中關係，近年處於最好時期」（星洲日報，1999d），並稱競選期間訪馬才能顯視兩國關係的彌足珍貴（星洲日報，1999e）。此外朱鎔基也不忘肯定馬來西亞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表現（南洋商報，1999a）及宣佈支持馬哈迪改革國際金融體制（南洋商報，1999b）。朱鎔基訪馬期間的確沒有對馬來西亞的選情指指點點，但卻對馬哈迪和國陣政府讚譽有佳，經過華文報章廣泛的報導，身為中國總理的朱鎔基此時已是「無聲勝有聲」了。

與此同時，馬中雙方討論長達 7 年、比馬中建交談判僅 10 個月還多好幾倍的「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復辦一事，也在選舉的敏感時機下於馬哈迪和朱鎔基的見證下，終於簽署了復辦備忘錄（星洲日報，1999a）。中國銀行原於 1939 年在馬來半島成立首家分行，爾後更擴展至 4 家。1959 時因馬來亞國會通過「聯邦銀行法」修正案，規定逾 50% 的資本及大多數董事都由外國政府委任的銀行，必須在法令實施之日起 3 個月內停止營業，因為這類型的銀行在擴展活動時，或對馬來亞經濟安全及政治的獨立性產生威脅。當時全馬來亞境內僅有中國銀行觸犯這條法令，中國銀行被公認為中共政府對外的金融機構，以東姑政府當時懼共和仇共的心態認為，既然拒絕在建國時主動釋放與馬來西亞建交善意的中共，若繼續允許中共的代表銀行在馬來西亞營業，也就違反馬來亞的外交親西方陣營的立場（Baginda, 2016），東姑



政府透過法令迫使中國銀行在馬來亞結業的思維脈絡是可以理解的。直至 1992 年 10 月，適逢中國銀行高層代表團拜訪時任首相馬哈迪和時任財政部長安華，基於馬中兩國經貿的快速發展⁵⁵，提出復辦中國銀行的意願。此要求並獲得中共政府向馬來西亞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的支持。兩國自此經過 7 年的商議，安華和中共第一副總理兼中國銀行行長朱鎔基也在前者於 1994 年 8 月訪問中共，和後者在 1995 年 5 月訪馬時兩度談及中國銀行復辦課題。早前馬哈迪也曾於 1995 年 1 月宣稱馬來西亞政府正在修改銀行法，給中國銀行開個方便之門，同年 10 月時任財政部副部長黃思華正式宣佈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設立的障礙已解除，翌年 1996 年 11 月黃思華接受國會質詢時表示，預料中國銀行分行將於 1997 年中旬在馬來西亞設立（星洲日報，1999i），但無論馬來西亞商人以至中國駐馬大使隨後如何再三的催促（南洋商報，1999c；星洲日報，1999c），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的復辦卻仍只聞樓梯響。直到朱鎔基 1999 年 11 月訪馬時，馬哈迪才在款待朱鎔基的晚宴上宣佈，兩國領導人將在日內見證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星洲日報，1999j），才把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復辦之事抵定。吊詭的是，關於復辦的過程和細節甚至備忘錄內容，兩國都沒有進一步透漏，甚至面對媒體詢問也都拒絕回答（星洲日報，1999a；1999j；南洋商報，1999e）。對於以華人為主的馬來西亞商人如此期盼著的天大喜訊，中國和馬來西亞當局卻不願交待更多的細節，合理推測是中國銀行復辦的備忘錄簽署是一個倉促的決定，或雙方無法達到共同接受的條款而簽署，因而雙方領導人或官方代表都無法對外公佈實質細節和復辦時間表。這是一件頗不尋常之事。馬哈迪應是為了取得華商的支持和華裔選民的好感，在雙方對於復辦細節仍沒有共識之下，強硬宣佈中國銀行復辦的消息，這點或可從簽署備忘錄後，朱鎔基面對「馬中友好協會」秘書陳凱希詢問對中國銀行復辦看法的回應中，看出端倪。朱鎔基如此說：「關於馬中兩國互設銀行事宜，似乎你的消息比我更清楚。」而且關於此事他也是馬來西亞報章報導後才知曉，說完這些後他才表示不想多說了（南洋商報，1999e）。不過朱鎔基為何仍舊願意配合馬哈迪「演出」？或是因為中共在整個 90 年代與馬來西亞

⁵⁵ 外商銀行在特定國家的開辦，可以減化在地企業與銀行本國的經營成本，如透過第三國家銀行開設信評及支付佣金等。

關係交好，而且中共當時正實施「睦鄰政策」，朱鎔基雖然對中國銀行復辦一事不知情感到有所委屈，但為了大局著想，雖然被馬哈迪打落了牙齒，但還是和血吞了。



第五節 官方互訪與中國銀行復辦的 兩階段決策

馬哈迪在第十屆全國選舉前 8 天邀請朱鎔基官訪馬來西亞，並且在朱鎔基官訪期間確定華裔期盼已久的「中國銀行」的復辦，操縱對中國仍有血源祖國或文化祖國想像的華裔選民的意圖明顯。此外馬哈迪此舉，也很難不令人聯想到馬哈迪有意模仿拉薩 25 年前利用與中共的關係，獲取華人的選票支持。只不過 1974 年時，中共或許不曉得拉薩的確切盤算，因為當時並無非常明顯跡象顯示拉薩會在返回馬來西亞後可能解散國會；但 1999 年朱鎔基抵訪馬來西亞之前，國會卻已經解散 12 天，以那個年代許多馬來西亞華人都經常會對中國的人、事和物展現出一種對祖國思慕之情，朱鎔基和中共必然知道馬哈迪沒展延或取消對他的邀約讓他前來馬來西亞官訪的盤算。朱鎔基蒞馬，雖然未對選情指指點點，但對馬哈迪和國陣政府的讚譽連連，還有對中國銀行復辦一事雖不知情，但仍舊沒有多加評論，成功完成扮演超級助選員的角色。

為了鞏固自身和國陣政權，馬哈迪看似公然邀請外國勢力介入馬來西亞選舉影響選舉結果，並且讓一個雙方未達成共識的外國政府持有多數股份的銀行在馬復辦，似是把國家利益置於不顧。按馬哈迪歷來習以把中共和馬來西亞華人並列為一個共同體，華人是英國以外另一個強取豪奪馬來人資源的掠奪者（Mahathir, 1971），而這種思維在馬來社會中事實上相當普遍，只是極少宣之於口。因此馬來西亞雖然在經貿關係和國際議題上與中共合作無間，但馬來西亞在國家安全威脅上依舊維繫冷戰時候的思維，與美國軍事合作等級只有提高沒有減少。馬來西亞除了在 1960 年代面對馬來西亞組成前後的印尼軍事恐赫外，從未曾把中共以外的國家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可見得馬哈迪政府仍把中共視為潛在的敵人，尤其是 1990 年代兩國關係升溫之後。如上文所見，馬來西亞每隔二到三年，從首相、副首相到兩任國防部長，



都會聲明「中共不是威脅」，若非政府間或民間有廣泛的集體認知某國是威脅，政府又何必一再發表類似談話？至少，馬來西亞政府就未曾如此頻密的告知群眾其他國家不是馬來西亞或區域的威脅。

因此馬哈迪邀請朱鎔基在馬來西亞選舉期間到訪和允許中國銀行設立，做法似乎形同引清兵入關，製造機會讓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共未來在馬來西亞裡應外合，中共或開始倣仿美國對馬來西亞的特定議題，特別是與華人相關的議題對馬來西亞施壓，同時透過銀行業務的擴展，操控馬來西亞經濟奪取馬來半島和原本屬於馬來人的一切財產，繼而影響政治獨立性。40年前東姑政府制定「聯邦銀行法」以免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營業所可能發生之事，很可能因為此次馬哈迪為了鞏固自身、巫統和國陣政權，一一發生。表面上馬哈迪的做為，看似是為了個人維繫政權利益和政黨利益，犧牲馬來西亞國家的主權和利益，不過按照上一章的論述，縱使為了政治人物的政權利益和政黨利益，也必須達到某種程度的國家利益為其基礎，否則仍舊會為選民識破，使得政權利益和政黨利益也無法得益，因此若細究馬哈迪的部署和計策，並沒有完全葬送國家利益。

多元啟發論主張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先排除不利政權永續的選項，再考慮在剩餘的選項中，選擇對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方案者，使政權和國家利益同時都被維護。就朱鎔基選戰期間官訪馬來西亞和簽署中國銀行復辦備忘錄一事，本文認為就這兩起決策選項，馬來西亞政府在前者有至少 4 個選項，後者則至少有 5 個選項。以下分析：

就朱鎔基官訪的方案：

- A 選項：宣佈朱鎔基官訪馬來西亞是為了幫馬哈迪／巫統／國陣站台
- B 選項：暗示朱鎔基官訪馬來西亞是為了幫馬哈迪／巫統／國陣站台
- C 選項：按一般國家領導人到訪的規格與朱鎔基互動，不做任何解釋
- D 選項：否認朱鎔基官訪馬來西亞是為了幫馬哈迪／巫統／國陣站台

以「多元啟發理論」的原則而言，決策者做決策經過第一階段按「非補償性原則」，刪除縱使能幫國家帶來最大利益卻對自身政權無益的選項；第二階段則以國家利益為最大依歸，選擇能為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方案。在這 4 項選項中，3 個選項僅符合一種利益：A 選項和 B 選項都僅符合政權利益、D 選項僅符合國家利益。C

選項則同時符合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表 4-4）。很顯然的，按多元啟發論的原則，這些選項中僅有 C 選項被保留至第二階段，其他 3 個選項都在第一個階段被剔除了。儘管 D 選項看似對國家最有利，但如此宣佈或會斷送確實因為「祖國」領導人的加持，才決定支持國陣的那一些對中共仍有很高效忠度的華人選民，因此對政權利益無利，此外這樣的宣佈也有欲蓋彌章之嫌，也可能招至一些遊移選票的反感。A 選項和 B 選項僅有展示意義上的差別，但都等於承認馬哈迪／巫統／國陣的馬來西亞華人政策，不足以贏取廣大的華裔社群支持，才需要華裔的「祖國」中共肯定或加持協助選情。馬哈迪政府若做出這樣的表示，或許能取得許多華裔的選票，畢竟馬來西亞華裔歷來對「馬來人特權」、對華文教育不友善等的政府政策頗為反感，但馬哈迪也真正開了馬來西亞的大門，讓中共從此有個正當理由干預馬來西亞的華人政策，影響馬來西亞主權的獨立，這種現象已然傷害國家利益，甚至可能演變為馬哈迪最厭惡的另一種殖民形態。

表 4-4：朱鎔基到訪的決策選項

選項	屬性	
	政權利益	國家利益
A	有	無
B	有	無
C	有	有
D	無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唯一同時符合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就只有選項 C 了。馬哈迪和／巫統／國陣政府官員，在朱鎔基官訪馬來西亞期間行禮如儀的與朱鎔基互動，朱鎔基在馬來西亞選戰期間來訪是否為了助國陣政府一臂之力，則讓大家自行想像和發揮。不過，朱鎔基到訪時機確實太過敏感，一般華人選民通常會解讀為中共是為了幫馬哈迪和國陣政府助選而來，以對中國具有血源祖國和文化祖國認同的部份馬來西亞華人，看到總理前來助陣，似乎也就沒有拒絕支持國陣政府的理由了。此外，馬哈迪政府沒有公開明示暗示朱鎔基來訪馬來西亞是為了給國陣助選，也讓馬來西亞政府未來



在面對中共意圖干預馬來西亞內政時，有辯白和拒絕的空間，例如可以辯白說由於朱鎔基並未因為馬來西亞在選戰期間，自行取消訪問的行程，馬來西亞又怎好意思拒絕區域強權領導人的來訪呢？

至於中國銀行復辦事件，則有以下方案可供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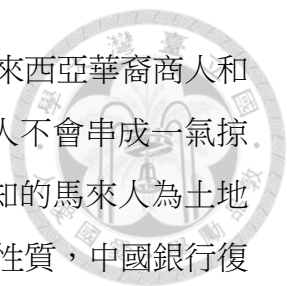
- A 選項：宣佈中國銀行復辦日期。
- B 選項：提及中國銀行即將復辦，但不宣佈復辦確定日期。
- C 選項：馬中兩國簽署中國銀行復辦備忘錄，公佈復辦細節。
- D 選項：馬中兩國簽署中國銀行復辦備忘錄，不公佈復辦細節。
- E 選項：絕口不提中國銀行復辦一事。

表 4-5：中國銀行決策選項

選項	屬性	
	政權利益	國家利益
A	有	無
B	無	無
C	不確定	有
D	有	有
E	無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這 5 項選項中，A 選項和 E 選項僅具備一種利益，前者為政權利益，後者為國家利益；B 選項即不符合政權利益也不符合國家利益；C 選項則固然對政權不確定但對國家利益卻有利；D 選項對政權有利和國家利益同樣有利（表 4-5）。按多元啟發論原則，決策必須同時符合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但政權利益為先，因此僅僅符合政權利益或國家利益其中一項的 A 選項和 E 選項，及既不符合政權利益也不符合國家利益的 B 選項，在第一個決策階段就被刪除。C 選項和 D 選項雖然同時符合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但 C 選項在政權利益的不確定性相對 D 選項高，因此 D 選項最終脫穎而出。



雖然 A 選項將獲得自 1992 年起就翹首以盼中國銀行復辦的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和華人的正面巨大迴響，但在沒有更完整的防範措施確保中國和華人不會串成一氣掠奪馬來西亞國家資源之前，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或馬來領導人認知的馬來人為土地主人的國家利益將受到威脅；E 選項與 A 選項則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性質，中國銀行復辦一事，無論是馬哈迪 8 月到中國官訪，或者朱鎔基 11 月到馬官訪前，馬來西亞華商和駐馬來西亞中國大使都曾在華文媒體放話對中國銀行復辦的期盼。若馬哈迪和國陣政府未在選舉前對中國銀行復辦之做出任何回應，在爭取華人選票上相當不利，但中國銀行的不復辦，卻有利於馬來領袖們認知的國家利益。B 選項則因為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和華人從 1996 年就一直聽聞中國銀行復辦的消息，因此若此時國陣政府再重申即將復辦卻未宣佈復辦日期，也只是再度只聞樓梯響，對吸引華人選票很有限，如上所述，中國銀行的復辦也對馬來領導人認知是不具備國家利益的。

至於 C 選項和 D 選項的差別，主要在於備忘錄內容的公佈與否，繼而對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產生的影響程度。馬中兩國簽署中國銀行復辦備忘錄，等於告知國人中國銀行復辦已是不可逆轉之事，對華裔商人和華裔選民是喜從天降的消息，因此取得大部份華裔選票的支持自是沒有懸念。可是若公告倉促決定復辦的細節，文字上或有疏失引起誤會或有思慮不周之處，輕易讓反對黨逮到玩弄文字遊戲的機會，影響所至可能既爭取不到華人選票甚至流失更多的馬來人選票。因此，此時公佈備忘錄內容難以估計對國陣政權的影響究竟是正面或負面；至於對國家利益方面的影響，由於備忘錄不具法律效益，在國陣政府在兩國簽署中國銀行復辦的正式文件之前，是仍然可以繼續和中共談判爭取對馬來西亞國家最有利的條款。D 選項的不公佈備忘錄內容，讓反對黨沒有機會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卻能讓華商和華人們產生對中國銀行復辦產生許多想像空間，進而投射到國陣政府似乎越來越善待華人的想法，提升對國陣的好感。至於在國家利益方面則與 C 項一致。於是，D 選項成為在處理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復辦一事上最佳的決策選項。

第六節 總結



馬哈迪在自身政權／巫統／國陣政權在 1999 年受到史上最嚴重的挑戰，必得靠國內僅佔約兩成半的華人選票維繫政權之時，巧妙的使第十屆全國選舉的投票日訂於朱鎔基到馬官訪約一個禮拜前，並在此時簽署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翹首以待的中國銀行在馬復辦的備忘錄。1999 年第十屆選舉結果，馬哈迪成功維繫國會三分之二多數，但巫統的議席勝選率卻從 1995 年第九屆全國選舉的 87% 下跌 18% 至 1999 年的 69%；馬華公會從 1995 年的 88% 議席勝選率跌了 8% 達 80%；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民政）的議席勝選率則持平，1995 年和 1999 年都是 70%⁵⁶。可見得，如果此回選舉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議席都如同巫統大幅下跌，國陣政權在馬來西亞只怕將難以維繫。儘管如此，馬哈迪的政權仍因巫統所得議席的大幅下跌埋下他於 2002 年時，因黨內壓力被迫去職的因素，不過這已不在本章討論的範圍。

無論如何馬哈迪在這場選戰中，成功的讓中共領導人朱鎔基到馬來西亞的行程在華人選民的想像中形同視為幫國陣站台，並充份利用中國銀行在馬復辦的課題取得華人選民的認同。不過與此同時，馬哈迪政府又得在這兩起事件上，兼顧政權利益時及國家利益，實屬不易，只不過兩者相較，政權利益的比重仍舊高於國家利益。

⁵⁶ 馬來西亞 1999 年的國會席次比 1995 年增加 1 席達 193 席。巫統於 1995 年競選 102 席贏得 89 席，1999 年競選 104 席贏得 72 席。馬華公會於 1995 年競選 34 席贏得 30 席，1999 年競選 35 席贏得 28 席，民政黨於 1995 年和 1999 年都競選 10 席，兩屆選舉也都勝選 7 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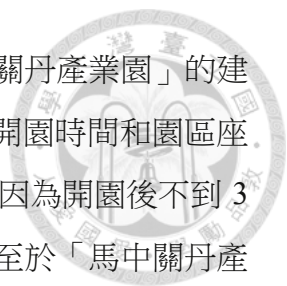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2013 年的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



2013年2月5日，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馬來西亞第六任首相納吉（Najib Razak）陪伴下，主持位於馬來西亞彭亨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CKIP）主持開園儀式（星洲日報，2013a）。「馬中關丹產業園」是由納吉和中共總理溫家寶親自推動、馬來西亞關丹和中國廣西兩國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共建（中國新聞網，2013）。「馬中關丹產業園」同時也與10個月前，即2011年4月1日，在中國廣西欽州開園的「中馬欽州產業園」（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CMQIP）結為姐妹園區（星洲日報，2012d），創下全世界首個在彼此國家建設產業園區的「兩國雙園」紀錄。在項馬中互為投資的園區計劃當中，中共聯營公司在「中馬欽州產業園」持股51%，馬來西亞聯營公司持股49%；相反的，馬來西亞聯營公司在「馬中關丹產業園」中持股51%，中共聯營公司49%。「兩國雙園」由雙方共同負責和招商（中國一帶一路網，2016；Kuantan Port Cosortium Sdn. Bhd. Malaysia, 2016）。值得一提的是，「兩國雙園」計劃是由納吉和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自協商議定和推動才誕生的，顯見馬中兩國的政治和經貿關係在納吉2009年至2013年任內，邁入建交以來最密切的階段。儘管如此，馬來西亞在納吉的領導下，繼承第五任首相巴達（Abdullah Ahmad Badawi）任期的對美政策，成功修復馬哈迪時代在政治層面和美國的齟齬，最明顯的指標是前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在2008年後再度因為肛交罪面臨司法提控於2014年罪名成立入獄時，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並未如同柯林頓時代的副總統高爾（Al Gore），在國際場合中當面羞辱納吉。馬來西亞在中美之間的悠遊，學者認為納吉有意藉著歐巴馬「重返太平洋」的野心，和擔心中共的崛起對區域內國家可能形成的威脅，因此同時與中美友好，以使兩國互為制衡，以免馬來西亞外交立場過於偏向美國或中共導致主權受損（Kuik, 2013b; 2016）。

不過馬來西亞對中共越來越友善的態度，學界一致認同主要建立在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需求，而且只要馬來西亞經濟得以成長，就能提振國民統一陣線（National



Front) 政府來屆選舉的選情 (Khalid, 2011; Case, 2014b)。「馬中關丹產業園」的建立雖然是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設立，但學者 Khor (2014) 卻認為開園時間和園區座落地點的安排，都能看到納吉為自己 and 國陣選情加分的鑿痕。這是因為開園後不到 3 個月，馬來西亞就解散國會並於 5 月 5 日舉行第 13 屆全國選舉；至於「馬中關丹產業園」座落的彭亨州，更是納吉選區所在州屬。承繼前兩章第二任首相拉薩 (Abdul Razak Hussein) 和第四任首相馬哈迪 (Mahathir Mohamad) 打「中國牌」影響選情的作為，「馬中關丹產業園」的設立對納吉和國陣的政權利益和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上的影響程度，是本章意圖釐清的重點。

第一節 馬中背後的馬美關係

隨著中共在 21 世紀的強勢崛起，世界體系正逐步邁入以美國和中共為首的兩極體系 (Ikenberry, 2014)。由於中共的崛起，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上任後，提出「重返」亞洲的國家戰略，加強與中共周邊的日本、南韓、東協等國家接觸 (Kuik, 2013b)，積極與各國發展雙邊及多邊關係、策劃國際組織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涉入東海和南海地區的爭端等，以圍堵和壓制中共政經和軍事力量的發展 (陳華昇, 2013)。中共也同樣透過雙邊及多邊關係加深與東協經濟的合作，如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落實、提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抵消「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可能形成的壓力，以消弭東協國家因歐美國家一再散播「中國威脅論」的疑慮。面對全球霸權和區域霸權在亞洲的主導權爭奪，納吉的馬來西亞外交政策，延續拉薩以來歷任首相在兩強之間夾縫求生之餘也左右逢源的政策—冷戰時為美國和蘇聯之間，冷戰後為美國和中共之間。納吉就曾在回答馬來西亞學生的提問時表明，馬來西亞不會在中共和美國之間選邊站，因為此舉有損國家利益 (The Star, 2014b)。



壹、延續前兩任首相的中國政策

作為大力推動馬中關係的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欽點的首相人選（星洲日報，2015；2016），和推動吉隆坡與北京建交的第二任首相拉薩的兒子，納吉上任後的中國政策可以清楚看到前兩任首相的特點 -- 即有馬哈迪表面上對中共的極度友好，也有拉薩對中共的小心防患。納吉上任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即 6 月 2 日，便前往北京官訪 4 天，可謂是創下馬中建交後，歷任馬來西亞首相就任後最快前往北京官訪者⁵⁷（光明日報，2009c）。北京也是納吉出訪東協成員國以外的第一個國家。此後直到 2013 年第十三屆全國選舉止，納吉在 4 年間共訪問北京 3 次。

納吉上任後延續馬哈迪對中共的經濟務實外交政策，主要原因是他認為改善國家經濟是他當下最重大的任務，他深信只要把經濟課題處理好，提供民眾更好的生活水平，民眾就會無視政府是否施政良好、國家會否被伊斯化、居高不下的階層官員貪污事件，還有實施族群政治引發的社會問題等（Chin, 2010; Kuik, 2012）。不過，振興馬來西亞經濟實際上也有當下時代背景的必要性，因為納吉上任前一年也就是 2008 年，馬來西亞經濟就受到美國次級房貸⁵⁸的波及（金秀琴，2010），是年經濟成長為 4.83%，比 2007 年的 6.3% 下跌 23.3%。財經專家當時預測 2009 年的經濟更將呈負成長（The World Bank, 2018）。如果納吉無法改善馬來西亞經濟狀況，將使民間對國陣政府的怨氣積累，我們再次看到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堪一體共生的實例。

此外，作為國陣政府首相，納吉也肩負執行馬哈迪於 1991 年制定「第六馬來西亞計劃」時，訂下帶領馬來西亞在 2020 年成為先進國的「2020 宏願」（Vision 2020）

⁵⁷ 胡先翁（1976 年 1 月-1981 年 7 月）就任後 3 年後的 1979 年 5 月才官訪中共；馬哈迪（1981 年 7 月-2003 年 10 月）是在 4 年後的 1985 年 11 月才前往；中共雖然也是巴達威（2003 年 10 月-2009 年 4 月）在東協以外官訪的第一個家，但也是在上任 7 個月之後的 2004 年 5 月才前往。

⁵⁸ 次級房貸危機始於美國政府採降息以利信用擴張帶動經濟成長。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6 月期間，美國聯準會共降息 13 次，由於房貸審核標準寬鬆，又欠缺適當監督機制，收入低、信用不佳者都得以取得購物資金。但 2004 年底後，美國為防資金寬鬆帶來通貨膨脹問題，聯準會又連續加息 17 次，因而造成次級房貸戶還款困難違約率提高，同時房價又下跌，致使承作次級房貸業務的機構面對財務困境甚至倒閉，引爆此次的次級房貸危機。次級房貸問題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金融資產債卷化擴級全球，形成全球信用緊縮危機，股、債、匯及房市全都波及，最終成為全球金融危機。馬來西亞面對資金大量流出、政局的不安定、通貨膨脹等狀況，導至馬幣貶值，納吉於 4 月初宣誓就職時，馬幣於前一個月貶值達 21.1%（金秀琴，2010）。

目標。馬哈迪當年指示，馬來西亞 2020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必須從 1990 年的馬幣 1150 億令吉（440 億美元）增加到 9200 億令吉（3525 億）（按 1990 年估計），才能加入先進國的行列（Prime Minister's Office Putrajaya, 2010; The World Bank, 2018）。截至 2008 年止，馬來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為馬幣 6003 億令吉（2300 億美元）（按 1990 年估計），也即是 18 年來平均每年為馬幣 269 億令吉（103 億美元），納吉必須確保未來馬來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維持至少與過去一貫的水準（此算法尚未計入歷年來的通貨膨脹指數），否則「2020 年宏願」就難以兌現⁵⁹。因此，除了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以外，中共成為納吉不能忽視的市場⁶⁰。

馬中友好協會會長馬吉德（Abdul Majib Ahmad Khan）接受郭清水訪問時指出，納吉在與中共提高雙邊經貿關係之時，也希望增加中共對馬來西亞投資和金融業務合作的機會（Kuik, 2016）。為此，納吉政府於 2009 年 11 月 20 日，發出商業銀行執照予中共五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工商銀行（星洲日報，2009c）；2010 年 6 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則授予馬來西亞「合格境內投資者」（China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QDII）身份，使馬來西亞成為中共允許國人持有有價證券投資的第十一個地區⁶¹（New Straits Times, 2010a）。2011 年 4 月，中國人民銀行也與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簽署後者在北京設立代表處⁶²的備忘錄等（The Star, 2011）。翌年 2 月中國人民銀行與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更新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幣值達馬幣 900 億令吉（約 300 億美元）。同年 4 月，由兩國政府共同推動的「中馬欽州產業園區」開園，納吉和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皆出席相關儀式，當日雙方簽約項目的總投資額約 450 億元人民幣（約 71 億美元）；後於 2013 年 2 月 5 日，馬中關丹產業園（Kuantan Industrial Park）開園，由納吉和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開園儀式，

⁵⁹ 1990 年時馬幣兌美元匯率為 2.61；按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歷史資料顯示，2008 年 12 月 31 日時已下跌至 3.46。

⁶⁰ 納吉上任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是日本，但中共經濟進入 21 世紀以後就展現高速成長的表現，當時的分析家們都看好中國將於 2010 年取代日本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BBC 中文，2010；TVBS News, 2011）。

⁶¹ 其他 10 個獲認證的地區為澳洲、加拿大、香港、德國、日本、盧森堡、新加坡、韓國、美國及英國（New Straits Times, 2010a）。

⁶²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北京代表處於 2013 年 10 月成立，並於 11 月正式啟用，是馬來西亞繼倫敦和紐約後在海外開設的第三間代表處（星洲日報，2013e）。

雙方簽約項目的總投資額約馬幣 105 令吉（約 33.6 億美元）。兩國也因此共同創下世界紀錄，成為首個相互在彼此國家建設產業園的姐妹園，創造「兩國雙園」的新模式。這個馬中互為投資的園區計劃，中共方面在中馬欽州產業園區中持股 51%，馬來西亞 49%；反之在馬中關丹產業園中，馬來西亞則持股 51%，中共 49%，並由雙方共同負責和招商。

在納吉積極的推動下，馬中在經貿或投資項目上都有亮眼的表現。在經貿上，2009 年至 2013 年間，兩國貿易總額每年都至少有個位數成長，其中 2011 年和 2013 更有兩位數，分別是 13.76%和 10.32%，截至 2013 年，兩國的貿易總額已達馬幣 1993 億 780 萬令吉（約 498 億 2695 萬美元）（表 5-1）。至於中共在馬來西亞的投資除了 2009 年和 2012 年負成長，分別為-37.16%和-35.73%，其餘年份都呈雙位數成長。2013 年時，中共對馬來西亞投資已達 10 億 8000 萬令吉（約 2 億 7000 萬美元）（表 5-2）。

表 5-1：馬中貿易總額（2008-2013）

（單位：馬幣百萬）

年份	數額	+/-
2008	130,288.7	-
2009	138,384.2	6.21
2010	147,028.0	6.25
2011	167,257.2	13.76
2012	180,656.4	8.01
2013	199,307.8	10.3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2001 至 2013 年的 Yearbook of Statistics Malaysia 整理制作（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表 5-2：中共投資馬來西亞總額（2009-2013）

（單位：馬幣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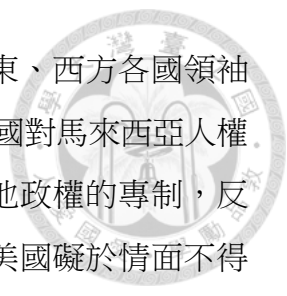
年份	數額	+/-
2008	1,090	-
2009	685	-37.16%
2010	1,003	46.42
2011	1,170	16.65
2012	752	-35.73
2013	1080	43.6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2001 至 2013 年的 Yearbook of Statistics Malaysia 整理制作（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貳、對美政策

納吉雖然積極與北京友好以便在經貿層面獲利；但在另一方面，馬來西亞也延續巴達威對美的友善態度，積極修補馬哈迪任內與美國在政治層面上的惡劣關係（Lee, 2011）。馬來西亞主要透過強化傳統軍事合作和經貿合作，例如響應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制衡中國崛起對區域和馬來西亞的威脅（Kuik, 2016）。這是因為雖然在後冷戰時期，巫統精英不再視中共為當下即時的重重大威脅，但中共崛起、中共協助馬共顛覆馬來西亞政體的記憶及與馬來西亞重疊的南海主權爭議，還是令巫統精英視中共為潛在的威脅，不得不防患於未然（Lee, 2011）。美國總統歐巴馬 2009 年上任後提出重返亞洲政策，使積極發展馬來西亞經濟而與中共密切合作的馬來西亞，找到一個不至過度傾斜中共的契機，即是透過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合作，與美國發展出與中共等距離關係，悠遊於兩強之間。

由此可見，納吉雖承繼馬哈迪的對中政策，卻沒有承繼馬哈迪的對美政策，主要原因仍在於納吉的個人特質。相對於馬哈迪來自小康之家和在土生土長的國家完成學業，出生官宦世家的納吉，14 歲就被父親拉薩送往英國的寄宿學院墨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e）就讀，高中畢業後再往英國諾丁漢大學主攻產業經濟學。回顧



這段留英經驗，納吉自言培養了他處變不驚的個性，並且在面對東、西方各國領袖時也能不卑不亢（The Star, 2015）。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納吉處理美國對馬來西亞人權做出批判時，並非如馬哈迪般氣極敗壞的以「亞洲價值」正當化他政權的專制，反之展現有別於馬哈迪的柔軟度，進一步深化與美國的關係，使得美國礙於情面不得不減少對馬來西亞內政的干預。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安華於 2008 年后再度因肛交案而被提控，甚至後來於 2014 年罪成入獄時，安華不再獲得如同 1999 年首次因類似罪名入獄時的美國支持程度--當年美國副總統戈爾曾在 2000 年於吉隆坡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致詞上，斥責坐在檯下的馬哈迪，但此回歐巴馬和納吉見面時卻沒有在公開場合讓納吉難堪（Diehl, 2010）。

在經濟上，美國從 2008 年至 2013 年間都是馬來西亞第四大經貿伙伴，排名在中共、新加坡和日本之後。馬美貿易數額最高的時候為 2013 年的 403 億美元，最低則為 2009 年 336.9 億美元及 2012 年的 387.5 億美元（表 5-3），原因是美國在 2009 年受到二次房貸的波及的經濟尚處於復甦中；至於 2012 年則是因為馬來西亞面對出口市場的緊縮（Case, 2014b）。納吉曾公開表示經濟和商業投資是馬來西亞和美國維持雙邊關係的關鍵因素，其中又以製造業、資通訊科技（ICT）和生物科技在內的新科技為最（The Star, 2010）。此外，馬來西亞也響應歐巴馬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並且在經過長達一年與 TPP 的 8 個會員國⁶³諮詢後，馬來西亞於 2010 年 10 月 2 日宣佈獲得原本會員國接納加入 TPP 的協商（Malay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0）。馬來西亞相信加入 TPP 將有助馬來西亞經貿的成長，儘管加入 TPP 的決定，長期面對國內非政府組織如馬來人經濟行動理事會（The Malay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MTEM），基於擔心簽署 TPP 后，馬來西亞本土的中小企業生存會受到威脅之反對（Malaysian Insider, 2013）。

除了經貿關係外，雖然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未曾與美國建立正式的軍事聯盟關係，但自冷戰以來美國卻是馬來西亞很重要的軍事伙伴（Kuik, 2016）。儘管馬來西亞在馬哈迪任內時與美國在人權和政府體制課題上交惡，但在經貿和軍事關係上卻穩健發展（Rinehart, 2015；Najib, 2002）。以巫統精英們對中共在歷史積累揮之不去

⁶³ 8 個會員會分別是紐西蘭、智利、新加坡、汶萊、美國、澳洲、秘魯和約南。

的威脅認知，再加上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和納吉的柔軟身段，馬美之間的關係也如同馬中關係，在納吉任內出現多項突破。在軍事演習上，馬來西亞自 1995 年便參加的「海上戰備暨訓練聯合演習」（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在 2011 年 6 月的「金色眼鏡蛇」（Cobra Gold）聯合軍演中，獲得美國同意從觀察員身份提升到參與者。國防部長扎希（Ahmad Zahid Hamidi）透露，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支持馬來西亞身份的提升，因為馬來西亞可以在國防策略、科技、訓練和操作精密的配備上，取得有價值的經驗（New Straits Times, 2010b）。馬來西亞這項舉止是一個高明的軍事策略但低成本的政治招數，因為這無疑展現馬來西亞對美國的支持（Kuik, 2016），但也不會過份刺激中共的神經。此外，美國也於 2009 年宣佈將提供馬來西亞海岸監視雷達系統，以利於收集和提供情報給馬來西亞相關安全部門，保護海岸線的安全（Keith, 2008），此外兩國高階將領也頻密往來、馬來西亞安全人員被派往美國參與軍事訓練、更多的美國軍艦也到訪馬來西亞（Kuik, 2016）等。在國際課題上，馬來西亞也在多項事件上支持美國的立場，例如伊朗、北韓、核不擴散、人口走私等（Najib, 2010）。

表 5-3：馬美貿易總額（2008-2013）

（單位：美元億）

年份	數額	+/-
2008	437.9	-
2009	336.9	-23.06%
2010	399.8	18.67%
2011	400.4	0.15%
2012	387.5	-3.22%
2013	403	4%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資料整理制作。

第二節 2008 年選舉與 2013 年選舉



2013 年 5 月 9 日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選舉，是納吉繼任首相後領導國陣參與的第一場選舉。基於 2008 年第十二屆全國選舉中，國陣流失大量華裔選票，納吉若要取得黨同志認可他的領袖資格，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是他的任務，而重獲華人選票是他最重要的功課。此外，馬來西亞經濟也因為美國次貸危機波及而萎靡，因此帶領全民走出經濟困頓是納吉做為馬來西亞大家長無法卸除的責任，但國陣於 2008 年選舉面對創黨以來最差的選舉成績，卻不僅僅因為經濟因素而已；政府貪污濫權、族群矛盾等長年深埋在馬來西亞的問題，隨著新媒體的誕生，成功突破國陣政府歷來迫使傳統媒體減少報導不利當權者新聞的困境，喚起民眾特別是非馬來人對國陣政府施政方式的不滿和情緒。納吉從阿都拉接手過來的巫統／國陣／馬來西亞百廢待舉，需要大破大立，才有可能重獲非土著尤其是華人的支持。

壹、2008 年第十二屆選舉

2008 年 3 月 8 日舉行的第十二屆馬來西亞全國選舉，國陣政府繼 1969 年第四屆選舉後再度失去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及丟失 5 個州屬執政權⁶⁴，是國陣獨立以來最差強人意的選舉結果。相比 2004 年的選舉結果，2008 年國陣政府所得的席次率從 90.4% 下跌至 63%，跌幅 27.4%；支持率也從 63.9% 下跌至 50.3%，跌幅 13.6%（表 5-4）。歷來主要負責獲取華裔選票支持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和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所得議席皆減少 50% 以上。馬華公會於 2008 年的所得議席，比 2004 年的 31 席減少 51.6% 至 15 席，民政黨更從 10 席減少 80% 至 2 席⁶⁵。大約 13 個月後的 2009 年 4 月 3 日，巴達威在巫統黨內壓力下辭去首相職。

⁶⁴ 國陣在此之前從未丟失逾兩個州屬的執政權。此次丟失執政權的 5 個州屬除了原本已由反對黨伊斯蘭黨執政的吉蘭丹，還有吉打、檳城、雪蘭莪及霹靂。

⁶⁵ 2004 年選舉的國會總席次為 219 席，2008 年增加至 222 席，因此在比較 2004 年和 2008 年的選舉結果時，為求準確，本文採百分比制。

表 5-4：國陣第十一屆（2004 年）及第十二屆（2008 年）選舉
國會席次及得票率

年份	總議席	所得席次	所得席次率	(+/-) 席次率	所得支持率	(+/-) 支持率
2008	222	140	63.0	-27.4	50.3%	-13.6%
2004	219	198	90.4		63.9%	-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報紙資料整理制作。

2008 年全國選舉出現如此結果，至少有三個重大因素促成：國陣成員黨黨內的紛爭和醜聞、反對黨之間的合作與新媒體的誕生，及民生課題：

一、國陣成員黨黨內紛爭和醜聞

2008 年選前，國陣的三個成員黨：馬來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an, 巫統）、馬華公會和民政黨都陷入黨內紛爭，引起廣大關注。巫統方面，儘管馬哈迪已退位交棒給巴達威，但馬哈迪卻經常在媒體上抨擊巴達威的各項政策、指責巴達威做決策容易受到顧問影響、縱容巴達威自己的女婿干政、譏笑巴達威開會打瞌睡（當今大馬，2006），繼而更呼吁巴達威在來屆大選後退位讓納吉接棒（當今大馬，2008a）。選前一周，馬哈迪又批評巴達威的經濟政策只說不做，在競選政見中提出的國家進展報告避重就輕等（當今大馬，2008b）。馬華公會方面，署理總會長兼交通部長陳廣財、前總會長兼前交通部長林良實、前內政部第二副部長兼前港務局主席曹智雄，於 2007 年捲入巴生港口自由貿易區土地貴買案，使造價馬幣 22 億令吉（約 6.5 億美元）的港口成本，憑空增加馬幣 20 億令吉（約 5.9 億美元）達馬幣 44 億令吉（約 12.9 億美元），還有未經財政部同意擅自允許發展商發行債券（當今大馬，2007a；2007b）；之後，已婚的副總會長兼衛生部長蔡細歷遭人散佈性愛光碟，女主角非蔡細歷妻子，幕後黑手被疑為黨同志所為（當今大馬，2008c；2008d）。民政黨方面，原本在檳州出任首長職 18 年的許子根，決定選舉後出任內閣職務的計劃曝光，許子根離開檳州後留下的首長空缺引起黨同志覬覦，選前數周爭端白熱化，至少三人接連被媒體提及或自行放話已被許子根欽點接棒（當今大馬，2008e；2008f）。




二、反對黨的合作和新媒體崛起

為了打破國陣 50 年的政權鞏斷，人民公正黨（People's Justice Party）、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及馬來西亞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在安華的協調下，自 1999 年後再次攜手合作，三黨同意在各選區僅提名一位候選人，以免分散反對黨選票（Singh, 2008）。儘管選前三黨為出征選區紛爭不斷，但最終還是成功達到共識（當今大馬，2007c；2008g）。表面上三黨是以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貫穿三黨同床異夢的意識形態，不過實踐方面，三黨在爭取選票的分工上與國陣相似，公正黨靠安華過去的極端馬來人形象號召馬來選民的支持、行動黨爭取華人選票，和伊黨負責爭取保守穆斯林的認同（Singh, 2008）。此政策顯然奏效，三黨在 2008 年選舉中共取得 82 席國會議席（公正黨 31 席、行動黨 28 席及伊斯蘭黨 23 席），佔國會總席次的 36.9%，是為反對黨佔有國會席次歷來最高的一次。三黨在選後不到一個月的 4 月 1 日，正式宣佈組成「人民聯盟」（People's Pact）（當今大馬，2008h）。反對黨選戰成績的突破，除了選區的協調外，也得益於網際網路的發達，促成新媒體的誕生。過往國陣政府以出版准證的更新，干涉傳統媒體的報導內容，使得傳統媒體在報導反對黨的相關新聞上篇幅受限，由於馬來西亞仍未有法律讓國陣政府限制新媒體的報導內容，反對黨政治人物因而在電子媒體和虛擬世界中獲得大篇幅的曝光機會，例如發表政見、置疑政府政策等（Ufen, 2008），尤其是關於國陣政府歷來在聘僱、政府工程合約、大學職位等偏好馬來人的政策，也一再於華文的新媒體中被華裔政治人物提起（Singh, 2008）。

三、民生課題

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Merdeka Center, 2008）的調查顯示，選前兩周，各族裔選民最關注的課題是生活成本高漲和汽油漲價。馬來西亞由於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影響波及，全球石油價格暴漲暴跌，馬來西亞除了面對出口市場萎縮，作為石油輸出國也受到油價影響，國內經濟連帶受到波及。此外，犯罪與治安事件諸如搶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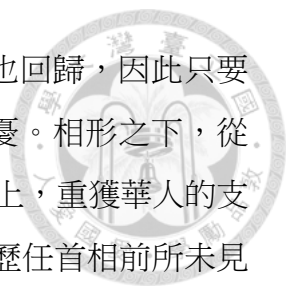
和強姦案件，每年皆數以千計甚至萬計持續發生（Muhammad Amin et al., 2014），警方打擊犯罪不力引發千夫所指，2007 年甚至還有民眾為此示威。至於在馬來西亞綿延已久的族群問題，雖然還是以非馬來人關注為多，但仍不乏馬來人正視。除了對馬來人特權這個持續已久的課題仍舊不滿外，2008 年選前引起關注的課題大都與印度人有關，例如政府強行拆除已有百年歷史卻是違章建築的興都廟、上訴庭允許一名印裔女子的配偶改信伊斯蘭教後單方面幫孩子皈依回教等，印度人的痛和憤恨，華人一葉之秋同仇敵愾，因為在馬來人特權和伊斯蘭課題上，非馬來人都感同身受。至於其他課題尚有政府貪污濫權如政府工程合約發包不透明、著名律師操縱高級法官擢升的司法事件、要求提出選舉改革的示威遊行等（Singh, 2008）。

巴達威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接棒時，民間普遍希望形象清廉的巴達威，能夠整肅馬哈迪政府時代的貪污形象。可是他成立的反貪污委員會（Anti-Corruption Agency）卻無法發揮太多效用，而且巴達威欠缺魄力的個性，使得各種課題無法快速且有效的處理，以至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至於華裔向來擔心馬來西亞被全面伊斯蘭化，在看到印裔族群遭遇的族群和宗教議題後，自詡為華裔福利捍衛者的馬華公會，卻始終無法在選前給予華裔社群安心的回應（Singh, 2010）。再加上國陣成員黨中的黨爭和醜聞，特別是馬華公會和民政黨方面，使得國陣形象進一步受挫。

貳、納吉任相後

根據馬來西亞每 10 年做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馬來西亞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 2830 萬的總人口中，馬來人佔 67.4%（約 1907 萬人次），華人佔 24.6%（約 696 萬人次）（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10）。由於 2008 年部份馬來選票的流失與馬哈迪對巴達威的不滿，及巴達威的領袖魄力相關，納吉繼任首相職後翌日就宣佈馬哈迪已重新加入巫統⁶⁶（光明日報，2009c），以示自己獲得馬哈迪的支持

⁶⁶ 2008 年第十二屆全國選舉結束後，馬哈迪為了逼退巴達威於同年 5 月 9 日宣佈退出巫統。（星洲日報，2008。）



和做事的魄力。馬哈迪的回歸也代表跟著馬哈迪出走的馬來選票也回歸，因此只要納吉接下來的政策不會過於影響馬來人的權益，馬來選票已無隱憂。相形之下，從馬華公會和民政黨在 2008 年的國會議席與 2004 年相比流失 50% 以上，重獲華人的支持成為納吉最重要的功課 (Case, 2014b)。納吉上任後極力展示歷任首相前所未見的開明，和對華人友善的態度 (Lee & Thock, 2014; Chin, 2010)。先是於上任翌日就前往巡視吉隆坡俗稱唐人街的茨廠街訪問 (星洲日報, 2009a)、快速官訪北京、同年年底出席吉隆坡中華獨中 90 年周年校慶宴會 (當今大馬, 2009a)、2013 年農曆新年還參加「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總會」(董總) 的新春團拜⁶⁷等引起華社極大關注，前兩者是創下歷任首相未曾對華社和中共示好的動作，後兩者除了過去未曾有首相參加之外，在某程度上也代表國陣政府願意正視獨中在馬來西亞的存在和重要性，對華社不無鼓舞之意。

在納吉上任後的同一個月內，他也提出「一個馬來西亞 (One Malaysia, 以下簡稱「一馬」)：以民為本，績效為先」的概念。他保證在這個概念之下，所有合格國民都會獲得國家的補助，不會再被遺漏，形同國家的二等公民 (星洲日報, 2009b)。Singh (2010) 因此解讀「一馬」有意以績效代替馬來西亞族群之間和宗教之間的差異，作為國家治理的目標 (Singh, 2010)，而不想再當國家的二等公民、以績效做為治理國家的目標，正是包括華人在內的非馬來人族裔歷年來希冀和倡導的。不過，面對華人和其他非馬來人質疑納吉對「一馬」的定義，究竟為「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納吉卻從未正面回答。Chin (2010) 認為納吉此舉明智，因為模稜兩可終究能讓一些非馬來民眾產生在政治上被平等對待及族群政治體制終將瓦解的想像，但實際上「一馬」僅是口號，馬來人特權並沒有完全被消滅。

除此之外，納吉上任後更屢屢衝撞國陣政府歷來的鐵腕政策和馬來人至上為中心的體制 (Lee & Thock, 2014; Chin, 2010)。在納吉宣誓就任的政策演講中，他先

⁶⁷ 董總成立於 1954 年，目的是為維護和發展馬來西亞的全國華文教育，是一個獨立於政府教育體制的以華文為媒介語的獨立中學體系，每年並舉辦類似台灣高中聯考的獨中統一考試 (簡稱「統考」)。統考文憑獲全世界多個國家承認，例如美國、英國、日本、中國、新加坡、日本等，卻唯獨不獲馬來西亞政府承認，因此不具馬來西亞教育文憑的統考文憑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和擔任公務員職。多年來董總都沒有放棄爭取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統考文憑。

是宣佈釋放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的 13 名人士⁶⁸，再恢復兩份反對黨黨報「哈拉卡」（Harakah）及「公正之聲」（Keadilan Daily）於早前 3 月 23 日被吊銷 3 個月的出版准證⁶⁹（星洲日報，2009b；Malaysiakini, 2009）。同年，納吉以吸引外資和提高馬來西亞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為名，在經濟上採取減少政府干預的政策，宣佈調低上市公司的土著股權為 12.5%，無需再遵守 1974 年「新經濟政策」中規定得達到 30%。同時他也宣佈包括旅遊、交通、醫療等 27 項次領域更無需土著持有股權（當今大馬，2009b；光明日報，2009a）。在人權保障上，納吉於 2011 年陸續宣佈廢除實施 51 年的內安法令⁷⁰、放寬「1984 年出版與印刷法令」⁷¹（星洲日報，2011a）、修改「1971 年大專法令」⁷²以允許大專生參與政治活動（光明日報，2011）等。納吉這一連串的改革，獲得包括華人和非馬來人的普遍認可。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2013）的調查顯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共有 54% 華人對納吉的表現感到滿意，馬來人則為 79%。

不過當納吉向華人示好之際，巫統一些馬來黨員卻與納吉反其道而行，大量制造非馬來人的恐懼。Singh（2010）認為這是納吉和巫統大唱黑白臉的選戰策略。由於民聯的大型講座頻頻受到城市馬來人的歡迎，巫統候選人改往以馬來人為主的鄉下或半鄉下搏感情，並制造非城市馬來人對城市馬來人間的仇恨。他們告知當地的


⁶⁸ 13 名被扣留者中，2 人為已被扣留逾 1 年的興權會（Hindraf）領導幹部（興權會是一個維護馬來西亞印度人權益的非政府組織）、8 人為已被扣留約 3 年的伊斯蘭祈禱團成員（伊斯蘭祈禱團是一個意圖在東南亞建立獨立國家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武裝組織），及 3 名已被扣留約 2 年的外國人，此 2 人罪名不詳（Malaysiakini, 2009）。

⁶⁹ 時任內政部長賽阿密（Syed Hamid）宣佈吊銷兩份報紙准證的原因，是因為經常報導假新聞和具煽動性的新聞，因此才會被吊銷出版准證 3 個月（mStar, 2009）。

⁷⁰ 國會於 2012 年正式廢除「內安法令」，並以「2012 年國家安全理事會法令」取代。「國安法」仍舊如同「內安法令」般允許警方掌握未審先判的權力，但在拘留疑是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嫌犯時間比「內安法令」的 14 天增加至 28 天，但 28 天後若警方仍舊未有足夠的證據提控嫌犯，警方就必須無條件釋放嫌疑人，這與「內安法令」允許警方只要每兩年都取得內政部長同意，就可以無限期拘留嫌犯的規定差異極大。此外，於「國安法」之下，嫌犯在 28 天的拘留期間未必都得停留在警局，國安法允許警方先行釋放嫌犯，在 28 天的拘留期限內使用電子監控儀器監控嫌犯返家後的生活（Borneo Post, 2013）。不過許多維權人士依舊認為國安法應該被廢除。

⁷¹ 「1984 年出版與印刷法令」於 2012 年 4 月放寬，取消媒體每年必需更新出版准證的法令之餘，允許媒體上庭挑戰內政部長吊銷准證的決定（當今大馬，2012b）。

⁷² 1960 年代，馬來西亞學生運動漸漸具有社會動員的能力，在政治、社會及經濟課題上對國陣政府形成一定的壓力。為免學生運動和民間運動結合，對國陣政權產生威脅，國會於 1971 年通過大專法令，禁止大學生在未獲得校長批准下，參與國內外任何政治組織、社團、非政府組織等。




馬來人，巫統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馬來人優先」的權力，不過貪心和背信忘義的華人和貪心的城市馬來人正聯合起來威脅馬來人特權。為了證明巫統對馬來人的照顧，巫統透過國陣政府對馬來人發放雜貨卷、白米津貼、一馬援助金（1Malaysia People's Aid, BR1M）等。巫統這樣的選戰策略，成功鞏固非城市馬來人的支持，也使得一些在 2008 年倒戈支持民聯的城市中產階級選民回流（Case, 2014a）。

這些極端的言論若僅是悄悄的流傳在鄉下或半鄉下的馬來社群之中，對已經回升的華裔選票或許不會有太大的衝擊，但當極端馬來人至上的馬來人，公開衝撞納吉和對華人叫囂後，反而加遽華人對馬來人特權的新仇舊恨，並逐步侵蝕納吉和國陣政府得來不易的華裔支持。這其中尤以號稱非政府組織的土著權威組織（Mighty Native Organization, Perkasa）主席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Ali）最為引人側目。依布拉欣阿里原為巫統黨員、2008 年再度當選國會議員後，以親巫統的無黨籍議員之姿於同年成立「土權」，並成功邀請當時為了逼宮阿都拉而退出巫統的馬哈迪擔任顧問，至於成員方面則多為巫統黨員（Case, 2014a）。依布拉欣阿里在成立土權後，開始公然反對納吉取消上市公司土著 30% 的政策（當今大馬，2010）、指責部份華人貪婪、要求華人對馬來人高抬貴手（星洲日報，2010）、在土權辦的新春團拜中向包括華裔長者在內的出席人士發放華人社會象徵奠儀的「白包」，而非在喜慶節日中具有祝福之意的「紅包」（當今大馬，2012a）、呼吁焚燒馬來版聖經⁷³（當今大馬，2013）等。

為了減少華人社會對依布拉欣阿里等輩的不滿，馬華公會政治人物則一如往常般的透過媒體和講座舊調重彈的恐赫華人。他們的言論主要傳達兩個訊息，第一個是「投行動黨等於投伊黨」，一旦民聯執政，新政府就會在伊黨的引導下，把馬來西亞轉換成伊斯蘭國；第二個是如果選民票投行動黨而非馬華公會，若國陣在下屆選舉中繼續執政，就會沒有或僅有極少華人部長，那麼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權益就難

⁷³ 依布拉欣阿里認為馬來版聖經是別有居心人士特意印制向馬來人傳教，事實上這樣的行為在馬來西亞是犯法的。按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自稱為或被稱為馬來人者必然為穆斯林，因此向馬來人宣傳伊斯蘭以外的教義是違法的。不過東馬原住民的宗教語言多為馬來語，馬來版聖經的存在基本上是為了東馬原住民的需要而印制。依布拉欣阿里呼吁焚燒馬來版聖經，讓信仰基督教的非穆斯林覺得受到侮辱，其實依布拉欣阿里此舉已違犯馬來西亞憲法第三條允許馬來西亞人民具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憲法第三條又與第一百六十條互為抵觸，因此馬來人是否可以信仰伊斯蘭教以外的宗教，仍存在許多辯論的空間。




以在國陣內閣中被捍衛了（星洲日報，2011b；光明日報，2012；光華日報，2012；Lee & Thock, 2014）。儘管如此，馬華公會的宣傳並不見效，截至 2013 年 5 月全國選舉前，華人對納吉的滿意度已經跌至 33%，比納吉擔任首相以來，尤其 2010 年時的最高滿意度 58%，下跌 25%。另外，2011 年和 2012 年各有一場名為「淨選盟 2.0」和「淨選盟 3.0」的街頭示威，參與民眾包含馬來人和非馬來人，參與人數每次都打破馬來西亞有史以來的紀錄，最引人矚目的是向來被視為懼於挑戰巫統權威和害怕「五一三事件」重演，因而歷來置身於公共議題討論或任何示威活動之外的華人，竟然大規模的出現在這兩場聚會中（Singh, 2008）。

納吉宣佈取消馬來人部份特權、開放國家限制人權和媒體自由這些非馬來人翹首以盼數十年的國家政策，希望華裔的支持率能夠回流。意想不到的，華裔對納吉的滿意度剛開始雖然有所回流，但卻因為馬來極端份子言論快速流失。納吉和國陣政府為了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模仿拉薩和馬哈迪在選舉前 100 天內打「中國牌」，似乎是最後的方法了，畢竟這一招在 1974 年第四屆全國選舉和 1999 年第十屆全國選舉中，都證明有效。

第三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過程

2012 年 4 月 1 日，納吉在中國廣西與中國總理溫家寶共同主持「中馬欽於產業園」開園儀式，及見證「中馬欽州產業園」合資公司簽約儀式。在同一個時間，納吉也宣佈兩國政府將在馬來西亞彭亨州首府關丹設立「馬中關丹產業園」。「馬中關丹產業園」的設立，是由納吉親自向溫家寶提議，認為繼兩國政府共同推動「中馬欽州產業園」在廣西設立後，馬來西亞也應建立類似產業園。「馬中關丹產業園」建設完成後，也將與「中馬欽於產業園」建立「姐妹園」關係（星洲日報，2012b）。納吉這項建議獲得溫家寶正面回應，於是納吉委任原本代表馬來西亞政府推動及監督「中馬欽州產業園」的馬華公會前總會長，也是首相對華特使黃家定負責「馬中關丹產業園」的協調和設立事宜（星洲日報，2012b；2012c；The Star, 2012b）。

之所以與中共在馬來西亞再共同推動一個產業園的建立，是因為納吉認為「馬



中關丹產業園」建成後，將提高包括中資在內的外資和本地資本注入馬來西亞的機會，帶動地方和國家其他層面的發展，至少相對落後的東部地區如關丹，就有機會發展成工業區和旅遊景點（The Star, 2012c）。至於選擇關丹的原因，是因為此地與南中國海相鄰並且有個港口可以和欽州的港口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直接連系（The Star, 2012c），與此同時，兩地航程估計僅需三至四天，（星洲日報，2012f）。若產業園的設立落在相對發達的馬來半島西部，則需繞過新加坡，拉長船運時間。馬來西亞方面估計，在「馬中關丹產業園」建好後，截至 2020 年止將取得海內外馬幣 75 億令吉（約億 25 美元）的投資，並製造 5500 個工作機會（The Star, 2012d）。同年 10 月，黃家定宣佈兩國已圈定第一階段投資與組建「馬中關丹產業園」的總體規劃發展公司，以配合政府做好園區的基礎設備以利招商，馬來西亞方為實達集團和常青集團聯合彭亨州發展機構組成投資公司；中共的投資者為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中交地產有限公司、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及欽州市政府（星洲日報，2012f），其中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是廣西自治區政府直屬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即是為中資在「馬中關丹產業園」的主要投資者，也是第一個入園投資的企業（北部港灣集團，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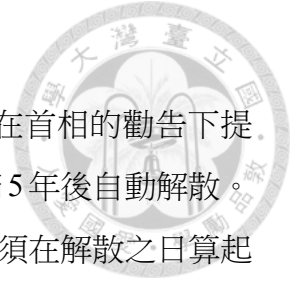
2013 年 2 月 5 日，納吉和賈慶林共同主持「馬中關丹產業園」的開園儀式，並正式宣佈「馬中關丹產業園」與「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結為姐妹園。兩國政府也因此創下全世界首個在彼此國家建設產業園的「兩國雙園」紀錄。兩國達成共識，馬中關丹產業園由馬中雙方共同營運，目標行業設定為高端科產業、重工業、節能環保技術、再生能源等。至於雙方政府聯營公司持股的結構，則與「中馬欽州產業園」調轉—中共在「中馬欽州產業園」持股 51%，馬來西亞持 49%；在「馬中關丹產業園」中則為馬來西亞持股 51%，中共 49%。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開園當日，兩國簽約項目的總投資額高達馬幣 105 億令吉（約 33.6 億美元），預估可製造 8500 個工作機會（The Star, 2013a），這些數字遠遠超出早前計劃建立「馬中關丹產業園」時，要到 2020 年才能取得馬幣 105 億令吉（約 33.6 億美元）投資額，和製造 5500 個工作機會的預測。



第四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的兩階段決策

「馬中關丹產業園」風光落成，看似將給國家經濟帶來鉅大利益，若一切發展如預期，馬哈迪 1991 年定下的「2020 宏願」目標或可如期達成，使馬來西亞跳脫中等收入陷阱成為先進國家。不過在兩國政府人員的談話中，仍可看到納吉利用「馬中關丹產業園」，做為吸引包含華人選民在內支持國陣的「工具」，這點可從產業園址、開園時機和中共開園代表看出端倪。「馬中關丹產業園」之所以確定落實設立在彭亨州的關丹，除了地點適合外，馬華公會總會長廖中萊也曾透露是與納吉對中資的大力推薦有極大的關係（星洲日報，2013c）。誠然，「馬中關丹產業園」有助調整馬來半島過去重西部輕東海岸的發展，但納吉的選區北根就在彭亨州，而關丹與北根距離約 76 公里，納吉縱使真心想要發展關丹，瓜田李下也是在所難免的了。

此外，中共駐馬大使紫璽在「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前一周就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的馬來西亞行新聞發布會上，除了行禮如儀的肯定馬中關係，也提到中共是依馬來西亞政府提議，在農曆新年前舉行「馬中關丹產業園」的開園儀式（星洲日報，2013b）。由於「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都是由納吉和溫家寶從零到有的親自推動促成，按黃家定的說法，兩人為了這兩個園區的建設，甚至一年往返馬中兩國會談 3 次，對於日理萬機的兩國領導人而言，若不是非常看重這項發展，豈可能花這麼多時間在這兩個工業園之上？「中馬欽州產業園」既然也由納吉和溫家寶親自主持開園儀式，「馬中關丹產業園」也應由兩人共同主持開園儀式才有意義，可是「馬中關丹產業園」的開園儀式，卻是由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納吉共同主持，未免有點唐突。黃家定解釋說那是因為「中國即將召開兩會，這段期間高層不能出國，但是中國為了馬來西亞這個特別情況，特別委派地位高的賈慶林來馬」（星洲日報，2013a）。言下之意，原本應由溫家寶和納吉共同主持的開園儀式，是因為馬來西亞要求開園的時機讓溫家寶和其他高層都無法配合，因此才派出賈慶林做代表。這對於兩國而言無疑是憾事，既然如此，「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為何非得選在農曆年前，使得溫家寶無法親自參與？為何不能緩一緩？納吉和國陣政府到底急甚麼？唯一的原因是選舉迫在眉睫，納吉和國陣需要「馬中關丹產業園」這



張成績單，希望華裔選票回流。

按馬來西亞憲法第四十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除非國家元首在首相的勸告下提早解散國會，否則每屆國會的任期從第一次國會會議開始計算，滿5年後自動解散。無論國會是由國家元首解散或5年任期屆滿自動解散，全國選舉必須在解散之日算起的60天內舉行。馬來西亞第十二屆國會的第一次會議是於2008年4月28日召開（The Official Portal of Parliament of Malaysia, 2018），換句話說，第十二屆國會的任期將在2013年4月27日自動結束，選舉最晚也得在2013年6月24日舉行。根據Merdeka Center (2013)的民調顯示，屆至2013年2月6日止，西馬華人對納吉的滿意度為34%，馬來人75%；對國陣政府感到「開心」程度，屆至2013年1月13日止，華人為20%，馬來人為67%。雖然受訪馬來族群逾2/3都認同納吉和國陣政府，但欠缺華人支持，國陣仍舊無法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納吉提高華裔選民支持的時間顯然所剩無幾。「馬中關丹產業園」訂於2013年2月7日開園，3天後的2月10日就是大年初一，正好讓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政治人物依慣例參加華社各種團體舉辦的新春團拜時，可以大力宣傳「馬中關丹產業園」，做為納吉政府與中共的友好關係的憑證，提高華裔選民的支持度。廖中萊在大年初七出席「關丹華團聯合會」主辦的新春大團拜活動時，就麼做了（星洲日報，2013c）。

至於中共或溫家寶之所以答應納吉政府的這項請求，應與中共對納吉和國陣政府的特殊情感有極大的關係。溫家寶2011年訪馬時曾就馬中關係這麼說：「人予我有恩，不能相忘」，對於這「恩」，溫家寶是這麼說的：「第一件事，是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馬來西亞是第一個跟中國建立邦交的東盟國家。37年前，馬來西亞時任首相敦拉薩及中國總理周恩來簽署建立外交關係的協議。第二件事，是馬來西亞在20年前向東盟建議跟中國進行對話」（星洲日報，2011c）。溫家寶口中兩件事都是國陣政府促成，第一件事與納吉的父親拉薩相關，第二件事則與納吉的師傅馬哈迪相關。納吉集拉薩、馬哈迪和國陣的光環於一身，使得中共和溫家寶不太容易拒絕納吉和國陣政府的請求，特別是促成馬中建交的拉薩，溫家寶的感情顯得特別深刻。這可從一樁小事看出來，就在溫家寶於2011年第二度訪馬時，在出席納吉招待的晚宴上，溫家寶事前特地要求納吉的母親拉哈諾雅（Rahah Noah）也得出席，席間溫家寶更與拉哈閒話家常（星洲日報，2011d）。

從以上分析所見，「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時機是為了在第十三屆選舉拉抬華裔選民的支持，是沒有存疑的了。多元啟發論主張決策者在做決策時，會同時兼顧決策者政權和國家利益，不過卻會事先思考政權利益繼而再思考國家利益，因而就形成兩階段決策。在第一個決策階段先剔除不利政權的選項，然後在第二個決策階段再選擇對國家最有利的決策。以多元啟發論假設「馬中關丹工業園」開園的決策方案，至少會有 2 項可供決策者選擇：

A 選項：農曆年前開園，接受中共派出其他代表代替溫家寶開園。

B 選項：農曆年後開園，由溫家寶代表中共開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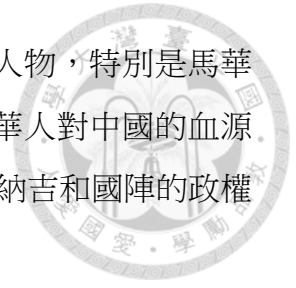
表 5-5：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決策選項

選項	屬性	
	政權利益	國家利益
A	有	有
B	有限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無論是 A 選項或 B 項項都具備「國家利益」，唯一的差別就是政權利益的獲利程度，A 選項是有限，B 選項為有限。基本上「馬中關丹產業園」在馬來西亞設立，港口直接和「中馬欽州產業園區」連接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對馬來西亞尤其是馬來半島東海岸的經濟發展，確實頗助益。尤其在中共爾後於 2013 年底提出「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後，「馬中關丹產業園」就被列為「一帶一路」的項目之一，習近平也於 2014 年 10 月，指明「馬中關丹產業園」和「中馬欽州產業園」為「中國—東協」合作的旗艦項目（星洲日報，2014），「馬中關丹產業園」因而成為中國企業爭相投資的地點（星洲日報，2017），對馬來西亞經濟層面的國家利益無疑是鉅大的。至於在政權利益上，由於國家經濟利益的提升，是有利於人民對政權的好感度，但是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的華裔選民選前的低支持率，只要華裔選民支持率不回流，國陣就難以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納吉的巫統黨主席職的正當性就會受到挑戰。因此，在接近選舉前唯一能讓華裔選民感受到納吉和國陣對中共有好感的舉措，

就只有趕在農曆年前讓「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幕，並讓國陣政治人物，特別是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政治人物在過年期間好好對華社宣傳，並且喚起華人對中國的血源祖國或文化祖國的情緒，以便票投國陣。因此，選項 B 並不符合納吉和國陣的政權利益，因此在第一階段就被淘汰，選項 A 成為最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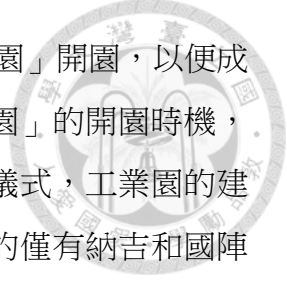


第六節 總結

「馬中關丹產業園」的設立，對馬來西亞國家經濟發展確實有利，並使得馬來西亞更接近達成「2020 宏願」的目標。馬來西亞和中共的關係在進入納吉執政的 2009 至 2013 年之間，遠比前幾任首相更為緊密，尤其是「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的落實，兩國關係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納吉此回打的「中國牌」效果，卻不再如同 1974 年和 1999 年選舉時來得有效，馬華公會的議席勝選率從 2008 年的 38% 下跌 19% 至 2013 年的 19%；民政黨也從 2008 年的 17% 下跌 8% 至 2013 年的 9%⁷⁴。有意思的是，這段時間一直視中共為威脅制造者的美國，也在納吉積極運作下與馬來西亞的關係越來越友善，一掃馬哈迪時代的相互叫囂陰影。納吉和馬來西亞悠遊於兩強之間，仍能獲得中共特別的關愛，不為馬來西亞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影響，除了納吉的柔軟身段，溫家寶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共駐馬大使柴璽 2013 年末任期結束離馬之前，曾在華人團體舉行的送別晚宴致詞時透露溫家寶與納吉互動的密辛。原來早在 2011 年，納吉應「中馬欽州產業園」開園前往中國南寧與溫家寶會面時，納吉就曾對溫家寶提出許多請求，希望中共全面配合，溫家寶非但全數答應，之後也一一兌現承諾。此外柴璽也曾在 2013 年第十三屆選舉前告知溫家寶，納吉需要溫家寶的政治支持，溫家寶則回以他當初和納吉到欽州開拓產業園，就是為了支持納吉。後來溫家寶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卸任中共總理職時，更親自以「行書」書寫 3 頁的告別信給納吉，並且不忘附上英文翻譯（光明日報，2013）。

從柴璽描述的這些事件中，可看出溫家寶對納吉的厚愛和關愛程度，也就能理

⁷⁴ 馬來西亞 2008 年和 2013 年的國會議席一樣都是 222 席。馬華公會於 2008 年競選 40 席，贏得 15 席；2013 年競選 37 席贏得 7 席；民政黨於 2008 年競選 12 席贏得 2 席，2013 年競選 11 席贏得 1 席。



解中共願意配合馬來西亞在 2013 年農曆年前，讓「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以便成為納吉和國陣政府宣傳的成績單的原因了。不過「馬中關丹產業園」的開園時機，其實對馬來西亞國家利益並沒有特別的影響，畢竟開園只是一種儀式，工業園的建設和外商的投資並不會因為開園與否受到太多影響，真正受影響的僅有納吉和國陣政府的選舉造勢而已。因此從多元啟發論角度分析，「馬中關丹產業園」的開園時機是一種對納吉政權的加持，但無損國家利益。

第六章 結論



綜合前面各章的描術、解釋和分析，可以發現馬來西亞的對中共政策，尤其是對馬來西亞三位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和納吉（Najib Razak）政權延續的關鍵選舉中的外交決策，完全符合多元啟發論的假設，即是「國內政治是外交決策的關鍵要素（the essence of decision）」（Mintz et al., 1997a）。為了在對自己政治生涯的重要選舉中取得國會三分之多數或贏得選舉，華人選票成為達到目標的關鍵元素 – 拉薩在 1974 年第四屆選舉前 84 天的 5 月 31 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馬哈迪在 1999 年的第十屆選舉前一周的 11 月 22 日，邀請中共總理朱鎔基到馬來西亞官訪，並在選前 6 天確定「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的復辦；納吉在 2013 的第十三屆選舉前 89 天的 2 月 5 日和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共同為「馬中關丹產業園」主持開園儀式。此外，三人引入「中國」這個吉隆坡由始至終都認為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國家因素，意圖影響華人投票行為繼而影響選舉結果的作為，表面上看似為了政權利益犧牲國家利益，但根據本論文分析首相們的決策選項和決策結果，並非如此。三任首相皆符合多元啟發論的主張 – 決策並沒有為了維護政權利益全然犧牲國家利益。他們都抱持著雖然必須維護政黨利益，但不能完全違反國家利益；而維護國家利益，也不能完全超越政黨利益的原則，因此僅僅符合單一利益的決策選項並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最終的決策都是兩者利益兼具者。

不過，為何馬來西亞首相覺得馬來西亞華人會因為他們在選前百日內與中共密切互動，就會獲得華人在選舉中的選票支持？根據認知心理學的解釋，決策者一般上都是「認知的守敗奴」（cognitive misers）（Fiske and Taylor, 1984），習以減化他們本來已經有限的加工資訊能力。他們在認知上的缺乏並非因為資訊不足，而是因為他們欠缺對資訊關注力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決策者習於憑藉啟發法，也就是對決策環境提出簡單及主觀的陳述捷徑以界定他們要接受的資訊（Oppermann, 2014），顯而易見決策者對資訊和事件的關注是高度選擇性，並且在能夠取得的資訊中，僅使用極度少數的訊息做為決策選擇（Simon 1985; Vertzberger 1990），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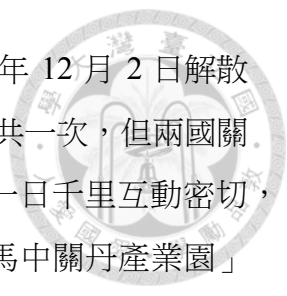
決策者在做決策時會直接選擇最熟悉也最快喚起他們記憶的事件（Oppermann, 2014）。

馬哈迪在 1999 年選舉和納吉在 2013 年打的「中國牌」，堪稱受到 1974 年拉薩利用「馬中建交」事件，使得在同年選舉中華人選票成功回流的事例影響。在 1974 年的選舉，拉薩政府在沒有提出有利華人社會政策前提下，應「馬中建交」就成功取得廣泛華人選民選票回流，以至馬哈迪和拉薩在選舉時需要華人選票支持，又不想提出太顯著對華人有利的政策得罪馬來選票，因而才在可能影響他們個人政途的選舉中，模仿拉薩 1974 年的行為。可是納吉卻未發現，年輕一代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已經微乎其微，因而 2013 年選舉時華人選票非但沒有回流，還導至約九成華人選票流失，以至納吉在選後翌日喊出：「華人到底還要甚麼」（馬來語原文：*apa lagi orang Cina mahu*）（Utusan Online, 2013）。納吉這句話，展現了納吉政府已經無法與時俱進的掌握華人選民思維。這就證實多元啟發論主張的決策者在決策時，經常以過往經驗形成的認知捷徑做決策依據，但過去的經驗並不代表就適合於現在的時空背景，因為如果納吉確實掌握 2013 年華人選民對中國或中共的情感，就會知道「打中國牌」對此時的馬來西亞華人已毫無吸引力。

那麼，三位馬來領導人究竟是用甚麼途徑認識中共和馬來西亞華人，有鑑於他們對華人認識時所居的位置，與開展中的馬來西亞華人社群所選擇的位置不盡相同，而且各自都隨著時空在演化，以至於固守某一種看待華人的觀點，很容易就因為時空的轉換而失效。面對這種內涵不確定的身分認同，本研究是採用石之瑜提出的「後華性」分析角度加以釐清。

第一節 馬來人 vs 華人

從本論文中可以發現，馬來領導人在識別中共是敵是友，與馬來領導人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知脫離不了關係，雖然這份認知有時候僅建立在少數華人群體之上。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時拒絕和中共建交，是因為東姑阿都拉曼對黨員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共產黨在馬來西亞展開恐怖攻擊的不滿；馬來西亞




1974 年與中共建交，是因為拉薩需要華人選票支持；馬共於 1989 年 12 月 2 日解散前，馬哈迪雖然於 1985 年為了開拓馬來西亞出口市場率團前往中共一次，但兩國關係卻依舊非常冷淡；馬共解散後，兩國關係從馬哈迪到納吉時代一日千里互動密切，「中國銀行」在馬來西亞的復辦和馬中「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的「兩國雙園」建立，都是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政府為了透過與中共的互動贏取華人好感，以在選舉中勝得華人選票支持的政策。在分析馬來領導人是如何辨識中共以前，事先理解馬來人和華人的構成及兩個族群歷來的恩怨情愁，有其必要性。

壹、誰是馬來人？

「馬來人」做為族群或國族的概念，是英殖民政府基於政治目的而建構，最早出現於 1800 年代英殖民的馬來半島，之後再於 1900 年代初固化（Reid, 2004; 2004）。事實上在更早之前，「馬來人」在歐洲文獻中原是在麻六甲經商的各國商人統稱，這些商人中有的來自阿拉伯、非洲甚至中國（Reid, 2010）。「馬來人」做為一個民族的概念被具體化，是在新加坡第一任英國總督萊弗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他把 15 世紀到 16 世紀間編著記述麻六甲王朝歷史、族譜、傳說等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馬來文獻「諸王起源」（Sulalatus Alatin），在 1821 年出版時易名為「馬來紀年」（英文：Malay Annals；馬來文：Sejarah Melayu）（Reid, 2004）。也大約在這個時候，原本在歐洲文獻以「半島」或「麻六甲」稱之的土地，也被易名為後來廣為人之「馬來半島」（Reid, 2010）。

較後，為了統治馬來半島之便，英殖民政府於 1871 年和 1881 年進行人口調查，把居住在馬來半島的民眾劃分為 3 類：爪哇人、占碑人、武吉人等來自馬來群島的族群被歸類為馬來人；中國南來者不分籍貫一律歸類為華人；印度南來者全數歸類為印度人。由於英殖民政府對馬來半島的統治權，大都經過與各州王室蘇丹協議所得，因此英國治理馬來半島時自認有對馬來王室的保護義務。為了確保馬來王室的權力不至潰散，英殖民政府在 1920 年代為馬來學生設立的教育體系中，特意形塑所有穆斯林學生對「馬來人」的身份認知，強調「馬來人」的重要特質之一就是對源自麻六甲王朝血統的馬來王室效忠，讓馬來人為一個民族的形式漸漸具體化。「馬




來人」在這套教育體系下，成為一種有地理疆界的族群意識，不再是原本的群島離散（Archipelago diaspora）情緒（Reid, 2004）。此外，英殖民政府仿英國精英貴族學校伊頓公學於 1905 年設立的「瓜拉江沙馬來學院」（Kuala Kangsar Malay College），專門招收來自王室、貴族及在校成績優秀的馬來籍男學生，做為未來進入公部門的搖籃（MCKK, 2018）。這些馬來精英進入政府體系後，又更進一步強化「馬來人」的概念（甘德政，2018）。

在英殖民政府精心設計的教育制度調教下，「馬來人」對自我身份認知和「馬來人」作為族群的概念固然有所覺悟，不過「馬來人」在馬來文中作為一個族群的認知上，卻仍與西方的族群概念有別。馬來文深受梵文影響，族群的馬來文 *Bangsa* 源自梵文（Tan, 1988），原意為世系或種姓制度，在古典文獻中若沒有 *Bangsa* 者皆為出身低下者，「馬來人」對族群的認知因此又比英語的 *race*（族群）多了一層義涵，他們即是這片土地的土著也是這片土地的主人。馬來國族主義於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誕生，堪稱是一種對照於英國人和中國人的國族主義的回應。面對在馬來半島出生的華人爭取在半島上享有政治權力時，曾有馬來報回應「馬來人有權力不僅是因為他們在馬來半島出生，而是因為他們屬於馬來族（*bangsa*），他們是最早的族群（*bangsa*），他們擁有這片土地」（Reid, 2004）。

貳、誰是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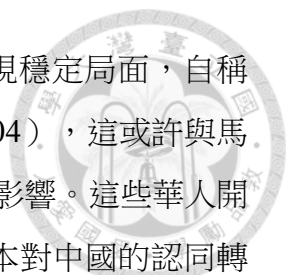
早在清代文獻中，「華人」及「華僑」就常常被用以指稱在南洋的中國人（顏清滄，1982；王賡武，1994；古鴻廷，1994）。前者泛指具中國血源、居住在中國之外國家，具在地國國籍卻不具中國國籍者（曾少聰，2004），「華人」身份的最大作用是為區別與在地國土著或其他族群的身份（石之瑜 & 李慧易，2017）。與「華人」的主要不同處在於「華僑」雖然也具中國血統、長居國外卻對中國具歸屬感，視中國為祖國（莊國土，2001）。馬來亞獨立前，「華人」僅占整體南來具中國血統者中的少數，他們是已在馬來半島落籍數代、接受英語教育、在公部門工作或從商的上流社會的「海峽殖民地華人」（Wang, 1970；Tan, 1988），相對而言視自己為「華僑」者，就成為了普遍多數。



不過，「華僑」本來並非南來中國人對自己認知的「主體」（王賡武，1994），而是在辛亥革命前後，受到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影響蔓延開來的意識（Tan, 1988）。相對於馬來人的身份認同是英殖民政府的建構，馬來半島「華僑」的身份或民族認知卻是以國家這個政治單位做為依據。在此之前，清廷主要透過在馬來半島檳城設立的副領事館，透過文化和教育等各種活動，宣揚和建構南來中國人對「朝廷」或皇帝的效忠，但隨著清政府聲望在 1895 年甲午戰爭、1898 年戊戌變法和 1900 庚子之亂再三被打擊、保皇派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分裂，革命派鼓吹「恢復中華，驅逐韃虜」的民族意識才開始占上風（顏清煌，2007）。依據革命派如章炳麟和鄒容發表的文章所見，革命派的民族意識是建立在語言和文化上，這樣的主張也曾為後來馬來亞獨立後，華人對為自己身份認知的準則（Tan, 1988）。

中華民國建國後，中國國民黨開始在馬來半島各地建立支部對華僑進行愛國意識宣導，主要透過國慶慶典、籌款運動和國語教學。不過，相關行動卻使一些英政府官員認為中國國民黨陰謀撤反華僑對抗英殖民政府，使馬來半島淪為「中國第十九省」。英殖民政府因而開始干涉華僑教育的發展，包括建立課本審查制度、禁止不符英殖民政府意識形態的課本進入馬來半島，直到 1930 年 11 月，中華民國和英殖民政府交涉，雙方才找到一個妥協點（甘德政，2018）。1950 年代早期，馬來半島華文學校的老師都曾在中國學習，課本都由中國進口，學校也普遍教授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Tan, 1988），簡言之，華文學校在相關年代是華僑國族主義的溫床，而華僑國族主義的想象共同體，即是中國民族。當這種「中國民族的想像」體現在實際行動上，即是「1937 年蘆溝橋七七事變」馬來半島華僑知識份子、勞工、商人的捐款救「國」行為，例如在 1937 年 7 月到 1940 年 11 月間，從馬來半島匯往中國的救濟金就達 1.45 億元，佔海外華人捐款總額 64%（甘德政，2018）；還有少數人返「國」從軍抗日和響應中國人民共產黨的解放中國行動，二戰後在在馬來半島加入「馬來亞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解放馬來半島於英國的殖民（Tan, 1988）。

大部份「華僑」的「中國民族」意識，直到馬來半島戰後爭取獨立才開始緩慢的轉向對腳下土地的認同。由於馬來人為了捍衛自身做為馬來土地主人身份，積極爭取在獨立後優於其他族群的特權，許多「華僑」憂心自己的公民權在新成立的國家中受損，因而聯合「海峽殖民地華人」向英殖民政府要求公民平等權（Wang,



1970)。直到 1970 年代起，馬來亞華人對馬來亞的認同開始呈現穩定局面，自稱「華僑」者穩定減少，以「華人」自居者逐漸增加（李盈慧，2004），這或許與馬來西亞和中共於 1974 年建交後，中共拒絕雙重國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些華人開始承認馬來亞／馬來西亞為他們將會長居久安的國家，有些把原本對中國的認同轉向馬來亞／馬來西亞，又或者同時認同中國和馬來亞／馬來西亞，形成一種雙重認同（謝劍，2006；石之瑜、李慧易，2017）。做為一個馬來西亞公民，華人對馬來西亞的民族認同承襲對中國民族認同的模式，是基於馬來西亞做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單位認同，他們主張馬來西亞民族應包含不同族群，拒絕被同化成為馬來人，也即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家前主張的、和後來行動黨鼓吹至今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從上述分析可見，馬來人和華人的民族意識早在馬來亞獨立以前就形成，但雙方認知的方式卻大相逕庭。馬來人的民族／國族認同包含土地的獨佔性，並以單一民族為民族／或國族；反之華人的民族／國族認同雖然也以國家做為單位，但華人的民族／國族認同，雖然也是認同疆界內的土地，但卻允許多元族群同時存在於民族／或國族認同的大傘之下。依據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二款闡明，馬來人是一種建構論而非血源論，只要「一個人信仰伊斯蘭教，日常使用的語言為馬來語，遵守馬來人的習俗……」，也即是馬來人的民族認同沒有排他性，僅有滲透性、同化性。很顯然，馬來人願意有條件性的「開放門戶」讓所有具公民權的族群加入馬來人的大家庭，一起成為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的主人；可是對自身民族有高度認同的華人，卻拒絕馬來人的邀請不願意被同化，情願在馬來亞／馬來西亞過著形同二等公民的生活，也不願享有做為馬來人的全部的公民權利。再加上馬來亞獨立前，華人對中國高度認同的「華僑認同」讓馬來人印象深刻，難免讓馬來人覺得華人不願意為這個國家負起公民責任，一心只想回到中國這個「祖國」的懷抱，因此才會出現縱使馬來西亞已獨立逾一甲子，近 10 年來仍有偏激的馬來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an, 巫統）政治人物不時叫囂「華人只不過在這裡寄居而已」（馬來文原文：*Orang Cina Cuma Tumpang Di Sini Sahaja*）（The Star, 2008a; 2008b）或「最好回唐山

去」(馬來文原文：*Elok Balik Tongsan*) (光明日報，2015) 的情形⁷⁵。這就解釋了馬來西亞過往三任首相，在選舉中需要華人選票時都習於「打中國牌」的原因，因為對馬來首相及其他馬來領導精英而言，他們不可能在國家政策上給予「非我族類」的華人更多的福利，那就只好利用華人效忠的對象，取得華人的選票支持。至於馬來領導精英形成「打中國牌」就會贏得華人在選舉中支持的認知，本論文採「後華性」來分析。

第二節 三位首相的後華性

在「後華性」概念中，「華人性」的內涵會因應互動組合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意義 (Shih, 2018b)。這主要是因為「華人性」受限於地域、在地文化、社會結構、法律約束和政治制度影響，以至於各地的「華人性」都有一套獨有的組成元素，並且也能獲得其他國家的華人、非華人和中國人辨識，以至「華人性」始終沒有一個能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華人性因而有多種不同的意義。縱使一個未具華人血源者，只要掌握構成「華人性」的部份元素，策略性的向被認知為擁有「華人性」的互動對象展示，當其「華人性」獲得互動對象接納和認可時，此人展示「華人性」的目的和原因即可能被滿足 (Shih, 2018b)。「後華性」因而認為，「華人性」是一種可以透過政治化或文化準備獲取，是一種「同時具備共同身份的想像及差異政治的再確認」(石之瑜、李慧易，2017)。

馬來領導精英的華人認識同時涉及華人、馬來人與中國，因為他們理所當然認定華人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比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關係密切得多，也就是在歸類的時候，華人屬於中國的範疇，馬來人不屬於，以至於對中國的觀感立即影響對待華人的態度。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共是敵是友的認知，主要透過與國內華人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的接觸和互動形成的想像和認識。事實上在馬來西亞和中共建交之前，兩國高階管理精英的接觸少之又少甚或沒有，這可以從媒體或書籍上並無相關記錄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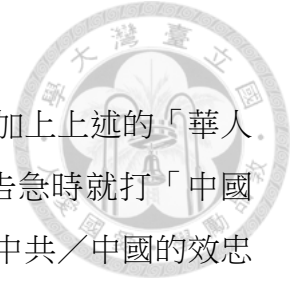
⁷⁵ 從這裡或可推論，對馬來人而言馬來西亞公民的意義有兩種，一種是法律上認定的制度意義，另一種是成為馬來人的實質意義。

馬中關係於1990年代進入友好階段互動頻繁，馬來領導精英與中共領導精英得以直接接觸中共領導人，可是他們對中共的認識，依舊難以脫離從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視角檢視。儘管三位首相所處的時空環境不同，但他們對中共和華人的認識，由始至終一以貫之，從未改變。



壹、三任首相對華人與中國的認識

巫統創辦者之一翁惹化（Oon Jaafar）在1953年時的一場演講中，曾說「馬來亞的華人98%效忠中國，剩下的2%是共產份子」，他也譴責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透過馬華公會控制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以使馬來亞成為中國的省份之一（崔貴強，2007）。由於當時馬共的刺殺對象為英殖民者和馬來領導人為主，在那個年代「馬共」這個名詞對馬來人而言等同邪惡，翁惹化的說法突顯了華人和馬來人的差異，但卻把華人和中國緊密聯接。前副首相慕沙希旦（Musa Hitam）於2009年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曾坦言，馬來人對華人的偏見始終存在，這份偏見是源自於馬來亞獨立前後，馬共在馬來半島的武裝鬥爭，「當時『甘榜』（馬來文原文：*kampung*，為「鄉村」之意）裡的村民都反抗馬共，雖然不是反華人，不過基於馬共是以華人為主，這導致種族之間產生了偏見。後來在戒嚴時期，華人被安排聚居在同一村莊，馬來人負責維持治安，這也使得華人視馬來人為政府的代理，馬來人則視華人為馬共代理」。他補充，「早期華人都外來移民，本土馬來人自然對他們存有歧視，尤其是在認為自己的權益遭到外來移民者剝削時」（星洲日報，2009d）。此外，曾在1990年至2008年間擔任檳州首席部長18年、後於2009年至2013年擔任首相署部長的許子根，接受筆者訪問時也坦承，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國陣）為了要鞏固華人選票，在他擔任首長的18年間，每回中共有高官訪馬時一定安排這些高官到華人人口最多的檳州訪問，並由許子根接待，因為馬來領袖都認定華人必然有中國情意結，而這個情意結可以從每次有中國領袖來訪，中文報紙就大肆炒作中瞭解，這種炒作，自然就是符合市場需求。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情結，基本上連中共官方也有這方面的認知，一名不願具名的政府官員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他在90年代時曾不經意聽到中共大使館人員的對話，某某高層官訪馬來西亞時一定要安排到檳州，好鞏固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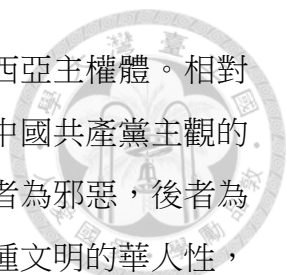
選票，拉抬許子根和國陣在華人之間的聲勢。

從翁惹化、慕沙希旦、許子根和不具名的政府官員說明，再加上上述的「華人寄居論」、「回到唐山去」的言論，及三位首相面對華人選票告急時就打「中國牌」，顯示他們是把華人和中共／中國視為一體，並認為華人對中共／中國的效忠度始終存在。馬來政治精英憑藉的是華人與中共／中國的血源關係，斷定華人與中共／中國同屬一家，與「馬來西亞」並非一家。這種系統性的你和我分析方式並把華人加以歸類，馬來政治精英對華人和中共的認識，正是「科學的華人性」認識。

貳、首相對中共的認識

若按國家領導人層面的分析，無論是拉薩、馬哈迪或納吉都即不認同自己為華人，未曾在中國居住學習，也沒有學習中華文化的公開紀錄，按「後華性」的分類，三人對中共的認識也的確屬於自居為局外人的「文明的華人性」或「科學的華人性」了，也就是他們在直接或間接界定華人性以及與華人互動的同時，反映並鞏固了自身某種理所當然的馬來性。「文明的華人性」泛指透過主觀的文明標準、意識形態辨別「華人」與自己的異同，透過兩者的差異性妖魔化或浪漫化對方，形成僅屬當事人的「華人性」觀點。至於「科學的華人性」則為透過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標準如主權疆域、親緣、膚色語言、法定公民身分等參照或政策，技術性地界定「華人性」，如此中國就是一個可以被當成具體對象的地域、人口、社會結構和政策組成的條件（Shih, 2017; 2018）。

按石之瑜的解釋，「文明的華人性」應屬於主觀方式的理解，「科學的華人性」為相對客觀的辨識，因此前者在理解中國時才可以因應妖魔化或浪漫化的情感與政治需要，後者則僅表現為一種理性話語。透過這樣的理解，如果馬來西亞僅止於在國家安全的層次上界定中國為敵人，就必須更專注在中共的國力與潛在的擴張政策，並加以因應，中國是科學上可以計算的實力，至於他們想要運用實力來影響的對象就是華人，而華人在馬來西亞做為相對馬來族群的少數民族身分也是客觀的，於是華人自己的想法變得不重要，中國的文明與歷史也沒有參考的意義，如此反映出的是馬來西亞自己的主權與疆域特性，必須加以保護，而不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宗教或



人文特性，所實踐的因而是一個能掌握科學華人性的外在的馬來西亞主權體。相對於此，如果馬來西亞就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深究，並能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主觀的動機及意志，進而區隔開多數熟稔資本主義的馬來西亞華人，前者為邪惡，後者為無辜，或相反的視後者為共產黨發展的溫床，馬來西亞則取得一種文明的華人性，在道德視華人為同志（或寇仇）。同理，如果從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制或儒家文化，回顧與今天的東南亞的固有關係，則與中國和平共處便成為正常的願望，這時的馬來西亞，當然同樣也是可以超越物質性的國力對比及權力平衡的文明體。

拉薩於1970年任相後，一改東姑阿都拉曼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上對中共敵視的態度，積極展現與中共建交的善意，因為他認為包括馬來亞在內的東南亞國家，若要置身於美蘇冷戰之外，就得確保國家政策中立化（南洋商報，1970）。拉薩這個想法深受伊斯邁醫生影響，他們認為只要和中共建交，中共就不會攻打馬來亞／馬來西亞，同樣的中共也不會再支持或協助馬共也就不會在馬來亞／馬來西亞作亂，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國家安全自此就不會再受到中共和馬共的威脅。這樣的邏輯假設的形成無需對中共或中國有所認識，並且也適用於所有夾在兩強爭奪之間的小國，很顯然是拉薩以普遍標準思考中共在與馬來西亞建交後的反應。拉薩對中共的這份想像就是一種「科學的華人性」認識的展現。隨著馬中建交後，中共不但未答應拉薩的要求放棄對馬共的支持，反之馬中建交後馬共在馬來西亞的攻擊提高，先是在吉隆坡刺殺全國總警長，後又在象徵於緊急時刻打敗共產主義國家英雄紀念碑前引爆炸彈。基於以上因素，馬中建交後馬來西亞與中共的互動非常冷淡，僅維持最低度往來（參照第四章第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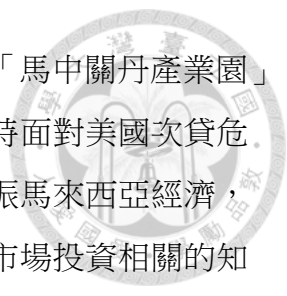
到底中國是出自於不可妥協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性，還是出自於權力必然擴張的科學法則，答案與馬來政治精英對本國的定位，以及他們如何領導馬來群眾認識自身價值的取向有關。比如，在伊斯蘭的宗教思維中，共產主義只能是國家威脅，無關其實力大小，中國一旦被視為共產主義政權，接下來要進一步判斷的是，那華人是客觀的顛覆工具，還是同屬反共的馬來西亞國民。如今，拉薩透過對中國伸出友誼與和解之手來向華人選民示好，就不可能還想像中國和共產主義是天敵，那麼中國要麼是與馬來西亞可以交流互通的歷史文明體，或國力有限而不令人擔心的鄰邦，前者是文明觀，必須雙邊互惠，後者是科學觀，主動是在馬來西亞，所以拉薩在國

家安全實力的優勢不明確的前提下，當然主動停止與中國進一步交往。至於華人，都是被當成只能是受到血緣基因左右而必然親華的被動者。

馬哈迪以馬來西亞為亞洲價值的載體，他乃傾向以文明體認識中國——要麼中國是不共戴天的共產主義，要麼中國是與西方迥異的另一個亞洲價值載體。在他22年的任期中，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態度經歷從敵視走向友好的階段，關鍵因素正是在馬共。在馬哈迪任期的前8年，馬來西亞和中共仍舊僅維持有限的互動，因為對馬來西亞而言，馬共一日仍存在於馬來西亞土地上，作為推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就仍不是馬來西亞可以密切互動的對象；直到1989年12月2日馬共宣佈解散後，馬來西亞才開始與中共密切往來。如同拉薩，馬哈迪早期對中共的敵視是因為馬共的存在而抗拒中共；馬共的解散，馬哈迪對中共的態度也隨之改變。很顯然，馬哈迪妖魔化中共不只是因為中共為共產黨，而是因為馬共的華人身分，甚至馬哈迪看到的中國文明體，其間不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浪漫認識，亦即作為亞洲價值的同盟，一起面對西方推銷的自由主義，因而才會進一步開展出1990年代以降兩國關係愈形進步的狀況。

然而對馬哈迪而言，他也擁有一種科學的後華性，他能從超越文明的國家利益角度，客觀評估中國對馬來西亞的價值，鞏固了馬來西亞外於中國的國家身分，在政治經貿領域與中國發展友善的關係，有助減少對西方國家的依賴，以免重蹈1980年代中旬因為對西方國家市場過於依賴導致經濟不景氣的覆轍，此外也可以藉中共的強勢國力組織東亞區域組織，抗衡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馬哈迪對中共態度從敵視轉為友善，同時是基於策略性的考量和計算，不僅止於是讓馬來西亞敵視的中國的共產主義，或讓馬來西亞願意親近的中國文化價值。再加上馬哈迪繼續把華人歸為中國同一類，表示他相信在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之間，存在客觀的聯繫，不因意志而轉移，所以馬哈迪對中國的認識也帶有「科學的後華性」，反映馬來西亞自身的外在客觀位置。

溫家寶曾表示馬來西亞對中共有兩大恩惠絕不相忘。這兩大恩惠指的是拉薩時代的馬來西亞是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東協國家，及馬哈迪時代的馬來西亞建議東協國家和中共對話。納吉恃著為拉薩兒子和馬哈迪欽點的首相人選，讓溫家寶願意運用中共的勢力，協助提升納吉和國陣在馬來西亞華人選民中的支持度。「中馬欽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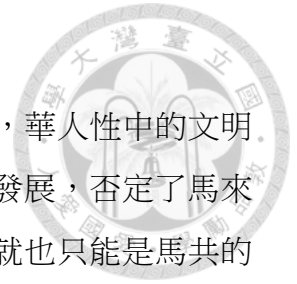


產業園」開幕之時，溫家寶特地南下與納吉共同主持開幕議式，「馬中關丹產業園」的建立更是因應納吉提出的要求建立。其實納吉接任首相時，同時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導至的馬來西亞經濟不景氣，即需要中共市場和投資刺激和提振馬來西亞經濟，如此的思維盤算已經無需對中共具有「華人性」的認識，只需對市場投資相關的知識，因此溫家寶眼中的納吉，幾乎是中國關係脈絡中的自己人，對中國在馬來西亞的利益理當負有一定責任，而納吉基於對中國與對馬來西亞的深刻認識，在兩者之間搭橋，積極溝通，營造更深層的利害相互構成，已經具備「漢學的後華性」，因此對雙方都表現出充滿信心的行動指導動力。不過納吉任相後積極修復與華盛頓的關係以制衡中國成為區域霸主，以免馬來西亞主權未來受到中國侵蝕，這種對中國的認識屬於一種理性的計算，又是回到一種「科學的後華性」了。

依據以上的分析，中國對馬來西亞而言究竟是敵是友，很顯然是因應馬來領導人對中國的需求而定義，也即是把中國視為具主觀意志的異文明／意識形態，或視中國為客觀可運用的資源。當馬來領導人把中國當成共產主義國家時，中國對他們而言就是敵；反之若把中國視為經濟資源時，中國就成為他們朋友了。

第三節 研究發現


馬來政治精英對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共的認識，主要是從民族認同／國族認同角度切入，以石之瑜的「後華性」概念，他們是使用「科學的華人性」辨識中國對馬來西亞的價值，以及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之間理所當然同屬中國人的客觀性。然而歷史上，馬來人對華人的識別自始是文明的。首先是從英國視野建構的想像中，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土地的擁有人。相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民族認同，承襲早年馬來半島華僑對中國土地認同形成的「中國民族」模式，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亞獨立後對馬來亞／馬來西亞土地的認同，形成包容不同族群在內的「馬來西亞民族」認同。兩個族群在馬來西亞認同從根本上的分歧，是出自建構的，涉及到宗教及語言，導致雙方在可見的未來都極難找到共識。華人不願意同化成為馬來人，一起成為馬來西亞土地的擁有人，大部份馬來人包括馬來精英因而認為華人依舊想要回到中國的



懷抱，對中國依舊效忠。

可是，一旦把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國視為無法分隔的一體之後，華人性中的文明成分就不再重要了，只要是華人，就是中國人。這樣一種話語的發展，否定了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能動性，當中國是共產主義威脅，馬來西亞華人就也只能是馬共的溫床，而當中國是一個資源與實力的外在客觀實體，馬來西亞華人就變成是透過中國可以拉攏的選票。不過，在沒有涉及選票的考量時，馬來政治精英則從一般的國際關係上辨識中國，中國的「華性」不再是馬來政治精英考量，與中國交往所能帶來的國家利益反而是他們所重視的，此時馬來西亞對中國的辨識因而是「科學的華人性」，也就是表示馬來西亞也是透過客觀的國家利益來自我定位的。馬來政治精英使用兩種概念辯識中共，使他們選舉面對華人選票危機時打「中國牌」，但又會以「多元啟發論」小心評估相關中國牌打出後對國家利益影響程度，因為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是共存的，若相關決策僅滿足政權利益，則會遭受人民唾棄；若僅符合國家利益，則或許使得政權利益蕩然無存。因此馬來政治精英在所決策時，心須同時滿足政權和國家利益，才能在選舉中獲得支持，只不過是政權利益的比重相對國家利益高一些而已。

儘管如此，從納吉於2013年選舉再次打「中國牌」，卻仍舊面對華人選票的大量流失。專門負責取得華人選票的馬華公會所得國會議席率，從2008年的38% 下跌19%至2013年的19%；民政黨也從2008年的17%下跌8%至2013年的9%，由此可見此階段的華人選民對首相的「中國牌」意圖喚起的「中國情結」或「祖國」意識，並不再如14年前或39年前的華人選民有感，或者也可以說對此階段大部份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人選民而言，他們或無法否認自己的血源來自中國土地，但許多人並未踏足中國，中國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血源和文化的符號，遠不如他們被二等公民對待的馬來西亞熟悉和具體。因此，相對於早年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華人長輩，雖然大半輩子在馬來西亞生活，但仍舊對中國以祖國相稱，第二代以降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土地認同則多為馬來西亞，就如同時任行動黨國會領袖林吉祥所言，他的「祖國」是馬來西亞而非中國（光明日報，2016）。林吉祥說出了許多此一階段的華人心聲。隨著中國南來華人的凋零和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人人口增加，納吉的「中國牌」自然無法再吸引華人選票支持國陣。相對於國陣於2018年選舉沒有汲取2013年選舉



教訓，仍舊以中共主席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再次向華人選民狂打「中國牌」（亞洲周刊，2018；多維新聞，2018），希望獲得華人的支持。已退出巫統創辦「土著團結黨」（Malaysia United Indigenous Party）加入反對陣營「希望聯盟」的馬哈迪，則成功掌握認同中國的華人選民漸少但認同馬來西亞者增長，於2018年選舉時大肆抨擊納吉領導的馬來西亞，與中共在「一帶一路」的投資與合作是賣國行為（亞洲周刊，2018）。反而是馬哈迪成功跳脫巫統歷任首相，包括過去擔任第四任首相時的他自己，不再以「科學的華人性」看待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的關係，而是改以「中間人」的「族群的華人性」辨識馬來西亞華人，（石之瑜、李慧易，2017）即是馬來西亞華人因為受到在地歷史、文化和制度的影響，或許仍保有與中國人共同的語言和文化，但相對於活在中國國土上的人民對馬列思想和共產意識非常熟悉，但馬來西亞華人而言卻一問三不知，可見在思維層面和生活習慣上不但不再能和中國人劃上等號，更重要的是有一種對馬來西亞身分的認同，因而追求馬來族群的認可與自身的平等地位。馬哈迪的與時俱進，成功掌握華人認同的轉變，他於是與納吉相反，反而表現出某種抵抗中國的立場，間接卻有效地吸引馬來西亞華人對他的支持，這樣的支持證明他們認同馬來西亞，而這是因為馬哈迪與中國的對抗姿態，不再用中國來吸引他們的選票，賦予了他們一個擺脫中國身分的機會，進而宣告成為馬來西亞人的尊嚴。這可以從選舉結果可見：馬華公會的國會議席從2013年的7席跌剩1席，民政黨則全軍覆沒（Election Commission of Malaysia, 2018）。

文末，本論文再次強調，華人選票或三任國陣首相及希盟領導人「打中國牌」並非華人選票流向的唯一或終極因素，而是眾多因素中無法被忽視和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間絕對反映了打中國牌的領導人對中國與對華人的認識角度。即使如此，除非華人有朝一日被完全同化，或者馬來人改變思維不再堅持「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接受「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主張，否則在可預見的未來，「華人」、「中共」和「中國」相關的議題，仍舊會被馬來政治人物或華人政治操作，不定期的在馬來西亞被提起。



第四節 研究建議

本論文從 1974 年、1999 年及 2013 年三場選舉切入，探討馬來西亞首相從自身馬來族群視角對中國和華人身份認知的形成，及試圖以此影響華人在選舉時的投票意向，以期在沒有徹底犧牲國家利益之下保得政權、贏得選舉。不過本論文只是這方面研究的開端，這個課題仍然可以往數個層面延展，例如馬華公會及民政黨的角色及作用、華人選民對國陣打「中國牌」的回應等，對學界作出貢獻。

壹、馬華公會及民政黨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在國陣成員黨中，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由於黨員的組成（前者僅招收華人為黨員；後者則大部份為華人），被賦予吸引華人選票的角色。馬華公會於 1952 年和巫統合作共組政治聯盟並取名「聯盟」（Alliance Party）；1974 年後「聯盟」擴增成為 9 個成員黨易名「國陣」，而民政黨也於此時加入成為成員黨之一。在聯盟／國陣的漫長歲月裡（馬華公會 66 年，民政黨 44 年），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華人領導層，究竟在中國和華人身份認同的層面上，對聯盟／國陣的成員黨黨要尤其是巫統主席，也即是首相傳遞了甚麼樣的訊息和印象？這些訊息和印象對各黨黨要包括首相在內的認知形成又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

貳、華人選民對國陣打「中國牌」的回應

華人選民對國陣三度打「中國牌」的反應不一。1974 年華人選民回流國陣的反應最為明顯，在執政黨重奪 1969 年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目標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雖然當時的華人並不盡然全數認同中共領導的中國；華人選票雖然在 1999 年微幅流失，但國陣的「中國牌」穩住的華人選票，卻足以讓國陣在馬來人選票分裂下繼續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不過 2013 年國陣打出的「中國牌」卻已然對吸引華人選票無效，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議席勝選率與 2008 年相比進一步下滑，非但無法協助國陣重奪 2008 年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近九成選票更流向反對黨。因

此，為何國陣於 1974 和 1999 年打出的「中國牌」能夠囊括華人選票，但 2013 年卻失效？「中國」對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代表甚麼樣的意義？是甚麼因素造成這樣的結果？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份

- BBC 中文，2010，〈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2010/01/100121_china_economy，2010/01/21。
- BBC 中文，2013，〈中國與馬來西亞成為「全面戰略伙伴」〉，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10/131004_malaysia_xi，2013/10/4。
- TVBS News，2011，〈超越日本！中國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https://news.tvbs.com.tw/world/46349>，2011/02/15。
- 于洪君，2015，〈馬來亞共產黨及其武裝鬥爭的興起與沈寂〉，《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http://cctb.net/llyj/lldt/zdyj/201510/t20151030_330644.htm，2015/10/30。
-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紅葉文化。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王賡武，2000，《海外華人：從土地束縛到爭取自治》，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王國璋，1997，《馬來西亞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
- 王虎，2011，〈馬來西亞對華關係背景分析：以馬中建交過程為例〉，《東南亞研究》，4：68-7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馬來西亞聯合共報〉，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27798.shtml，2004/05/31。
- 中國一帶一路網，2016，〈馬來西亞馬中關丹產業園〉，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045&info_id=2464，2016/11/11。
- 中國報，1999，〈林吉祥抨擊國陣 利用朱鎔基拉票〉，11/17，13。
- 中國報，2013，〈習近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中馬靠得住好朋友〉，10/4，1。



- 中國新聞網，2013，〈賈慶林出席馬來西亞關丹馬中產業園啟動儀式〉，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2-06/4550874.shtml>，2013/02/06。
- 古鴻廷，1994，《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石之瑜、李慧易，2017，〈從「華人性」到「後華人性」--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簡
記〉，《展望與探索》，15(5): 49-65。
- 甘德政，2018，〈不同歷史想象：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起源〉，《東南亞縱橫》，
2：77-87。
- 北部灣港集團，〈馬中產業園：園區簡介〉，
<http://www.bbwwg.com/cms/category/277.dhtml>，最後瀏覽：2018/10/04。
- 光明日報，1994，〈馬哈迪 西方民主模式絕不適合大馬〉，5/12，3。
- 光明日報，2009a，〈撤銷 30% 土著股權 納吉：開放 27 服務業〉，光明日報網頁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65057>，2009/04/22。
- 光明日報，2009b，〈納吉：一個大馬概念下「不會再有二等公民」〉，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65376>），2009/4/28。
- 光明日報，2009c，〈訪問中國行程緊湊 納吉不見留學生〉，光明日報網頁，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67265>，2009/06/03。
- 光明日報，2009c，〈納吉：一起為黨鬥爭 敦馬重返巫統〉，光明日報網頁，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63997>，2009/4/4。
- 光明日報，2011，〈納吉宣佈修改大專法令 允逾 21 歲大學生參政〉，光明日報
網頁，<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35606>，2011/11/24。
- 光明日報，2012，〈不敢回答伊斯蘭國問題 劉一端抨火箭走不出沙籠〉，光明日
報網頁，<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44599>，2012/06/03。
- 光明日報，2013，〈揭溫家寶納吉關係佳 紫璽獻計熊貓來馬〉，光明日報
網頁，<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00102>，2013/11/30。

光明日報，2015，〈第13屆國會會議 無視議長警告 議員叫囂回唐山人妖〉，光明日報網頁，<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86044>。5/11/2015。

光明日報，2016，〈林吉祥：大馬是我的祖國，我不要回「唐山」〉，光明日報網頁，<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114/%E6%9E%97%E5%90%89%E7%A5%A5%EF%BC%9A%E5%A4%A7%E9%A6%AC%E6%98%AF%E6%88%91%E7%9A%84%E7%A5%96%E5%9C%8B-%E6%88%91%E4%B8%8D%E8%A6%81%E5%9B%9E%E5%94%90%E5%B1%B1/>，1/14/2016。

光華日報，1994，〈馬哈迪：中國絕非大馬敵人 江澤民：華迎大馬人赴華投資〉，11/13，1。

光華日報，1997，〈中國支持檢討人權宣言 李鵬：南沙紛爭可留下一代解決〉，8/23，1。

光華日報，1999a，〈首相訪華節目豐富 將與中國領導人會談〉，8/13，5。

光華日報，1999b，〈朱鎔基：加強雙邊合作 訪馬無關大選〉，11/23，1。

光華日報，1999c，〈首相下周訪華3天 加強馬中在汽車及紙漿領域合作〉，8/1，3。

光華日報，1999d，〈訪華後是否解散國會？首相訪華之旅猜測多〉，8/14，4。

光華日報，1999e，〈首相今簽署3備忘錄 會朱鎔基料談中行事〉，8/19，8。

光華日報，1999f，〈首相昨結束中國行前聲稱 訪華非為大選〉，8/21，8。


光華日報，1999g，〈一概不看大選報導 朱容基免說漏嘴〉，11/25，10。

光華日報，2012，〈敦馬：當年沒反對伊斯蘭國 馬華提伊刑法為嚇華社〉，光華網，<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2/10/24/21.html>，2012/10/24。

多維新聞，2018，〈從中資爭議看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政治的囹圄〉，http://news.dwnews.com/global/news/2018-05-06/60056153_all.html，2018/5/6。

何啟才，2014，〈馬來亞共產黨的南下策略與意義〉，「『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2日），吉隆坡：馬來西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李盈慧，2004，〈海外華人認同的三種論述：評顏清滄、古鴻廷、王賡武的三部著作〉，《東南亞學刊》，1(1)：101-104。

- 
- 金秀琴，2010，〈全球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國家經濟之衝擊與因應〉，《經濟研究》，10: 299-320。
- 星洲日報，1957，〈東姑拉曼函文良港巫統支部拒絕邀請共黨國家參加本邦獨立慶典除非馬來亞共產黨停止襲擊戰爭〉，3/24，5。
- 星洲日報，1993，〈馬哈迪李鵬會談認同 中國不會有威脅〉，6/15，1。
- 星洲日報，1994，〈馬哈迪強調 中國政府須強大〉，5/12，2。
- 星洲日報，1996a，〈賽哈密：區域糾紛對話解決 中國崛起無威脅〉，2/28，1。
- 星洲日報，1996b，〈首相：與 12 億人口做朋友會更好！大馬從不仇視中國〉，4/19，1。
- 星洲日報，1997，〈中國強大不威脅大馬 安華：鄭和下西洋歷史明證〉，8/18，3。
- 星洲日報，1999a，〈全面拉近金融文化聯繫 馬中簽署 3 協議備忘錄〉，11/24，3。
- 星洲日報，1999b，〈兩國經貿發展迅速 中國銀行復辦有期〉，5/31，5。
- 星洲日報，1999c，〈張征雄盼首相捎來驚喜 期待中國銀行復辦〉，8/17，15。
- 星洲日報，1999d，〈馬中簽署兩備忘錄 沙州聯營投資紙漿廠〉，8/20，7。
- 星洲日報，1999e，〈林吉祥指朱鎔基 22 日訪馬 首相刻意打「中國牌」〉，11/16，7。
- 星洲日報，1999f，〈朱鎔基：兩國有廣泛認識 馬中關係發展勢頭好〉，11/22，3。
- 星洲日報，1999g，〈朱鎔基：馬中關係 近年處於最好時期〉，11/24，2。
- 星洲日報，1999h，〈朱鎔基：大選期間抵訪更顯珍貴 馬中重親友好關係〉，11/25，1。
- 星洲日報，1999i，〈朱鎔基訪東南亞四國行程〉，11/22，15。
- 星洲日報，1999j，〈中國總理朱鎔基見證 馬中中行將簽備忘錄〉，11/23，3。
- 星洲日報，2002，〈首相：向東政策非僅限日本 大馬也向中國學習〉，10/9，3。
- 星洲日報，2003，〈那吉：沒有野心和威脅 中國為溫和超強國〉，1/15，2。
- 星洲日報，2008，〈「阿都拉下台才重新入黨」馬哈迪退出巫統〉，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591360>，2008/05/19。



- 星洲日報，2009a，〈納吉訪華巫印代表區 首站茨廠街引轟動〉，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35560>，2009/04/05。
- 星洲日報，2009b，〈納吉就任首相宣佈 檢討內安令釋 13 人〉，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35029>，2009/04/04。
- 星洲日報，2009c，〈中國工銀：大馬設分行 馬中經貿合作擴展〉，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65568>，2013/11/23。
- 星洲日報，2009d，〈馬來人對華人有偏見 慕沙：馬共惹的禍〉，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42208>，2009/05/27。
- 星洲日報，2010，〈專訪土著權威組織主席依布拉欣 依布拉欣：可憐落後的馬來人「部份華人別太貪心」〉，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82284>，2010/04/11。
- 星洲日報，2011a，〈內安法令廢除 媒體不須每年更新執照〉，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44974>，2011/09/15。
- 星洲日報，2011b，〈黃燕燕：砍手砍腳政策癱纏「投火箭就是挺伊斯蘭黨」〉，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847988>，2011/10/30。
- 星洲日報，2011c，〈溫家寶：雙邊關係前景更美好 中馬是好兄弟〉，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27797>，2011/04/26。
- 星洲日報，2011d，〈中國銘記 1974 拉薩建交史 溫家寶要求會見納吉母親〉，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27980>，2011/04/28。
- 星洲日報，2012a，〈黃家定：中方料 4 月 1 宣佈 欽州產業園或列國家級〉，星洲網頁，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66703>，2012/03/28。
- 星洲日報，2012b，〈中馬欽州產業園開園 關丹將設馬中產業園 納吉：歡迎中國大企業投資〉，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67157>，2012/04/01。
- 星洲日報，2012c，〈中馬欽州產業園開園 方天興：政府策劃撥 1 千英畝地「建馬中關丹產業園」〉，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67150>，2012/04/01。
- 星洲日報，2012d，〈探討「馬中關丹產業園」商機 中國投資者訪關丹〉，星洲



- 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69952>，2012/04/26。
- 星洲日報，2012e，〈郭聲琨：發展前景佳 對關丹產業園充滿信心〉，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76015>，2012/06/18。
- 星洲日報，2012f，〈黃家定：先完成 50 英畝工程 關丹產業園料年杪開園〉，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88938>，2012/10/11。
- 星洲日報，2013a，〈鼓聲迎賓現場紅彤 關丹產業園開園冠蓋云集〉，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05905>，2013/02/05。
- 星洲日報，2013b，〈紫璽：屬「政府對政府」模式 政局變化不影響產業園〉，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01062>，2013/01/30。
- 星洲日報，2013c，〈廖中萊：中國投資擴建 關丹港口將躍身國際〉，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914181>，2013/02/17。
- 星洲日報，2013d，〈1974 年敦拉薩訪華創歷史 馬中建交國陣大勝〉，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921724>，2013/04/17。
- 星洲日報，2013e，〈國行北京代表處啟用 潔蒂：提升馬中經貿關係〉，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57280>，2013/11/19。
- 星洲日報，2014，〈APEC 2014·習近平：中馬 2 產業園成旗艦項目〉，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417203>，2014/11/10。
- 星洲日報，2015，〈馬哈迪：為報恩提攜納吉〉，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442770>，2015/04/25。
- 星洲日報，2016，〈納吉：馬哈迪控制慾強〉，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54396>，2016/08/06。
- 星洲日報，2017，〈不少中企「嗅」到商機 馬中雙園成聚寶盆〉，星洲網頁，<http://www.sinchew.com.my/node/1693673>，2017/10/22。
- 南洋商報，1957a，〈中國宣佈承認馬來亞聯合邦 毛澤東周思來分致賀電〉，8/31，5。
- 南洋商報，1957b，〈馬來亞獨立大典不邀請共產國家參加 東姑昨函巫統分部主席〉，3/24，9。



南洋商報，1958，〈銀行業修正法案昨通過 在馬外國國營銀行三月內須停止營業三年內全部清理完畢 財長表示此類銀行可能威脅本邦經濟〉，12/5，9。

南洋商報，1959，〈中國銀行檳隆兩分行準備結束 星中行代理人不表示意見聯合邦固定僑匯仍可轉由星行辦理〉，1/6，9。

南洋商報，1965，〈全國華族註冊社團代表大會議決 籲請各族加強團結 擁護東姑支持國策 反對任何挑撥離間民族和睦陰謀 敦李孝式宣佈大會只討論規定兩提案 並取列華文為官方語文案恕未能列入〉，6/21，9。

南洋商報，1966，〈馬印對抗正式結束〉，8/12，2。

南洋商報，1967a，〈東姑首相昨晚在國會重申 不能與中國建交 其政策圖控制東南亞小國 惟表示並不反對共產主義〉，6/21，6。

南洋商報，1967b，〈馬來西亞政府昨日發表憲報號外 公佈九種官方用途 準許繼續使用英語 最高元首亦授權首相 允准其他場合用英語〉，9/3，5。

南洋商報，1967c，〈六七年國語法令下月一日起在馬生效 國語為官語 英語可沿用〉，8/4，6。

南洋商報，1967d，〈國慶日首都兩項示威事件 警方共招捕十七名人士 檳城亦有三處示威遊行 勞工黨聲稱四黨員被捕〉，9/2，6。

南洋商報，1967e，〈東姑表示大馬可能先在南國設立大使館辦事處 待至適當時候然後派遣大使上任 馬來西亞與南斯拉夫雙方已同意 正式建立邦交 無須再舉行談判 將儘速互派大使〉，5/6，1。

南洋商報，1968a，〈東姑稱為安全計大馬準備 與各國簽約〉，1/28，1。

南洋商報，1968b，〈敦拉薩宣佈英軍撤離後 馬將調整外交防務政策〉，1/28，1。

南洋商報，1968c，〈副揆形容局勢相當嚴重 邊境共黨活動 仍由陳平指揮 相信與北京北越有連擊〉，7/3，1。

南洋商報，1969a，〈東姑闡明大馬外交政策 基於互相諒解和平共存 中國對大馬如無惡意 彼此可建立良好邦交 李總理欲派軍協助大馬 實為國防合作最佳保證〉，3/3，1。

南洋商報，1969b，〈東姑首相昨晚在北海春申中國倘表示友善可與馬建立邦交〉，



3/20, 1。

南洋商報，1969c，〈大馬元首緊急宣告 進入嚴重緊急狀態 政府有權將違犯戒嚴令者 將其驅逐出境或判處死刑〉，5/15，1。

南洋商報，1969d，〈聯盟重掌政權 優勢大為削弱 東姑將改組內閣 丹州仍為泛回天下 檳州落人民政手中 雪州形成平分秋色 霹州聯盟未及半數 行動黨取得國會 13 席 州議會 31 席〉，5/12，1。

南洋商報，1969e，〈大馬副首相敦拉薩昨日正式宣佈成立 國家行動理事會 負治理全國安全 法律與條例將由敦拉薩簽署始能生效 郭陳修信披露隆市各銀行明日將營業〉，5/18，1。

南洋商報，1970，〈敦拉薩首相發表政策聲明促進各民族親善創造一個單一的國家〉，9/23，1。

南洋商報，1971a，〈首相聽柔州災情報告後 諭各縣長次助 災黎重建家園〉，1/18，5。

南洋商報，1971b，〈中國紅十字會捐 50 萬人民幣救濟馬水災難民 為迄今最大宗外國捐贈賑災〉，2/11，5。

南洋商報，1971c，〈騷亂過後持續廿一個月緊急狀態解除 馬來西亞恢復國會民主〉，2/21，5。

南洋商報，1971d，〈中國紅十字會贈救濟品運抵巴生港口重百十噸 值六十二萬五千元〉，3/6，5。

南洋商報，1973，〈馬中建交談判進行之際最好不要發表批評，敦拉薩表示欲與華建交係基於國家非政黨利益〉，7/17，5。

南洋商報，1974a，〈馬中今日公佈正式建立邦交。拉薩首相謁見毛主席，並舉行九十分鐘會談〉，5/31，5。

南洋商報，1974b，〈飛機場人頭攢洞 熱烈歡迎敦拉薩〉，6/3，5。

南洋商報，1974c，〈九個政黨組成 國民陣線獲准註冊〉，6/4，5。

南洋商報，1974d，〈大馬最高元首頒佈 國會今日解散〉，7/31，5。

南洋商報，1974e，〈馬選舉委員會正式發出選舉狀 規定大選日期〉，7/31，5。

南洋商報，1974f，〈對馬中建交立場被歪曲 民主行動黨喊冤枉〉，8/20，5。



- 南洋商報，1993，〈大馬倡議「東亞經濟核心組織 中國明確支持」〉，6/15，A4。
- 南洋商報，1999a，〈成功克服經濟危機 朱鎔基指大馬方向正確〉，11/24，A1。
- 南洋商報，1999b，〈朱鎔基支持馬哈迪 改革國際金融體制〉，11/25，A2。
- 南洋商報，1999c，〈駐馬大使關登明希望首相訪華 落實中國銀行復辦〉，8/1，A5。
- 南洋商報，1999d，〈拉菲達指落地簽證 鼓勵中國商家來馬〉，8/21，A3。
- 南洋商報，1999e，〈對中國銀行復辦 朱鎔基不想多說〉，11/25，A4。
- 南洋商報，1999f，〈堅持符合自己國情道路 中國贊馬不畏強權〉，8/20，A2。
- 南洋商報，1999g，〈首相感謝人民幣不貶值 大馬堅持一個中國〉，8/19，A3。
- 南洋商報，1999h，〈三不幽默曲 自嘲窮光蛋 朱鎔基果然幽默〉，11/25，A3。
- 亞洲周刊，2018，〈大馬選舉中國投資被政治化〉，<https://www.yzzk.com/cfm/blogger3.cfm?id=1525922220509&author=%E6%9E%97%E5%8F%8B%E9%A0%86>，2018/5/20。
- 原不二夫，2002，〈馬來亞共產黨與中國〉，《南洋資料譯叢》，4：26-39。
- 陳平，2004，〈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 陳華昇，2013，〈中國大陸強化東協外交之戰略意涵：習近平與李克強出訪東南之評析〉，《展望與探索》，11卷11期：22-29。
- 莊國土，2001，《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廣州市：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孫本初，2005，〈如何撰寫一篇優質的碩博士論文〉，「撰寫碩博士論文與投稿學術期刊論壇」，（6月8日），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 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修訂卷），新加坡：南洋學會。
- 許德發，2009，〈「承認」的斗爭與華人的政治困擾〉，文平強、許德發（編），《勤儉興邦：馬來西亞華人的貢獻》，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頁233-254。
- 黃鴻釗、潘興明（1996），《英國簡史》，臺北市：書林出版社。
- 賀艷青，2016，〈中國銀行在馬的歷史波折〉，《星洲日報》，<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38720>，2016/06/19。
- 當今大馬，2006，〈馬哈迪：阿都拉愛打瞌睡、沒魄力〉，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9199>，2006/11/07。
- 當今大馬，2007a，〈46 億醜聞歷來最大 4 年無下文 巴生港口自貿區外資撤淪鬼城〉，<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1119>，2007/08/13。
- 當今大馬，2007b，〈巴生港口自貿區醜聞：林良實將責任推給馬哈迪？〉，<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1662>，2007/08/27。
- 當今大馬，2007c，〈大選將至重疊議席成棘手課題 民行公正黨分別成立談判隊伍〉，<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8815>，2007/06/19。
- 當今大馬，2008a，〈「阿都拉是時候讓位給納吉」 馬哈迪：別找藉口多做 18 年〉，<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7637>，2008/01/30。
- 當今大馬，2008b，〈馬哈迪：經濟走廊只宣佈沒動工 轟國陣成績戰避重新輕回避問題〉，<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8956>，2008/03/01。
- 當今大馬，2008c，〈蔡細歷：我是性愛光碟主角 不辭部長職交首相定奪命運〉，<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6560>，2008/01/01。
- 當今大馬，2008d，〈性愛光碟：絆倒了老蔡，也可能拖累菜鳥〉，<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76563>，2008/01/02。
- 當今大馬，2008e，〈「黨領袖上周通知我準備」 鄧章輝黑馬殺出 丁福南嗆聲〉，<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9036>，2008/03/02。
- 當今大馬，2008f，〈許子根暗示選前不會公布首長 馬華候選人缺席國陣宣言推介禮〉，<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9098>，2008/03/03。
- 當今大馬，2008g，〈民行公正黨昨日談判再觸礁 霹靂近打谷州議席僵持不下〉，<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7807>，2008/02/05。
- 當今大馬，2008h，〈三大在野黨籌組人民聯盟 五州政府將統一施政方針〉，<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80685>，2008/04/01。
- 當今大馬，2009a，〈空手出席獨中晚宴沒宣佈好消息 納吉盡談一個大馬及兒子學華文〉，<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19841>，2009/12/15。
- 當今大馬，2009b，〈納吉放寬資金市場限制吸引外資 廢外資會限制，撤 30%土著股權〉，<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7491>，2009/06/30。
- 當今大馬，2010，〈稱華人掌控經濟如曼聯獨大 依布拉欣阿里反對開放市場〉，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26020>，2010/03/08。
- 當今大馬，2012a，〈土權團拜派「白包」引起議論 三百人出席爭先恐後搶十元〉，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87737>，2012/01/29。
- 當今大馬，2012b，〈政府修改出版法允司法審核 印刷媒體無需每年更新准證〉，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95300>，2012/04/18。
- 當今大馬，2013，〈依布拉欣辯稱無意傷害基督徒 卡巴星報警查焚燒馬來聖經論〉，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219640>，2013/01/22。
- 葉至誠、葉立誠，2002，《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版2），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 曾少聰，2004，《漂泊與根植 當代東南亞華人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建成，1982，〈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楊松年，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東南亞華人研究叢書之一》，臺北：八方文化企業。
- 趙海立，2005，〈中馬關係及其前景：建構主義視角下的思考〉，《南洋問題研究》，123（3）：14-20。
- 劉新生，2011，〈新中國建交談判實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謝劍，2006，〈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問題：對 R.J. Coughling 雙重認同理論的再思考〉，《台灣東南亞學刊》，3(2)：3-18。
- 顏清滄著，李思涵譯，1982，《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顏清滄著，李菲譯，2007，〈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的民族主義〉《從歷史角度看海外華人社會變革》。新加坡：青年書局。
- 顧長永，2006，〈從區域的觀點看中國與馬來西亞政治經濟關係的變化〉，《南洋問題研究》，126：19-27。

貳、西文部份



- Abdul Majid Ismail. 2006. *An Old Man Remembers: The Memoirs of Tan Sri Dato' Seri Dr. Haji 'Coco' Abdul Majid Ismail*. KL: The Written Word.
- Achrya, Amitav. 1999. "Containment, Engagement, or Counter-Dominance?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Engagement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eds. Robert S. Ross and Alastair I Johnston. USA: Routledge.
- Associated Press. 1973. "Razak: Malaysia would not insist China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Chinese activities in Malaysia. November 15.
- Baginda, Abdul Razak. 2002. "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 In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eds.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31-252.
- Baginda, Abdul Razak. 2016.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 Baker, Richard W.. 2004.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Pausing for Politic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6 (2): 67-77.
- Blair, Tony. 1999. "Making the case for Britain in Europe. The Prime Minister's Full Speech to the London Business School." In <http://www.guardian.co.uk/business/1999/jul/27/emu.theeuro2>. Latest update 22 December 2011.
- Borneo Post. 2013. "Introduction of SOSMA to replace ISA draws mix reaction from law practitioners." In <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3/05/27/introduction-of-sosma-to-replace-isa-draws-mixed-reaction-from-law-practitioners/>. Latest update 27 May 2013.
- Brown, David. 1996.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NY: Routledge.
- Case, William. 2014a. "Malaysia in 2012 A Non-election Year." *Asian Survey* 53 (1): 131-141.
- 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0. "Domestic Opposition and Foreign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84(3): 747-765.
- Case, William. 2014b. "Malaysia in 2013 A Benighted Election Day (And Other Events)." *Asian Survey* 54 (1): 5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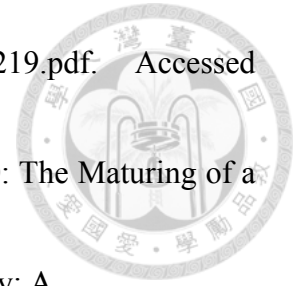
- 
- Cheah Boon Kheng, 2002.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Cheah Boon Kheng, 2009.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Malaysia, 1948-90: Contesting the Nation-state and Social Chang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1): 132-152.
- Chin Kin Wah. 1983. *The Defence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ecurity System, 1957-1971*.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n, James. 2000. "A New Balance: The Chinese Vote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8(3): 281-299.
- Chin, James. 2010. "The Rise of Najib and 1Malaysia." *South East Asian Affairs* 2010: 165-179.
- Dacey, Raymond., Lisa J. Carlson. 2004. "Traditional Decision Analysis an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1): 38-55.
- Dato' Seri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peech a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November 22, 1985, <http://www.pmo.gov.my/ucapan/?m1/4p&p1/4mahathir&id1/4846>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0.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eport 2010." i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ByCat&cat=117&bul_id=MD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09&menu_id=L0pheU43NWJwRWVVSZklWdzQ4TlhUUT09. Latest update 05 August 2011.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 "Key Statistic of Population & Demographic." in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one&menu_id=Tk81Y1BDQ1VyQ3JaZnhPUGNoNEVvZz09. Last Accessed 05 August 2011.
- Diehl, 2010. "Flirting with zealotry in Malaysia." *Washington Post*, i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6/27/AR2010062703261.html>. Latest update 28 June 2010.
- Diplomacy & Trade. 2018. "Hungary and the Countries of ASEAN." <http://www.dteurope.com/diplomacy/interviews/hungary-and-the-countries-of-asean.html>. Accessed 22 June 2018.

- 
-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issues 1982-200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Dzirhan Mahadzir. 2012. "Malaysia to buy more Chinese missile systems." *Jane's Defence Weekly*, in <http://www.janes.com/>. Latest update 10 September 2012.
- Evans, Graham & Jeffrey Newnham. 1998.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and: Penguin Books.
- Faaland, J., JR Parkinson & Saniman, 1991. *Growth and Inequality: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elker, Greg. 2000. "Malaysia in 1999: Mahathir Pyrrhic Deliverance." *Asian Survey* 40(1): 49-60.
- Fiske, Susan T., and Shelley E. Taylor, 1984. *Social Cognition*. Reading: Addison-Wesley.
- Furuoka, Fumitaka. 2007. "Malaysia-Japan Relations under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Case Studies of the 'Look East' Policy and Japanese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sian Survey* 47(3): 505-519.
- Gomez, E. T. & Jomo, K.S. 1997.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n, Cang Yau. 2004. "Re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used by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Validity". *Indonesian Quarterly* 32(2): 154-174.
- Ikenberry, G. John. 2014. "From Hegemony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23 (2): 41-63.
- Ivo D. Duchacek. 1971. *Nations and Men: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80-185.
- Jeshurun, Chandran. 2009. *Dr. Ismail Abdul Rahman: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 February 1959-August 1960*. KL: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018. "The Bay of Pigs." In <https://www.jfklibrary.org/learn/about-jfk/jfk-in-history/the-bay-of-pigs>. Accessed 21 November 2018.
- Keih, James. 2008. "US-Malaysia Security Relations and the East Asian Region." Speech at the Malaysian Armed Forces Defence College, KL.

https://photos.state.gov/libraries/malaysia/231771/PDFs/ambspeech_041608.pdf.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8.

- Keller, Jonathan W. & Yang, Yi Edward. 2008. "Leadership Style, Decision Context, an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5): 687-712.
- Khalid, Khadijah, Md. 2011.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under Najib: A Comparison with Mahathir." *Asian Survey* 51 (3): 429-452.
- Khor, Yu Leng. 2014.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Malaysia Industrial Parks" In *ISEAS Perspective: Selections 2012-2013* eds. Ooi Kee Be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46-54.
- Kuantan Port Consortium Sdn. Bhd. Malaysia. 2016. *MCKIP*. In http://www.kuantanport.com.my/zh_CN/industrial-area/mckip/. Latest update 2016.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2): 159 - 185.
- Kuik, Cheng-Chwee. 2012. "Malaysia's China Policy in the Post-Mahathir Era: A Neoclassical Realist Explanation" *RSIS Working Paper* 244: 1- 55.
- Kuik, Cheng-Chwee. 2013a.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ik, Cheng-Chwee. 2013b. "Malaysia's US Policy Under Najib: Structural and Domestic Sources of a Small State's Strategy." *Asian Survey* 9 (3): 143-164.
- Kuik, Cheng-Chwee. 2016. "Malaysi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at do Weaker States Hedge Against?" *Asian Politics & Policy* 8 (1): 155-177.
- Lee, John. 2011. "Malaysia 'Punching above its Weight'... and Finally Hitting the Targe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1): 158-170.
- Lee, K. H. and K. P. Thock. 2014. "Thirteenth General Elections (GE13): Chinese Votes and Implications on Malaysian Politics." *Kajian Malaysia* 32 (2): 25-53
- Leong, Stephen. 1987.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 Survey* 27(10): 109-126.
- Lin, Juo-Yu. 2002.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Changing Voting Preference of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Groups and Pa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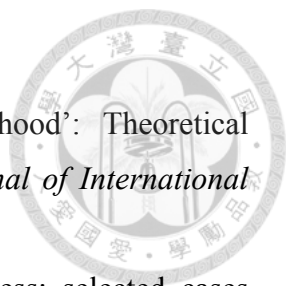


-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lin20021219.pdf>. Accessed 11 July 2018.
- Liow, Joseph Chin Yong. 2000.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 The Maturing of a Partnership." *Asian Survey* 40(4): 672-91.
- Liow, Joseph Chin Yong. 2009. "Malaysia's Post-Cold War China Policy: A Reassessment," In *The Rise of China: Response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eds Jun Tsunekawa. Toky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 Mahathir Mohamad. 1970. *The Malay Dilemm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 Mahathir Mohamad. 1989.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In *Mahathir's Economic Policies*, 2nd Edition, eds. K. S. Jomo. Kuala Lumpur: Insan, p. 7.
- Mahathir Mohamad. 1992. *Speech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 <http://www.pmo.gov.my/ucapan/?m=p&p=mahathir&id=1132>. Latest update 14 October 1992.
- Malaysiakini. 2009. "PM umum bebas 13 tahanan ISA, batal larangan ke atas akhbar PAS, PKR." In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1644>. Latest update 4 April 2009.
- Malaysia Government. 2006.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KL: Percetakan Nasional Malaysia Berhad.
- Malaysia Government. 2010. *Federal Constitution (Reprint)*. KL: Percetakan Nasional Malaysia Berhad.
- Malay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2010. "Media Release: Malaysia Join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Negotiations." In <http://fta.miti.gov.my/index.php/pages/view/191>. Latest update: 21 July 2015.
- Malaysian Insider. 2013. "Malay Business Group Says No to Free Trade Deal, Wants Debate in Parliament." In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malay-business-group-says-no-to-free-trade-deal-wants-debate-in-parliament>. Latest update 4 June 2013.
- Martin, Michael F. 2008. "U.S.-Malaysia Relations: Implications of the 2008 Elec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Merdeka Center. 2008. "12th General Election: Observations on Issues, Voting Dir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 http://merdeka.org/pages/02_research.html. Accessed 2 October 2018.

- 
- Merdeka Center .2013. “Public Opinion Survey 2013: Peninsular Malaysia Voter Survey.” In <http://www.merdeka.org/v4/phocadownload/Researches/12a%20national%20poll%202013-%20press%20release%20slides%20final.pdf>.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18.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http://www.kln.gov.my/web/guest/foreign_policy. Accessed 4 March 2018.
- Mintz, Alex. 1993. “The Decision to attack Iraq: A Non Compensatory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7(4): 595-618.
- Mintz, Alex, and Nehemia Geva. 1997a.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on war and peace: The cognitive-rational debate*, eds. Nehemia Geva and Alex Mintz,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88-101.
- Mintz, A., Geva, N., Redd, S., & Carnes, A. 1997b. “The Effect of Dynamic and Static Choice Sets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Decision Board Plat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3), 553-566.
- Mintz, Alex. 2003. “Theory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eds. Alex Mintz, NY: Palgrave Macmillan, 159-168.
- Mintz, Alex. 2004a.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3-13.
- Mintz, Alex. 2004b.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Setting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91-104.
- Mintz, Alex. 2005. “Applied Decision Analysis: Utilizing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6:94-98.
- Muhammad Amin B, Mohammad Rahim K and Geshina Ayu Ms. 2014. “A Trend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s in Malaysia”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5 (2): 41-56.
- Najib, Abdul Razak. 2002 "U.S-Malaysia Defense Cooperation: A Solid Success Stor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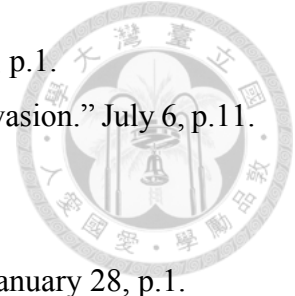
- 
-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us-malaysia-defense-cooperation-solid-success-story>. Latest update 3 May 2002.
- Najib, Abdul Razak. 2010. "An update from Washington, DC." *1Malaysia Blog*, <http://1malaysia.com.my/zh/blog/an-update-from-washington-dc-2/>. Latest update 13 April 2010.
- Nesadurai, Helen E. S. 2004.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jecting Dominance, Embracing Engagement*. IDS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 New Straits Times. 2010a. "Beijing Recognizes KL as Approved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pril 24, p.8.
- New Straits Times. 2010b. "Lifeline for our Nuri Copters." April 4, p.15.
- Official Website of Embassy of Malaysia, Warsaw. 2018. http://www.kln.gov.my/web/pol_warsaw/history. Accessed 31 Jan 2018.
- Oppermann, Kai. 2014. "Delineating the Scope Conditions of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and the Domestic Salience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0(1): 23-41.
- Ostrom and Job, 1986. "The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Fo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2): 541-566.
- Ott, Marvin C. 1972.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in Malaysia." *Asian Survey* 12(3): 227.
- Perdana Leadership Foundation. 2018a. "Biography of Tunku Abdul Rahman (English)." In <http://www.perdana.org.my/pms-of-malaysia/tunku-abdul-rahman/tunku-abdul-rahman>. Accessed 16 August 2018.
- Perdana Leadership Foundation. 2018b. "Biography of Tun Abdul Razak (English)." In <http://www.perdana.org.my/pms-of-malaysia/tun-abdul-razak/tunku-abdul-razak>. Accessed 16 August 2018.
- Perdana Leadership Foundation. 2018c. "Biography of Tun Hussein Oon (English)." In <http://www.perdana.org.my/pms-of-malaysia/tun-hussein-onn/tun-hussein-onn>. Accessed 16 August 2018.
- Perdana Leadership Foundation. 2018d. "Biography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English)." In <http://www.perdana.org.my/pms-of-malaysia/tun-dr-mahathir-mohamad/tun-dr-mahathir-mohamad>. Accessed 16 August 2018.

- 
- Poon, Kim Shee.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hathir's China Policy: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mbivalence." *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59-79.
-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utrajaya, Malaysia. 2010. "Malaysia As a Fully Developed Country." In <http://www.pmo.gov.my/home.php?menu=page&page=1898>. Latest update 20 March 2010.
- Ratnam, K. J. & R. S. Milne 1970. The 1969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West Malaysia. *Pacific Affairs*. Summer 1970.
- Reid, Anthony. 2004.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 In *Malaysia Reconsidered*, eds. Timothy P. Barnard. SG: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24.
- Reid, Anthony. 2010.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nehart, Ian E. 2015. *Malays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In <https://fas.org/sgp/crs/row/R43505.pdf>.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18.
- Saravanamuttu, Johan. 1981. "Malaysia-China Ties, Pre and Post 1974: An Overview" In Loh Koh Wah, Phang Chung Nyap and J. Saravanamuttu,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laysia-China Ties: Elite Perspectives*. Tokyo: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 Saravanamuttu, Johan. 1996.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hathir Period, 1981-1995: An Iconoclast Come to Rul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16.
- Saravanamuttu, Johan. 2010.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Fifty Years: Alignment, Neutralism, Islamism*. KL: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aravanamuttu, Johan. 2016. *Power Sharing in a Divided Nation: Mediated Communalism and New Politics in Six Decades of Malaysia's Elections*. Singapore: ISEAS.
- Shamsul, A.B. 2004. "A History of an Identity, an Identity of a History: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Malayness." In *Malaysia Reconsidered*, eds. Timothy P. Barnard. SG: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24.
- Shih, Chih-yu. 2017.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Chinese Studies: Emerging Post-Chineseness." In *From Sinology to Post-Chineseness: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eds. Chih-yu Shih,

- 
- Peizhong He, Lei T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15.
- Shih, Chih-yu. 2018a. "Identities in Sino-Pakistani 'Iron Brotherhoo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beyond the Economic Corrido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2): 1–22.
- Shih, Chih-yu. 2018b. "Understanding China as practicing Chineseness: selected cases of Vietnamese scholarshi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9 (1): 40–57.
- Shome, Anthony S.K. 2002. *Malay Political Leadership*. NY: Routledge.
- Simon, Herbert A. 1985.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2): 293-304.
- Singapore Standard. 1957. "Red China will Recognize New Nation", August 31.
- Singh, Bilveer. 2008. "Malaysia in 2008: The Elections that Broke the Tiger's Back." *Asian Survey* 49(1): 156-165.
- Singh, Bilveer. 2010. "Malaysia in 2009: Confronting Old Challenges through a New Leadership." *Asian Survey* 50(1): 173-184.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8a. "Jiang to Meet Snubbed Mahathir." November 17, page 1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8b. "Mahathir Accuses United States of Attempting to Recolonise the Country" .In <https://www.scmp.com/article/265878/mahathir-accuses-united-states-attempting-recolonise-country>. Latest update 14 December 1998.
- Starner, Frances L., 1965. "Communis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 Multifront."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d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Storey, Ian. 2011.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 Tan, Liok Ee. 1988. *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 AU:The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 The Ambassade of Romania in Malaysia.2010. *Bilateral Relations - Brief History Malaysia*. In <http://kualalumpur.mae.ro/node/221>. Accessed 31 Jan 2018.
- The Asia Magazine.1974. "Razak's China Triumph." September 22.
- The Malay College Kuala Kangsar. 2018. "About MCKK." In <http://mckk.edu.my/about/about-mckk/>. Latest update 29 October 2018.

- 
-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1969. *The May 13 Tragedy*. KL: Government Printer.
- The New York Times. 1958. “Malaya Rules out State-owned Banks” December 5, p.10.
- The New York Times. 1971. “Attacks by Guerrillas Rise in Malaysia”. In <http://www.nytimes.com/1971/07/01/archives/attacks-by-guerrillas-rise-in-malaysia.html>.
Latest update 1 July 1971.
- The New York Times. 1989a. “Malaysia Communists Agree to Cease-Fire After 41 Years.” December 3, p.A3.
- The New York Times. 1991. “A Wary Step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November 17, p.A5.
- The New York Times. 1998a. “Gore, in Malaysia, Says its Leaders Suppress Freedom.” November 17, p.A1.
- The New York Times. 1998b. “Gore Scolded in Malaysia for Defense of Dissenters.” November 18, p.A14.
- The New York Times. 1998c. “Ousted Aide, Charging Plot, Calls on Malaysia’s Premier to Quit” September 20, p.9.
- The Official Portal of Parliament of Malaysia. 2018. <https://www.parlimen.gov.my/aum-de-wan-rakyat.html?&uweb=dr&lang=en&arkib=yes>. Accessed 4 October 2018.
-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1976. <http://www.cicred.org/Eng/Publications/pdf/c-c34.pdf>.
- The Star. 2008a. “We did not hear it wrongly.”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8/09/06/journalists-we-did-not-hear-it-wrongly/>. Latest update 6 September 2008.
- The Star. 2008b. “Reporters confirm hearing Ahmad’s racist remark.”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8/09/07/reporters-confirm-hearing-ahmads-racist-remark/>. Latest update 7 September 2008.
- The Star. 2010. “Obama Congratulates Najib on his Stance on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0/04/13/obama-congratulates-najib-on-his-stance-on-weapons-of-mass-destruction/>. Latest update 13 April 2010.
- The Star. 2011. “Bank Negara to set up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In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1/04/28/bank-negara-to-set-up-representative-office-in-beijing/>. Latest update 28 April 2011.

- 
- The Star. 2012a. “China-Malaysia Trade to Touch US\$100b.” In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2/03/16/chinamalaysia-trade-to-touch-us100b/>. Latest update 16 March 2012.
- The Star. 2012b. “Malaysia Offers China Similar Project in Kuantan.”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2/04/02/malaysia-offers-china-similar-project-in-kuantan/>. Latest update 2 April 2012.
- The Star. 2012c. “Govt Finalising Details of Malaysia-China Project.”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2/05/07/govt-finalising-details-of-malaysiachina-project/>. Latest update 7 May 2012.
- The Star. 2012d. “ECER Attracting Billions.”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2/12/15/ecer-attracting-billions/>. Latest update 5 December 2012.
- The Star. 2013a.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Open for Business.”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3/02/05/malaysiachina-kuantan-industrial-park-open-for-business/>. Latest update 5 February 2013.
- The Star. 2014a. “An Unofficial Trade Delegation.”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4/01/19/an-unofficial-trade-delegation/>. Latest update 19 January 2014.
- The Star. 2014b. “Najib: Why Should Malaysia Choose between US and China?”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4/08/24/najib-foreign-policy/>. Latest update 24 August 2014
- The Star. 2015. “Najib: Studying in England taught me to adapt to situations.” In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1/26/najib-studying-in-england-at-young-age-taught-him-how-to-adapt/>. Latest update 26 January 2015.
- The Straits Times. 1959. “Bank Closes.” March 17,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60. “Story of the Emergency.” April 24, p.10.
- The Straits Times. 1964. “A Double Protest Goes to the Cairo Conference.” October 4, p.7.
- The Straits Times. 1965. “An Insult to Malaysia by Winneba Conference.” May 19, p.18.
- The Straits Times. 1966a. “Malaysian Defence is a Hot Topic.” March 23,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66b. “The Defence Battle.” June 13, p.10.
- The Straits Times. 1966c. “The Peking grand design in Malaysia.” January 23, p.8.
- The Straits Times. 1966d. “Peking gives aid to our rebels.” January 15, p.24.
- The Straits Times. 1967a. “Malaysia, S’pore to have ties with Tito soon.” May 4, p. 9.



- The Straits Times. 1967b. "Full Ties with Soviet Union." November 24,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7c. "Razak: W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defeat invasion." July 6, p.11.
- The Straits Times. 1967d. "Pull out in middle 1970's." July 19, p. 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a. "All out by 1971." January 17,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b. "The Tengku: We are all for no-war pacts." January 28,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c. "Tengku: We are ready for talks anywhere." January 25,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d. "The Ismail plan for peace." January 28,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e. "Malaysia ready to be friends with Peking if..." August 20,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68f. "'We'll be friends provided Reds don't break our heads'." August 22,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71a. "The First Step to China." May 10,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71b. "China Favours Tun's Policy of Neutrality: Razaleigh." May 10,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71c. "'Zone for Peace' accord." November 27,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73a. "Malaysia-North Korea Relations." June 30, p. 32.
- The Straits Times. 1973b. "Malaysia set for China ties." June 30,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73d, "Peking ties will be set up soon – Razak." November 13, p.5.
- The Straits Times. 1974. "Razak Calls August Polls." July 31, p.1.
- The Straits Times.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December 2, p.33.
- The Washington Post. 1973. China Refused Malaysia to Change its Policy. December 13, p.27.
- The World Bank. 2018. "GDP Growth Annual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7&locations=my&start=1982>. Accessed 9 September 2018.
- Ufen, Andreas. 2008. "The 2008 Elections in Malaysia: Uncertainties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4 (1): 155-169.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18. "Trade in Goods with Malaysia."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570.html>.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18.
- Vasil, Raj K. 1972.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of 1969*. 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1970. "China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 1-30.
- Weiss, Meredith L. 2000.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Issues, Insults, and Irregularities." *Asian Survey* 40(3): 413-435.
- Vertzberger, Yaacov Y.I..1990.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參、馬來文部份

- Berita Harian. 1966. "Sharma pernah minta pulang tapi di-tolak." January 19, p.5.
- Berita Harian. 1968. "Parti2 Komunis China dan Vietnam Utara Sokong Gurila2." June 21, p.5.
- Berita Harian. 1989. "CPM Letak Senjata Cara Rasmi." December 3, p.1.
- mStar. 2009. "Permit Harakah, Suara Keadilan digantung 3 bulan." In <http://www.mstar.com.my/berita/berita-semasa/2009/03/23/permit-harakah-suara-keadilan-digantung-3-bulan>. Latest update 23 March 2009.
- Parti Islam Se Malaysia. 2018. "Sejarah Parti Islam Se Malaysia." In <https://pas.org.my/sejarah-parti-islam-se-malaysia-pas/>.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8.
- UMNO Online, 2018. "Sejarah UMNO." In <https://umno-online.my/sejarah/>.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8.
- Utusan Online, 2013. "Apa lagi orang Cina mahu?" In http://ww1.utusan.com.my/utusan/Pilihan_Raya/20130507/px_03/Apa-lagi-orang-Cina-%20mahu. Latest update 7 May 2013.
- Wariya, Chamil.1989. *Dasar Luar Era Mahathir*.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 pp. 53-61.

附錄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馬來西亞政府聯合公報



馬來西亞總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賓·達圖·侯賽因閣下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閣下的邀請，於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陪同敦·阿卜杜勒·拉扎克總理閣下的有政府各政黨代表和政府官員。

在訪問期間，敦·阿卜杜勒·拉扎克總理會見了毛澤東主席，並向他轉達了馬來西亞政府最良好的祝願。他們進行了友好、坦率的談話。

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和敦·阿卜杜勒·拉扎克總理就雙邊性、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會談。會談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兩國總理一致認為，近年來亞洲形勢發生了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深刻變化，中馬兩國關係正常化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為此，兩國總理決定通過本聯合公報宣佈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決定自公報公佈之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二)兩國政府認為，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來西亞的社會制度不同，這不應妨礙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兩國政府認為，任何外國的侵略、干涉、控制、顛覆，都是不能允許的。雙方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決定，它們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

(三)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馬來西亞政府決定關閉它在台北的領事館。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馬來西亞政府，並尊重馬來西亞的獨立和主權。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到馬來西亞是由馬來血統、中國血統和其他血統的人構成的多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聲明，它們都不承認雙重國籍。根據這一原則，中國這政府認為，凡已自願加入或已取得馬來西亞國籍的中國血統的人，都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至於那些自願保留中國國籍的僑民，中國政府根據其一貫的政策，要求他們遵守馬來西亞政府的法律，尊重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他們的正當權利和權益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將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尊重。(六)周恩來總理和敦·阿卜杜勒·拉扎克總理同意，兩國政府按照國際慣例，在各自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並按實際可能儘早互換大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總理

周恩來

馬 來 西 亞

總理

敦·阿卜杜勒·拉扎克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於北京